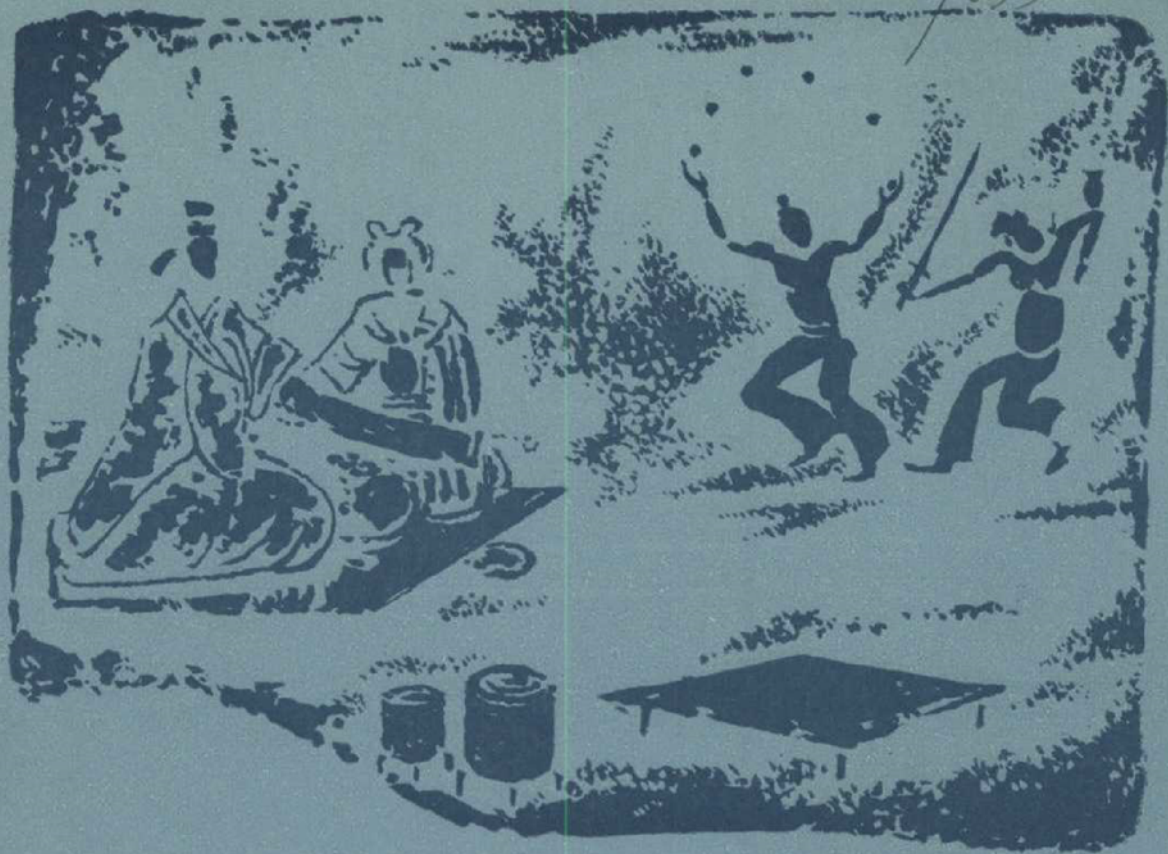


2/033



学术研究



3

XUESHUYANJIU 1984

目 录

- 发挥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心作用……………于光远(5)
- 论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王 琢 廖曙辉(10)
- 论奖金的性质、职能与经济效益……………丘舜平(16)
- 科学技术与经济效益……………李万忍(28)
- 及早准备,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
- 我省部分专家座谈发言摘要……………(27)
- “三个面向”是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根本方向(座谈摘要)……………(85)
-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
- 论一般与个别
- 兼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赵凤岐(87)
- 社会主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探讨……………齐振海(45)
- 论庄子……………鲁凡之(52)
- 建国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综述……………李 宁 冯崇义(59)
- 党成立前的省港工人阶级……………裨倩红 卢 权(65)
- 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史实考辨……………桑 兵(78)

中国五口通商时期丝茶出口贸易.....杨源兴(78)

欣赏对象与欣赏主体的矛盾关系考察

——兼谈艺术欣赏的特质.....杜书瀛(85)

中国诗坛社与华南的新诗歌运动.....陈颂声 邓国伟(92)

那辗——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法.....林文山(97)

甲骨文所见第一人称代词辨析.....陈炜湛(104)

· 来稿摘编 ·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性和商品性的统一.....张浩峰 廖建新(109)

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问题是哲学基本

问题第三方面.....刘歌德(110)

青少年的自我教育.....傅 岩(112)

邓世昌殉国情形考辨.....廖宗麟(64)

“异乎三子者之撰”集讼拾得.....倪祥保(22)

关于《幻缘记》传奇作者由云龙.....官桂铨(84)

西魏之亡当在何年.....宦荣卿(26)

· 学术动态 ·

全国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在广东召开(72)

广东社会科学界纪事(1984年1月—3月)(封三)

封面设计.....王造星

CONTENTS

Give Full Play to the City's Key Role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Yu Guangyuan (5)

A Few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Strategy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
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Wang Zhuo and Liao Shuhui (10)

On the Nature, Function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Bonuses
..... Qiu Shunping (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Benefits..... Li Wanren (28)

Make Timely Preparations for Ushering in a New
Technical Revolution on a Worldwide Scale
— Extracts of speeches made at a symposium by experts and
specialis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27)

The "Three 'Facings' " to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Orient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xtracts of speeches at a symposium (The "Three 'Facings' ",
i.e., facing modernization, facing the world, and facing the future)
..... (85)

A Study on "Dialectics in Socialist Society"

On "the General" and "the Particular"
—Together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building of a typically-
Chinese socialist society Zhao Fengqi (87)

The Unity of the General Laws and the Particular Laws in
Socialist Society..... Qi Zhenhai (45)

On Zhuang Zi

—The famous philosopher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Lu Fanzhi (52)

Comprehensive View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 Ning and Feng Chongyi (59)

The Working Class of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uan Qianhong and Lu Quan (65)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Concerning the Anti-

Manchu Speeches Delivered on the Lunar New year's Day of 1903

by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Sang Bing (73)

Export Trade of Silk and Tea in the Period of "The Opening-up of

the Five Chinese Trading Ports".....Yang Yuanxing (78)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bject of Appreciation" and "the Subject of Appreciation"

.....Du Shuying (85)

"The Chinese Society of Poets" and the New Poetry Movement in

South China.....Chen Songsheng and Deng Guowei (92)

"Na Zhan"—An Important Artistic Device for Literary Creation

in Ancient China.....Lin Wenshan (97)

An Analysis and Discrimination of the First-Person Pronoun As

Seen in Ancient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Chen Weizhan (104)

Extracts from Readers' Contributions

Socialist Economy Means the Unity of "Economic Planning"

and "Commodity Production"

.....Zhang Haofeng and Liao Jianxin (109)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Universal Law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e Is of the Third Aspect of the Basic Problem

of Philosophy.....Liu Gede (110)

Self-Education of the Youngsters.....Fu Yan (112)

Random Notes in Reading

Recent Academic Trends

发挥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心作用

于 光 远

城市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正越来越被更多的同志所认识。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对这门科学也很关怀、很支持。城市科学在我国是一门需要得到很大发展，但还没有得到应有发展的一门年轻的学科。需要更多的具有各种专长的科学工作者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这门学科，为开展城市科学的研究做出巨大的、不懈的努力，需要各有关方面对这一学科给以更多的扶植和支持。

关于城市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其中有一个问题——发挥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心作用——是几年来大家特别关心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也写了不少文章。今天我不打算对这个问题展开来讲，只想就这个题目提出应该研究的问题。我想到有这样六个方面：①与农村相区别的城市；②与资本主义城市相区别的社会主义城市；③城市依靠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中心作用；④不同城市的不同作用；⑤必须重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⑥如何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

这六个题目我是这样考虑的：

第一个题目，想讲一讲城市的规定性。城市与农村属同一类，是最接近的相似物。八二年我在档案工作会议上讲了黑格尔《小逻辑》中的一个思想：一个人如果能识别一根针与一峰骆驼的区别，算不了什么聪明。一个人如果说香椿和臭椿两种树很相似，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难的是能识别“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要了解城市的规定性就要找它的同类物、最接近的相似物加以分析，这样才最容易把城市的规定性确定下来。我考虑，城市或农村都是在特定的地域内自然物与社会关系相结合的系统，都有天然的或经过人们加工的土地，都有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物质财富，都有活动着的人，都有每天每时都在进行的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活动，都是自然物和社会关系在特定地域内的总和。所以城市和农村可以看作是比较接近的同类物。它们都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属性，这是共同的。

那么城市与农村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既然城市和农村都是一个地域，就有它们各自的范围。这个范围不能以行政区来划分。在如北京市城市的范围就包含了平谷、延庆、门头沟、房山等许多农村，甚至人口比较稀少的山区都包括在里面了。我们所说的科学

意义上的城市不是行政区划的城市。科学意义下的城市和农村范围怎么定？通常以人口集中程度来划分。人口在一个地方集中的规模大到一定的程度，住在这个地域里的人就不能经常到空旷的土地上去从事劳动，这种地域就同能够经常到空旷的土地上去进行劳动的地域不一样。前者就叫做城市，后者就叫做农村。经常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叫做城市人口，经常在农村中生活的人叫做农村人口，城市的范围和农村的范围是互为界限的。这个界限可不可以这样来划分：城市人口经常活动的范围就是城市的范围，农村人口经常活动的范围就是农村的范围。城市、农村互为界限。农村人活动的范围包括要耕作的土地、要进行采伐的森林、要放牧的草物等等。城市也有城市人口活动的范围。我指的是以人们经常活动、经常劳动、经常生活的范围划分城市和农村的范围。在这里，“经常”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城里的人有时也到农村去郊游，农村里的人有时也进城，如果不加“经常”二字，城市和农村就分不开了。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范围不确定，有些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就不好解释。范围确定后，就可以看出农村和城市的区别：城市离开能从事农业的土地较远（城市的边缘可以作为过渡的状况来看待），城市人口基本上不从事农业生产。农村离开能从事农业的土地比较近，在农村中生活的人中参加农业生产的就很多。进一步说，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城市与农村都有很大区别。城市是高密度的，它的人口、建筑物、人类创造的财富在空间上高度密集，这是静态的。与之相关的还有动态密度，即投入产出密度。在生产方面，投入生产资料，产出产品和生产排泄物；在生活方面，投入生活资料，产出生活排泄物，这也是高度密集的。并且由高密度的自然物、高密度的投入产出产生了高密度的交通运输和高密度的信息传递。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是值得好好想的，但今天我还是没想清楚。

第二个题目是想讲讲与资本主义城市相区别的社会主义城市。我认为有两类事物：一类能够加上“社会主义”这样的词，一类不能。不能在任何事物上都加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限制词。

我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完全不能在这方面加什么“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限制词，如“物理学”，我们完全不能说社会主义的物理学或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学。物理学是无所谓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也无所谓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物理学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物理学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物理学时会想到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去研究物理学，而且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去研究物理学，会对自己的物理学研究有很多的帮助。尽管这样，也不能因为运用这样的研究，就使物理学变为“马克思主义物理学”。这样的事物算作第一类。

第二类是必须加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限制词，或者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如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科不太确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并列的学科，它们之间有内在的

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研究现实社会而形成的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结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实社会得出的结论。列宁讲，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基础，因为马克思的主要工作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想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这一个基本部分突出出来。严格讲，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应该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科学。马克思用哲学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而标志一个学说的本质的规定性当然是它的结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类事物，我认为可以分两部分，既有不应该加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样限制词的部分，也有应该加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样限制词的部分。在科学中，我们可以举战略学为例。在战略学中有一般的战略学，但也有社会主义的战略学。社会主义的战略学是只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才能掌握和运用的战略学。经济效益学也是这样。经济效益学中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比如我们谈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而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不可能讲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的。

城市科学我认为也属于这一类，它既包括有属于一般科学研究范围的，也包括有属于社会主义研究范围的。所以城市科学有一般科学的内容，也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内容。

我认为我们研究城市科学的人应该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并且要努力把这两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既要掌握一般科学，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如果只掌握一般科学，就要迷失方向，如果只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不掌握一般科学，常常会在实际工作中无所作为。一个人在工作中必须掌握两方面的科学知识。我常常引证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一段话：只有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搞建设，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什么呢？是学一般管理、一般技术。当然不能学资本家去剥削劳动者，我们一定要积极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一般文化。不学这个文化，不会管理，怎能建设社会主义呢？如果认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就能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甘心愚昧无知吗？无知的人怎么配称共产主义者呢？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能只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认识，只会说共产主义的话，还必须能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贡献。怎样才能作出贡献呢？一要懂得共产主义，要有正确的方向；二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贡献的本事。在城市科学中讲讲与资本主义区别的社会主义城市，是为了认清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两种城市的区别。我们一方面要看一切城市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城市的个性，看到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特点，城市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不要忘记在城市工作上也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第三个题目，是想讲讲城市依靠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中心作用。城市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有各方面的作用，因此，它要依靠的东西也是多方面的。要靠生产；要靠服务；要靠它在组织商品流通上的作用；要靠它在文化上的作用；要靠它起管理

中心的作用。要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要靠并可以靠的东西还有别的。对此，我们要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我们在要依靠什么发挥作用的研究得出结论之后，就在行动上加强所要依靠的东西。

在这个题目中对上面的问题只是一般性的考察，必须要有第四个题目。这第四个题目就是不同城市的不同作用。这是把上面的题目具体化。因为不同城市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它要依靠的东西也不同。具体的城市有综合性的，也有非综合性的。有的城市如矿山城市，如果它处在很偏僻、消息不很灵通的地方，要成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它的作用范围就比较小。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这里我们也要做具体的分析工作。

第五个题目，是想讲讲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必要性，要把我们对城市的认识、经验、教训进行总结。过去我们对城市的作用认识不够，或对一般的城市中心作用认识不够，或对具体城市作用分析不够。如在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建设作出四项指示前北京市的建设方针就不明确，这带来了不很好的效果。在中央作出这四项指示后，北京的城市作用就明确了。这里讲必须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包括历史经验的总结问题，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必要性问题，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等问题。

第六个题目，是想讲讲具体做法。从上面对城市中心作用的分析，得出应有的结论，就是发挥城市的积极作用。怎样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要从自然方面，社会关系方面等各方面来探讨。这里还有个观念问题：既要城市发挥中心作用，城市就不能自顾自。从事城市工作的同志就要有全面的眼光，远大的眼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讲经济效益，不能只讲局部的经济效益，还一定要讲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可以把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作为前提，力求把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与局部的、部门的、本单位的经济效益统一起来。讲全社会的效益，是社会主义的特点和原则。城市要起中心作用，更要讲全社会的效益。这里除了方法问题外，还有基本观点问题。效益问题怎么讲？在全国第二次环保会议上，我在提交大会的发言提纲中采取了两分法，即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口头发言时，我把两分法改为三分法，即生产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后来我把社会效益改为最终社会效益）。在这三分法中经济效益这个名词没有出现，其实在生产效益、生态效益和最终社会效益中，都把经济效益包括进去了。经济效益不等于生产效益，更不等于利润、赚钱。经济效益的概念包括生产、交换、流通、消费中的效益。比如人民生活改善这样的经济效益，就包括到最终社会效益之中。最终社会效益是以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以人民的幸福为标准来衡量的。把这条做为根本，生产效益、生态效益都用它衡量。这就是最终社会效益的一元论。用最终社会效益来衡量生产、生态效益，这种三个效益的三分法，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基本思想。在如何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的问题中，既包含了原则问题，指导思想问题，也包括具体办法问题，组织问题。

以上讲的只是些初步想法，我还没有把这几个问题都想清楚，因此只好讲一点

我在考虑这些问题时的初步想法。没有想好本来可以不必讲的，但是我想如何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的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是大家已在研究的课题。把这些初步想法先讲也好。我这篇文章的内容实际上讲的只是一个研究提纲。这个提纲也许对问题的研究能起一点参考作用，这也算是一种工作。

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常常忽视一个环节——研究提纲。一个课题往往没有解剖开，没有解剖为若干小课题，因此不能在这个研究提纲中每人搞个小题目，然后合起来取得总体研究的成果。现在科研组织性差，有的题目大家都搞，大同小异，有的没有人搞，是空白，这样就不能把研究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拿不出一个系统的东西。我主张把大题目分开，当然不是说一个题目只能有一个人研究。可以多几个人研究一个题目，这样有个同行，可以说同行话，可以讨论。大家分工协作，这样更有成效。在工业生产中，我提出了搞王牌工业的想法，为的是避免在工业生产中狭路相逢。现在搞工业，大家都去搞几大件，你搞我也搞，路子很窄，在狭路上碰上了，进行了相当激烈的竞争。两兵相交，必有一伤。就是要把路子拓宽，各地注意发挥自己的长处，建立王牌工业。在学术上也有这个问题，也常常狭路相逢。所以要把大题目展开，大题目中出小题目。对每个题目预期达到什么结果，有个计划，把研究工作组织起来。对科研工作我不主张搞严密的组织，搞什么指令性计划，我主张的是要有一个松散的计划和组织，但应该有一个计划。现在在城市科学方面建设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城市科学研究会，对于组织城市科学研究是很有利的。网要撒开，各种题目都提出来，以后可以收回来，收到一个总题目上来。这样我们就能取得对我国城市建设很有用处的研究成果。



论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王 琢 廖曙辉

从广东的实际出发，研究广东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这是经济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认为，研究广东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要捉住主要矛盾，回答主要问题。这里，我们提出以下五个问题探讨。

一、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是广东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研究广东经济发展战略，首先要探索什么是广东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广东社会的主要矛盾同全国一样，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广东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所谓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制约全局的东西。从生产力方面来看，广东经济发展中制约全局的主要矛盾是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而后中央又决定在我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促进了我省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我省引进了外资和侨资，也引进了一批新设备、新技术，这就推动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使工农业的技术面貌有所改变。但是，从总体来讲，我省工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技术水平低，许多商品同发达国家比较，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还比较大。农业的发展，目前主要是靠政策，而科学技术仍然十分落后。这种技术落后的状况，严重阻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应当说，这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当前，我们面临国内和国外两方面新的挑战，这个主要矛盾更加日益突出了。如果再不下功夫根本改变这种技术落后的状况，片面追求产值而忽视经济效益，片面追求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忽视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那末，我们就不能迎接国内外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也不能抓住时机加速发展广东经济。

从国内看，我省工业、农业、交通、能源等等，都遇到了新的挑战。农副产品提价、生产资料中的一次能源提价、增加工资、发放奖金等等，使工业企业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面对这种挑战，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企业的技术落后状况，全面提高企业的素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近几年国内老工业基地发挥了经济技术先进的优势，使广东的商品在国内市场中也遇到了新的挑战。面对这种国内市场的新形势，要提高广东商品的竞争能力，增加新商品和新品种，根本出路也在于改变企业的技术落后状况，

全面提高企业的素质。

从国外看，现在国际上出现所谓“新的产业革命”，它正在推动生产技术的飞跃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际市场的竞争，使广东的部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利。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我们就更难适应国际市场的这种日益加剧的竞争形势。面对这种挑战，我们研究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的注意力要集中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要捉住主要矛盾，把注意力集中在改变广东技术落后状态，狠抓技术改变和技术开发上面。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当前首先要在指导思想进一步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要真正从采用一般技术转向采取符合广东实际需要的先进技术和比较先进的技术；二是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转向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实现这两个转变，狠抓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它标志着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

二、“迎头赶上”是广东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

广东属于我国经济技术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在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领域，都有一定基础。在迎接国内外两个方面新的挑战，在跳出传统的工业发展的阶段，直接采用“新的产业革命”的科学技术成果方面，广东应当走在全国的先列；同时将来还要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实行先进技术的转移和管理经验的转移，为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广东经济发展战略要研究怎样瞄准经济技术先进这个目标，尽快缩小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不着眼在技术进步上作文章，光想着做买卖赚钱，到头来，不能改变技术落后的面貌，就不可能提高我们的经济实力。我们认为，在经济技术上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应当是广东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采用“迎头赶上”的战略对策，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就要以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为中心。有的行业以技术改造为主，有的行业以技术开发为主。一些新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必将产生新的产业和新的行业。

应当估计到，广东的现有技术设备，是实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的坚实基础。我们在一些领域里，经过努力，有可能不经过某些传统工业技术，直接采用“新的产业革命”而又适合于我们需要的最新技术，使我们能在本世纪末在某些产业部门和某些商品的技术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全省工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来说，在本世纪末可以达到八十年代初的世界先进水平。

广东的许多行业和部门，如工业、商业、外贸、金融、医疗、交通等行业和一些行政机关、科研机构等，都可以广泛应用微处理机与微型计算机，这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商品质量，提高经营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决策的科学性，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捷径。生物工程科研成果的应用，是解决能源、粮食、疾病、环境污染等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并将形成一个全新的产业部门。广东的一些企业正在运用生物工程某些科研成果，如工业利用废糖蜜为主要原料生产核糖核酸、核苷

酸、聚肌胞等产品，利用一些特殊细菌，使工业废水、污水净化，又如农业运用遗传工程的技术开发塘鱼新品种，等等。国家已决定在广东建立一个万吨规模的单细胞蛋白饲料样板基地，同时考虑在广州建立生物工程中心。广东的工业、农业和医疗部门，都可以在生物工程科研成果的广泛运用上面作出更多的文章，走到全国的前列。海洋工程科研成果的应用，使海洋事业由一般的自然环境调查研究和传统的利用，开始转向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海洋矿产、生物、化学、能源和空间资源的开发，打开了蓝色宝库的大门。我省拥有四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拥有宽广的大陆架，南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其它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南海资源，尤其是石油资源，将会引起我省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深刻变化。

吃的和穿的这是全世界市场容量最大的东西，在广东食品和服装行业的传统技术和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采用先进技术，进行农副产品的多次深度加工，可以推动食品工业的大发展，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可能成为食品生产中心；发展石油的深度加工，可以带动塑料、化纤一大批行业，并且结合广东传统的针织工业优势，推动服装工业的新发展，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可能成为服装中心。

从一些产业部门来看，例如发展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从今后发展来看，关键是靠农业现代化，采用先进技术武装农业，发展和开发优良品种、保鲜技术、深度加工、综合利用、科学储存和运输。又如发展蔗糖生产是广东的一大优势，在发展蔗糖生产的同时，可以大搞甘蔗的综合利用。甘蔗综合利用潜力最大的是蔗渣和废糖蜜，如果把现在的综合利用率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或者更高（现在江门甘蔗化工厂的综合利用率是百分之五十），创造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效益将会成倍增长，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开发饲料工业，也是广东的一个新兴行业。

三、发展优势是制定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的立足点

广东发展经济，实行“迎头赶上”的战略对策，以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为中心，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艰苦奋斗，并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多在“外”字作文章，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广东发展经济固有的优势很多。归纳起来有“天、地、人”三个方面。天时，处于热带、亚热带，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常青。地利，沿海地区，毗邻港澳，珠江口可通往世界五大洲；有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有资源丰富的广大山区和全国第二大岛——海南岛；有广州、湛江等港口城市；有正在开发的南海油田。人和，华侨之乡，全国的华侨和外籍华人，有半数以上原籍在广东，约一千三百万人；他们当中财力雄厚，有大批科技人才，华侨爱国，尤其爱家乡，这是我省最突出的优势。

“天、地、人”三个方面的优势，是固有的，是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这三个方面优势得到初步发挥，今后怎样进一步发挥广东的固有优势，必须在对外开放上作文章。如何进一步发挥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特殊优

势，这是研究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广东开展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加快广东经济发展的可靠基础。

我们面对国内国外两种市场，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金、两种资源、两种技术。但是，广东对外的条件比其他省份要好些，因此，广东要多利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有利条件，学会更多地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从而加快广东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的步伐，增强广东的经济实力，为广东发展经济奠定更加可靠的物质基础。

四、“对外开放内外结合”是实现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途径

研究广东经济发展战略，把发挥对外优势，实行对外开发政策摆到重要位置，这是正确的。不如此，就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广东优势。我们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加快经济技术发展的步伐，是很不利的。我们要吸取这个历史教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开拓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新途径。但是，对外开放，主体仍然是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方针不能丢掉。我们绝不是依附国际市场，受国际市场摆布。从目前情况来说，如果我们的工业躺在国际市场上过日子，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更谈不上在广东实行所谓“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了。所谓“外向型”的提法并不符合广东的省情。广东的实际情况是：不论市场、资源、资金和技术，都不是单向对外的，而是多向的，既向内，又向外，是内外开放的。对内开放，包括对外地内单位实行开放。当然，内外开放，也要区别对待，有的是以内向为主，有的是以外向为主，从总体上估量，应当是内外开放、内外结合，既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又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样，才能避免在研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的片面性。所以，就“外向型”本身提法来说，是不妥当的；从所谓“外向型”的主要内容来看，“生产和流通主要是面向国外市场”，“以对外贸易为主体和主攻方向”，“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中心”等等，也是不符合广东实际情况的。我们认为，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多在“外”字上作文章，如果离开必要的内部条件，那就是一句空话。因为，我们发展对外经济活动，是不能企求别人的恩赐，而必然是依靠双方平等互利为基础。捐赠活动历来就有，但是，发展国民经济不能也不可能依靠捐赠过日子。我们认为，只有具备充分的内部条件，才能实现多在“外”字上作文章。只讲发展对外贸易，不讲内部条件，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所以，实行“内外开放，内外结合”是一项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途径。

从组织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来说，实际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离开内外开放、内外结合多在“外”字上作文章，必然是寸步难行，一筹莫展。例如，“三来一补”，原料是进口的，商品返销国外市场，这可以说是“外向”为主了。但是，它也不能离开内外结合的原则。因为，厂房是国内的，工人的穿衣吃饭和其他日用消费品要靠国内提供：光有人，没有粮食，连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办不成的。又如，引进外资，配套工程要国内资金，能源、交通要国内提供，商品销售市场也要国内提供一部分；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也

离不开国内条件。只有内外开放、内外结合，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至于说到发展出口贸易，更不能离开内外开放、内外结合这个原则。发展出口贸易，就是输出大量商品，换取大量外汇。广东出口商品换取的外汇，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作为地方留成，归地方使用。从一个省来说，进出口贸易是大量出超的。在大量出超的情况下，企业再生产的物质补偿从何而来呢？本来，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这部分物资供需应当由国家统一平衡。可是，事实上，国家只是安排其中一部分物资供需平衡，还留下一个缺口。为了弥补这个缺口，最后就会表现为货币的区域性的过量投放和区域性的物价上涨。因此，发展出口贸易，必须坚持内外开放、内外结合的原则。出口贸易坚持内外结合，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从再生产的物质补偿来说，区域性的出超，补偿物资的缺口要由国内平衡；二是从再生产的价值补偿来说，不利于竞争的商品要限制出口或不让出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广东应当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内外开放内外结合的开放型的发展战略。所谓内联、外挤或者内联、引进、外挤，它的基本意思也就是指实行内外开放内外结合的开放的发展战略。实行这样的发展战略，既能发挥广东优势，又能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而任何发展战略的选择，都不能离开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这个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则。

五、政策体制是实现广东开放型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

根据广东近几年的实践经验，实现广东开放型发展战略，实行“迎头赶上”的战略对策，必须以“八字”方针为前提条件，这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十个字适用于全国，在广东又加上“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八个字。近几年广东执行“八字”方针，一方面对省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另一方面中央又决定在对外开放政策问题上放宽了一些政策，包括试办经济特区。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初步发挥了广东的优势，主要是发挥了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的优势，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推动了部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使这些地区的技术面貌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是，要进一步发挥广东经济优势，实现广东开放型发展战略，必须继续全面落实“八字”方针。在对外开放方面，要进一步解决五个方面的政策问题：

落实华侨房屋政策，进一步做好华侨工作。广东省仍须退还的华侨房屋数量不小，若按原来办法，要几十年才能全部解决。为了早日全部退还华侨房屋，落实华侨房屋政策，要考虑调整原来办法，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比如，在现行侨汇地方留成上，在一定的时间内，给侨乡所在市适当增加侨汇留成比例。

利用外资侨资政策。沿海港口城市引进外资也要放宽政策；华侨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而且在国外有广泛的联系，我们应当采用更加优惠的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因此，要制定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优惠办法，比如，在税收政策上要给予更多优

惠，在商品内销方面也要根据不同情况给予适当优惠，在出入境方面给予方便，等等。

市场政策。现在国际上最紧张的是市场问题。外国人特别看重我国的市场容量大这一优势。我们这几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最大的问题是市场问题，即商品返销比例的问题。由于我们对市场政策卡得过紧，有些外商不大愿意同我们合作，尤其是不愿意把先进技术拿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又往往发生这样的矛盾现象：我国建设和生活需要的一些短缺商品，我们还不能生产，或者生产的数量不多，不能满足需要，一方面需要进口，另一方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生产的这些商品却不允许内销，或者内销比例定得过小。所以，不调整市场政策，先进技术就不容易进来。看来，调整市场政策，将有利于更快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当然，国内市场是个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也要采取辩证的方针。从发展趋势来说，我们要实行“引进”与“外挤”的方针，要先“引进来”，后“打出去”。但是，先“引进来”也不是无条件的。要真正引进新的先进设备，也不能说国内市场一点不让。对于一些先进设备而与此相联系的商品又是国内市场需要的，我们采取以市场换先进技术的策略，仍然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政策。

金融政策。现在广东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不办理境内居民外币现钞储蓄业务。这个金融政策不利于利用筹集居民的手持外币。在广东居民中手持的外币数额不少，怎样筹集和利用这些资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看来调整金融政策不失为一种较好办法。例如，允许境内居民外币储蓄，存取自由，存的是外币，取的也是外币。

劳动力政策。我们劳动力剩余，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很多。怎么办？一是发展劳务出口，对自愿到国外就业的，可以采取鼓励政策；二是出国给予方便，出国的人还是爱国的，出国以后还会有侨汇，还会关心和帮助祖国搞现代化建设。因此，适当地放人出去，对我们的“四化”是有利的。

实行进一步对外开放政策，一定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进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要开创新局面，要新事新办，跳出现行经济体制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老框框，可以参照和推广特区体制的一些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是对内搞活经济。要搞活经济就要抓经济体制改革。领导者肩负为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和排除障碍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个历史重任，一要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二要以坚强的毅力和魄力抓经济体制改革。这也是研究经济发展战略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论奖金的性质、职能与经济效益

丘舜平

恢复奖励制度以来，我省以奖金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量迅速增长。据统计，我省工资总额中的奖金，1979年为3.81亿元，而到1982年达11.22亿元，1982年比79年增长2.89倍。1980~1982年奖金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0.22%。奖金在工资总额中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8.16%上升到1982年的17.55%。

必须肯定，近几年来奖金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和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对奖金的性质和职能等有关问题，在理论上认识还不统一，实践中有些关系又未能妥善处理，加上奖励制度还不完善等种种原因，实际上有些部门奖金差不多变成一种生活补贴，致使奖金的积极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一些单位甚至出现滥发奖金的现象。总的看，奖金的经济效益不理想。奖金成了众人关心的问题。为了统一认识，充分发挥奖金的积极作用，很有必要就奖金的性质、职能和经济效益等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希望能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一、奖金的性质及其理论依据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是社会主义奖金，一切前提和出发点都是以社会主义为条件的。我们探讨奖金的性质更是以此为前提。

实行奖金奖励制度，不从理论上明确奖金的质的规定性，就很难确定其量的合理界限，在实践上就容易产生各种偏差。多年来，正是由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认识，使实际工作部门感到缺乏统一的行动准则。关于什么是奖金，目前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奖金是对劳动者取得劳动成果和作出贡献进行嘉奖和鼓励的物质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奖金是对劳动者为社会提供超额劳动的劳动报酬。我认为是对超额劳动的报酬；但是所采取的是嘉奖形式，而不是一般工资报酬形式。

既然奖金是奖励超额劳动，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超额劳动，一些人认为超额劳动是一种外延量，即是劳动者由于延长劳动时间或增强劳动强度，而超过定额的劳动增量；另一些人则认为超额劳动是一种内涵量，即是劳动者由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或增强劳动的有效性，而超过定额的劳动增量。我认为上述两种劳动增量都属于超额劳动。如果以劳动时间作为劳动量的衡量尺度的话，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从投入的角度

考察，是绝对增加劳动量，后者则主要从产出的角度考察，并考虑过去投入劳动量（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增强劳动有效性，同样需要付出劳动），劳动者以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高效率劳动，从而相对增加劳动量。我们必须从投入与产出统一的角度来考察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总劳动量。也就是说考察劳动量必须同时考察劳动的有效性。因此，我们可以把超额劳动定义为：是劳动者由于增强劳动强度或增强劳动有效性，而为社会提供的超过定额劳动的增量。

关于超额劳动的第二个争论是，以什么为标准划分定额劳动与超额劳动的界限问题。这亦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应按工资等级分别确定劳动定额，并以此作为划分界限，即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总劳动量，扣除了与自己的工资等级相对应的定额劳动后有剩余，才算提供了超额劳动；另一些人认为实际上很难按工资等级分别确定劳动定额，只能制定平均劳动定额，这种统一的劳动定额是划分定额劳动与超额劳动的唯一界限。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工资制度来说，确切地说，前者适合于等级工资制，后者适合于无等级工资制。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等级工资制，从理论上说前者比较适合目前的工资制，但在实践上后者比较易行。因此，今后如继续实行等级工资制，实际工作应逐步由后者向前者过渡。

为什么对超额劳动的报酬，要采取奖金的形式，而不同样采用一般的工资形式呢？

第一，从超额劳动的特点及其报酬要求看。从整个社会看，劳动者的超额劳动是比较难把握控制的变量，要事先测算核定一个近似报酬量比较困难。超额劳动富有弹性的特点，客观上要有一种较灵活的报酬形式与之相适应。从劳动者来看，是否提供超额劳动也是不确定的，既受本身技能发挥程度的影响，又受定额水平的影响，还要看社会是否需要。总体上说，社会希望投入尽可能少的劳动量，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但超额劳动不一定多多益善，对于超额劳动社会不是无条件鼓励的。我们重点鼓励的是通过增强劳动有效性而提供的超额劳动，这就提出了对超额劳动的报酬，作特殊处理的客观要求。具有明确目的性的奖金能够反映这种要求。

第二，从劳动报酬的工资形式看。目前，我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主要形式是工资。国家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水平，一般已事先确定，且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国家确定工资水平的劳动量依据，主要是定额劳动。这就会与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浮动的特点不相适应，往往造成劳动者应得报酬量与实得报酬量之间存在一个差额。奖金这种报酬形式，能有效地调整这个差额。有人提出，只是针对计时工资才产生这个差额，计件工资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实行计件工资的单位，奖金就没有存在的根据了。事实并非如此。计件工资也存在劳动报酬与劳动有效性脱节问题，致使劳动者的应得报酬与实得报酬之间，同样存在产生差额的可能。譬如，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原材料消耗多少，机器设备磨损和维护程度如何，对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影响，计件工资很难及时准确地反映和控制。有些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后，出现废品率升高，产品质量下降，原材料利用率降低，靠拼设备上产量等现象，就反映了这类问题。实行计件工资的

单位，同样有必要应用奖金这个杠杆来发挥调节作用。

还有人提出，今后我国工资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浮动工资制，是否仍需要奖金这个补充形式呢？浮动工资的特点是将劳动报酬直接与劳动成果挂钩。但是，在现代化连续生产的条件下，随着分工细化，和生产过程连续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要对劳动成果分环节、分个人考核，在许多企业已不可能，而只能考核其最终综合成果。报酬对象是个人，而成果对象是集体，这样报酬对象与成果对象之间便发生了矛盾。因此，浮动工资很难直接具体落实到个人，企业仍需要有诸如劳动定额这样的标准为依据，才能将浮动工资总额最终分配落实到劳动者个人，实行浮动工资并不排除超额劳动。

从工资形式考察奖金存在的必要性，更主要的还不在于某种工资形式是否存在某种不足而需要奖金形式作补充，而是工资形式的差别并不能否定定额劳动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超额劳动报酬的特殊性，超额劳动并不随工资形式的改变而消失。

第三，从奖金的职能看。可以说奖金的职能，就是一种物质的鼓励。通过这种物质鼓励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增强劳动的有效性，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多作贡献。所以列宁曾一再强调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代，……没有奖金是不行的。”^①要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除了我们坚决执行生产宣传以外，还要采取另一种影响方式，即实物奖励。”^②所以，它不是增加附加工资所能替代的。

二、奖金的经济效益及其提高途径

奖金的经济效益要从两个方面衡量，即既要看看其是否促进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要看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发展。能否达到这双重目的，关键在于奖金支出所引起的社会财富增长率变化方向，和增额社会财富在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是否合理。如果劳动者为社会提供超额劳动，没有相应给社会创造增额财富，奖金就没有来源。但是，有了增额财富如果全部直接分配给劳动者个人，则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发展。在增额社会财富分配上，同样必须妥善处理好长短期利益的关系，也就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超额劳动创造的增额社会财富，要在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之间作合理分配，同样要使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但是，近几年来这个关系处理得不好，奖金的经济效益不高，未能达到有效地刺激生产发展，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更没有很好促使长线产品减少短线产品增加，有效地增加国民收入。1980年至1982年，我省奖金年平均增长50.22%；人年平均奖金增长11.50%；而同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只增长14.65%；工农业净产值年平均只增长15.62%；全民所有制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只增长3.22%。奖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不断上升，该比重，1979年为1.76%，1980年2.44%，1981年为3.58%，1982年为3.97%。可见，奖金的总职能在削弱。

导致奖金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1.奖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始终未能制止，甚至更加突出，奖励条件重表现，轻成果，无计量；2.奖

励面过宽，不是奖励超额劳动成绩显著者，人人有分的结果导致一些人形成“多奖多干，少奖少干”，既没有发挥奖金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作用，甚至没有达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目的；3.过分强调奖金改善职工物质生活的作用，把奖金作为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差额的补充，自觉不自觉地把奖金与物价挂起钩来，对奖金职能的认识具有片面性；4.对奖金发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从数量控制出发，而不是从完善奖励制度和奖励办法入手，以致老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5.奖金来源渠道多，控制方式不妥，造成奖金失控。可见，采取相应的对策，解决奖励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奖金经济效益是当务之急。我认为出路在于：

第一，健全奖励制度。合理的奖励制度是提高奖金经济效益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适当的奖励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③三十多年来奖励制度几起几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完全正确。那么，奖励制度要有利于保证奖金经济效益的提高，有什么要求呢？我认为“适当的奖励制度”要朝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健全。

1. 奖励制度必须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要贯彻“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④列宁对此也曾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对于发展经济的任何成绩，也应当比较经常地用劳动红旗勋章和现金予以奖励。”^⑤社会主义社会对劳动者的奖励，之所以还要有物质的内容和形式，是因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⑥所以“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⑦“精神鼓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这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⑧

2. 奖励制度必须明确奖励对象，严格奖励条件。奖励制度中应明确规定奖励对象，应是那些劳动表现突出，提供了超额劳动的成绩显著者，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要“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⑨必须坚持“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应该搞得更好一些。”^⑩的按劳分配原则。在严格奖励条件的同时，要逐步解决得奖标准计量化问题。

3. 奖励制度必须明文规定有奖有罚，奖罚分明。

4. 奖励必须实行考核制度，而且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经常的。国家要加强对企业的考核，企业要加强对职工的考核，考核办法与标准必须列入奖励制度，使考核工作制度化、正规化，并且应把考核的重点放在劳动贡献上。

5. 奖励必须与劳动成果以及社会经济效益挂钩。

第二，完善奖励办法。首先要妥善处理好劳动报酬与消费品物价的关系，将工资与物价挂钩，使奖金与物价脱钩。劳动报酬与消费品物价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必须慎重而又妥善地处理，否则不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合理改善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但把奖金作为处理这个关系的媒介，实践证明弊多利少，一方面由

于奖金水平受限制，无法完全解决物价变化对人民生活水平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奖金的奖励职能，使其特有的积极作用难以发挥。因此，奖金必须与物价脱钩，取而代之的应是工资与物价挂钩。

其次在实现了奖金与物价脱钩的基础上，对奖金实行两级控制，国家以企业为对象，奖金与社会经济效益挂钩；企业以职工为对象，奖金与劳动定额、劳动成果挂钩。国家对奖金必须有所控制具体可分两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国家对企业要有控制。在这一层次，国家对企业的奖金宜采取相对比例控制，绝对水平浮动不封顶的办法。这主要解决企业奖励基金的合理提取形成问题，同时也涉及奖金来源问题。国家要把握住积累与消费的合理比例关系，保证社会提取的实现。劳动者给社会提供的超额劳动也要作了适当扣除后，才能获得报酬。这个扣除比例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此，用这个比例控制是合理的。同时，由于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劳动量是一个变量，在扣除比例既定的前提下，由此求得的绝对额必然是浮动的。但是，由于据此提取的奖金，可能突破消费资料增长允许界限，故国家应制定奖金税法，对超过一定界限的奖金征税，以调节控制奖金增长水平。采用这种控制办法，既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也有利于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相对稳定。

第二个层次，企业以职工为对象进行控制。在这一层次，奖金与劳动定额、劳动成果挂钩，企业对奖金的分配进行控制，将按上述国家控制下形成的奖励基金，以科学合理的定额为前提，采取记分考核的办法，按分值奖金率乘每个职工的得分计分发奖金。

上述办法的基本思想是，国家主要把好奖励基金的提取形成关，企业主要把好奖励基金的分配使用关；控制标准不应是某一绝对额，也不应是工资基金的某一比例，而应是超额劳动成果的一定百分比。而且奖励基金占超额劳动成果的比例，不一定要与工资基金占定额劳动成果的比例相等，可视具体情况而适当调高或调低，但调整权应由国家统一控制。

第三，全面发挥奖金的职能作用。奖金的总职能前面已经提到了。但其总职能要通过三个具体职能来实现。这些职能是：报酬职能、激励职能和引导职能。过去在实际工作中比较重视其中的报酬职能，而比较忽视后两种职能。而实际上奖金的目的性、灵活性主要要靠后两种职能实现。提高奖金的经济效益，必须全面发挥奖金的职能作用。

首先，从报酬职能看。奖金的报酬职能是由奖金的性质决定的，目的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的要求，补偿劳动者的超额劳动消耗，同时达到提高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目的。要充分发挥奖金的这一职能作用，在实践上关键要划清定额劳动与超额劳动的界限。

其次，从激励职能看。所谓激励就是指对有组织的人群进行促进，即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转变或满足劳动者的动机，以激发他们的劳动意愿，其实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激发和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把它称作“是使一种欲望或目标得以实现的动力和努力”。^①奖金行使激励职能，意义在于与报酬职能相配合，保证

和促进劳动者不断地扩大劳动成果，创造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保护那些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劳动中去，表现突出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劳动者的切身利益，鼓励人们努力增强劳动的有效性。

要通过强化奖金的激励职能，达到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目的，必须正确认识以下几点：1.奖金不是决定工作成绩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它主要是激发人的工作能力的发挥；2.要使通过奖金激发起来的积极性对完成工作任务产生效力，必须给被激励者分配合理的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工作任务；3.奖金对劳动者激励作用的大小，不完全取决于奖金数量的多少，更重要的在于奖励的合理性，及其劳动者的能力与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的协调性；4.奖金的可得性与得奖后的满足感，对劳动者的积极性可能会有副作用。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劳动者努力工作的动机，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最后，从引导职能看。这是激励的派生职能，主要是指按照一定的奖励条件控制劳动者的行为，并对其努力方向加以引导。奖励制度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奖励方式，确定不同的激励重点，从而达到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努力方向加以引导的目的。如为了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鼓励生产优质产品，设立质量奖，以重点鼓励一贯保持优质高产和在提高产品质量上做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设立发明奖以奖励发明创造，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设立技术改进奖，以鼓励群众改进技术的积极性；设立合理化建议奖，以挖掘广大职工群众的智力，鼓励职工关心集体的精神；设立安全奖以促进文明安全生产；设立超产奖以鼓励人们增产增收；设立节约奖以鼓励职工降低燃料动力和原材料消耗等等。这些奖金的侧重点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即把人们的努力重点引导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使劳动者的努力有的放矢。企业必须通过建立合理的奖金结构，把奖励的重点放在生产的薄弱环节上，以推动职工想方设法突破生产薄弱环节。然而，现实中往往由于这些环节问题多，越是薄弱环节越难得奖。相反一些余力环节反倒得奖容易，结果是奖了余力环节，罚了薄弱环节，使各生产环节之间更加不平衡、不协调。从而未能达到整体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强化奖金的引导职能，坚持目标导向，防止无的放矢。

总之，奖金不是万能的，要强化奖金的激励职能，发挥其作用，必须把引导努力、协调能力、评价成绩、合理报酬、认识动机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和保护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并使劳动者的努力产生效应，从而提高经济效益，而不能只在奖金的数量多少上做文章。

①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8页。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1页。

③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86页。

④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

- ⑤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1页；
 ⑥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20页。
 ⑧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
 ⑨ 同上，第99页。
 ⑩ 同上，第136页。
 ⑪ [美]哈罗德·孔茨和西里尔·奥唐奈合著：《管理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652页。



“异乎三子者之撰”集讼拾得

倪祥保

《论语·先进》“异乎三子者之撰”中“撰”字的训释，由来各异。郑玄释为“善”；孔安国释为“才具”（王力《古代汉语》同）；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撰，述”。这三种有代表性的诠释，皆值得商榷：“善”作为道德观念，在这里不应有“异”可言，且说“不同于……之善”，也不合语法逻辑。故郑说失之。通观前文，“三子者之撰”实指三子之志向（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主此说），并非其才具。所以训“撰”以“才具”颇嫌牵强。朱东润训撰以述，殊不知“撰”单用当“述”讲是用于“属辞纪事”的（先秦尚无此用例），即从手写而非从口说的，所以其解亦难成立。

“撰”，我们以为应训之以“选择”或“备具”。兹辨正如下：（一），“撰”在《说文解字》中没有直接的训义可考。《六书通》指出：“撰与颀、叩同，士恋切”。据《说文解字》曰：“颀，选具也，从二页，士恋切。”“叩，二叩也，巽从此，阙。士恋切。”“选，遣也，从辵巽。巽，遣之，巽亦声，一曰选择也，思沈切”。可知《六书通》观点可信。故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一百四十三页上并列“叩”、“巽”、“选”三字之注，且云：“在选字下所解释的巽的义项，实际上是对叩、巽二篆说解的补充”。语言事实也证实“撰”与“选（選）”声旁相同，义可相通。《庄子·德充符》：“天选之形”。闻一多《古典新义》释：“选与撰通”。《礼记·内则》：“肉曰脱之，鱼曰作之，枣曰新之，栗曰撰之”。郑玄注：“皆治择之名也。”因此，“异乎三子者之撰”可训“不同于三子者所选择的”之意。这样解，通于义训，足于文意。

科学技术与经济效益

李 万 忍

力争翻两番的前提，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力争翻两番的关键，首先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那么，“前提”和“关键”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怎样打开关键，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呢？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反映客观事物的任何科学概念，都有其特定的质的规定与量的规定。经济效益概念的质的规定，主要是指产值中的净产值部分（或日净增值），即生产产品的投入值，同产出值比较，后者大于前者，取得了净产值，就叫取得了经济效益，两者的数量反比率越大，净产值就越多，经济效益就越好。在投入值中，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是主要的制约指标。我们通常说的“成本”这个概念，则是物质消耗与劳动消耗的货币表现。从这一点讲，投入值也可以简明的用“成本”这个概念来表达。在产出值中，既包括成本，也包括新增值。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效益概念的实质是指：产出值减去成本以后的净产值。所谓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就是要不断降低成本，提高净产值的增长率。经济效益概念的量的规定，幅度比较大，主要指净产值的有无与大小。从质的规定与量的规定的辩证统一来说，净产值越小，经济效益就越差；净产值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净产值如果达到了现有生产能力的最高技术指标，就叫取得了最佳经济效益。

把经济效益概念的规定性搞清楚，不仅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把长时期不重视计较净产值多少的思想，转变到重视净产值的增长，力争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而且，有助于我们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正确对待和处理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

经济效益的提高，是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协

调发展，共同努力的综合体现，其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的工作有误，都可能影响整个效益的提高。然而，由于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以及两者内在联系的新特征，决定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最大制约因素；最根本的提高途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技术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因素。现代生产力发展已主要是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益的诸因素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比重不断提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只有5%—20%，现在，已跃升到60%—80%了，有些产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则高达90%以上，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也反映了这种情况。据有关部门调查分析，在促成生产高速发展的诸因素中，科技进步的因素占到71.4%。这说明，经济效益的提高，60%以上取决于科技进步。如果说，在上一世纪，经济效益的取得，主要依靠增加投资和设备、增加劳动人员和劳动时间的话，那么，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则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了。

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一旦用于生产实践，就会变成强大的生产力，使产量产值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1982年10月，国家公布的13项科技成果，每年创造财富30亿万。其中，籼型杂交水稻良种的推广，每年增收8亿元；攀钢的钒钛冶炼工艺的发明应用，每年给国家上交利税金1亿3千万元。这13项成果的效益，仅仅是千百项科研成果的一部分，却足以说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提高经济效益的巨大作用。

三、从科研投资与科研效益的比较看，真是一本万利。山东省科委1981年安排的棉花、花生、大豆、玉米四种作物科学试验田，在20多万亩耕

地上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应用研究，共投资24万5千元，其增产效益高达684万8千多元，平均每1元的投资当年收回28元。江苏省徐州地区农科所，先后取得科研成果110项，其中，甘薯、小麦、棉花、花生、大豆等10个优良品种，到1981年累计推广面积2亿多亩，共增加收益19亿元，相当于国家给这个所投资总额590多万元的322倍。

科学技术为什么能够成为提高经济效益的最大制约因素，最根本的提高途径呢？

（一）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提高人力素质，减少活劳动消耗的基础。

在包罗万象的国民经济结构中，生产力结构是决定性的结构部分。贯彻八字方针，首先使生产力结构合理化，是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的前提，而在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人力素质的提高，对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经济效益的增长，起着决定的作用。

人力素质的提高，依靠于智力的开发与进步。现代化大生产，对人的智力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钱学森同志主张把生产力的第一个要素增订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智力和知识的劳动者”。这个主张，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对劳动者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劳动者不具备一定的智力和知识，就不可能实现今后和二十一世纪初的现代化大生产。

科学技术是人创造的，它是人类同自然界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反过来，人类要在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方面有所进步，作出贡献，又必须首先掌握和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知识，因而，科学技术又成了人的智力开发的基础。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人力素质，才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消耗，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上海市手套行业，过去以手工生产为主，1958年以来，先后进行了四次重大的技术革新，由手摇脚踏发展到半自动化，进而又发展到全盘自动化，现在有的工厂已经采用电子计算机群控。技术工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使企业素质，特别是人力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劳动量不断减少，产品量不断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据1981年统计，全行业的职工人数由7500人，减少到2000人，年产量却由71万打，增长到602万打。这就是说，劳动人员减少了73.3%，产量却增长了8倍。

（二）科学技术的进步，日益扩大着原材料的利用范围，同时，又不断地减少着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耗。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又一决定性因素。

1.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广泛勘探自然资源提供了省钱、高效的科学方法。近几年来，我国运用地球科学中的化学探矿方法，为开创地质找矿新局面所作的贡献，就是一个典型实例。有一个具有金矿和钨矿远景的地带，几年来在近2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几十个矿化点，但一直未能找到最有价值的矿床。使用了化探方法后，很快辨认出几个数十平方公里的区域性金异常，仅对其中一个作了详查，就找到了一个大金矿，为经济建设的急需作出了贡献。再如近年来我国利用遥感技术勘查资源，速度快、省钱、准确、收益更大。

2.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扩展了可用性材料的范围，使许多过去不可能得到的、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能够人工合成出来了。这不仅满足和适应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物美价廉，经济效益显著。现代科学技术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深入到了对物质微观结构的分析和宏观性能的利用，因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性能优异、用途广泛的有机高分子材料和硅、锗等半导体功能材料。如果没有象半导体这样的性能优异、小巧可靠、用途宽广的功能材料，那么，现代化工业生产，特别是新兴的宇航与火箭技术、电子工业、自动机具制造业等，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高度发展，更谈不上什么新的产业革命了。

3.科学的进步，技术的革新，大幅度地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耗。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定额（简称“单耗”），是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据技术经济部门统计，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中，物质消耗占70%，社会产品中，物质消耗占50%以上。我国工业产品的物质消耗高于这个水平。据调查，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工业消耗的物资费用，占总成本的80%—85%。其他地区大同小异。在物质消耗定额中，综合能耗量与原材料消耗量，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实践经验证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是扭转高消耗，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益的关键。我国石化工业乙烯生产，由于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的单系列规模（万吨/年）扩大了近

9倍，而原料油的消耗却减少了24%—47%，耗电量减少了96%，耗钢量减少了84%。这就大大降低了投资总额，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4. 依靠科学技术开展综合利用，提高了资源利用率。物尽其利，以深度加工为基础；深度加工，以生产规模的大型化为前提；生产装置大型化，则是多学科技术工艺综合应用的结果。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全面发展，为物质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最大可能。例如，石油化工的核心——乙烯装置的最大规模，四十年代为10万吨，现在已发展到50万吨了。由于技术装置大型化，所得的基本有机原料以及中间体，就有近100种之多。用这些原料生产的塑料、合成橡胶、纤维、医药、化肥、农药、染料涂料、合成洗涤剂最终产品，那就更多了。其经济效益之大，远非把石油仅仅作为动力燃料所能比拟的。再如，采取沸腾燃烧新技术，不仅可以提高煤的热效利用率，而且可以使各种劣质煤种中的热能得到充分发挥。四川省一个年产100多万吨原煤的老矿，坑口电厂装机容量为9500千瓦。近矿发电煤方便，全吃细粮优质煤。结果，资源浪费很大，每度电的成本比国家电网的高4倍。这个矿每年还出煤矸石90万吨，大部分的发热量在1000—2000大卡以上，却不能为发电作出贡献。经过技术革新，把原来只能烧优质煤的4台锅炉，改成以烧劣质煤为主的沸腾炉，并试验成功了沸腾炉快速点火启动新技术，效果越来越好。几年来，该矿利用低值燃料50万吨，节约好煤30万吨，盈利1千多万元。可见，以新技术为先导，才能做到煤尽其能，效益倍增。

(三) 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挖掘生产潜力，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捷径。

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况，决定了必须走技术改造、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近40万个企业，300万台机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国经济实力之所在，为实现战略目标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应该看到这几十万企业中的绝大多数的技术条件已经落后，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急待以新的科技成果，进行改造。例如，现有的2万多种机电产品中，性能落后，急需更新或淘汰的，约占60%；轻工产品中，70%以上是

五六十年代的水平，20%左右还是三四十年代的水平；全国重点企业中，主要产品的质量指标有43%、原材料消耗指标有55%，都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些情况，说明了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厚实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又急需进行技术改造、更新；既有改造的必要，又有改造的可能。

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以内涵为主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力的客观特点决定的。高度发达的现代生产力，它的生产设备、生产材料、工艺流程，都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这就是说，社会生产力是科学的物化，而科学技术则成了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最活跃的、不断增长着的要素。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进步程度的较量。可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的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了。一方面，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有生产设备、技术、工艺的老化周期加快了，因此，必须及时地以新的科技成果更新生产条件、技术装备和产品结构，才能保持生产设备的年轻化，保证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在现代，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途径，已不再是单纯依靠生产规模的量的扩大，而是主要依靠内涵的革新和发展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成果的应用。现代生产过程本身的这些客观特点，说明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是改革生产结构、提高企业素质、实现扩大再生产、增加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

以发挥内涵为主，走技术改造的路子，为什么会见效快、收益大？主要的有利因素之一是：可以充分挖掘、利用企业的现有设备的潜力。认真研究人类劳动资料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一些普遍特征：①任何一种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都是在原有生产工具的基础上，经过一部分一部分的多次变革，最后才使生产工具的时代效能产生质的变化。②不仅旧的生产设备需要改造，就是以最新技术成果新建的生产设备，也需要在建成之后继续改造。今天是最新的，明天、后天就不新了，如不改造，就会失去时代的效能。从以上两点的意义来说，保持生产设备的年轻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本身的永恒要求。因此，不断的对生产条件进行技术改造，是人类劳动的普遍特征。我国现有的40万个企业的设备中，缺乏改造基

础、需要直接淘汰的，毕竟只占一个较小的比重，而绝大部分可以通过改造，大幅度地提高生产能力，提高经济效益。根据一些企业的实践经验，只要对主要技术条件（或曰“关键设备”）进行技术革新，就可以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几倍几十倍地提高经济效益。有一个色金属公司电解镍车间，他们不中断生产、不减少产量、不伸手要国家的资金，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进行技术攻关，使这两项主要生产条件有了突破性改进。在不增加电解槽子（设备）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现有设备（包括各种辅助设备）的潜力，使生产能力提高了50%，等于新建了一个年产5千吨的电解镍工厂；11种定额材料的消耗，全部下降，特别是纯碱、硫酸、盐酸、氯气的单耗，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了14%、15.7%、15.9%、13.7%，唯有电耗增加了0.7%，而吨镍的总成本下降了7%。这个事例说明了，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是投资少，见效快的一个捷径。

（四）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企业、行业、部门、地区而至整个国家生产经营和经济活动工作的管理效能和效益。

企业生产力的各要素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生产活动，所以，管理也是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电脑的应用，给企业的

组织管理提供了更为先进的条件和手段，不但能对生产手段更有效的控制和监督，对原材料的利用提供更准确的数据和方案，而且更能对劳动者实行更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总之，能将各种生产要素更协调地更合理地组织起来，使生产和经营的组织管理工作更有效能更有效率。

现代生产力不但是企业内的各生产要素的结合，还要有企业之间、部门之间的社会的综合经济活动。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重视发挥整个社会生产力体系的力量，增加社会生产总量，提高宏观经济效益。而这就必须充分利用新科学技术成果，改革落后的通讯、运输、储存和统计等等物质条件，为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环节都提供先进的工具和手段，改进整个社会经济的组织管理工作，使整个宏观经济活动更有组织性，计划性，提高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效能和效率，从而，大大提高整个宏观经济效益。

总的说来，先进科学技术的利用，提高企业的素质，改进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物质条件和手段，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整个国家经济组织管理的效能和效率，从而提高微观的和宏观的经济效益。



西魏之亡当在何年

宦荣卿

西魏灭亡之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几部影响较大的史学著作，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均作557年；一些也具有相当影响的工具书，如万国鼎编《中国历史纪年表》、河南省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年表》、《辞源》的“南北朝”条下所列“南北朝表”、《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词典》附录的《我国历代纪元表》则作556年。

二说歧互，孰是孰非？征诸史料，不难作出判断。《周书·帝纪第三》于“恭帝三年”下曰：“魏帝（即恭帝元廓）……庚子，禅位于帝（即周孝闵帝宇文觉）。”又《北史·魏本纪第三》曰：“十二月庚子，帝逊位于周。”可见西魏灭亡的确切时间在

恭帝三年十二月庚子。诚然，恭帝三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公历556年之内，但是即凭常识亦可知阴历十二月总要延至公历次年之岁首。查《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是年十二月庚子果为公历557年2月14日，此足证556年之说是错误的。

《辞海》之“西魏”条虽然在西魏的起讫年上没有发生上述讹误，但该条释文之末云：“（西魏）共历三帝，二十三年”似可商榷。西魏从文帝大统元年春正月戊申（公历535年2月28日）至恭帝三年十二月庚子，严格说尚不满二十二年，尽管以二十二年足其数是无可厚非的，而二十三年之说终究欠妥。

及早准备，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

——我省部分专家座谈发言摘要

目前，世界正兴起着一场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讯息技术，生物工程，激光、光导纤维和海洋开发等新的技术革命，这对我国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广东省应如何利用这一个机会和迎接这一挑战？三月二日，广东经济学会和广东技术经济及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联合邀请在广州市的部分有关专家举行了一个题为“世界新的工业革命和我们的对策”的座谈会。会上同志们踊跃发言，积极献策。我们现将部分发言摘要发表，供进一步探讨这一经济战略问题参考。

张 俨(广东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

现在，新的产业革命的浪潮拍击我国，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顺应正在兴起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根据我国国情和省情，有可能越过第二、三次产业革命的某些路程，使我国提前进入世界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先进行列。

但是，我省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教育事业、工农业基础、科研和经济体制以及财政资金等，不能全面适应这个变革。空间工业、海洋开发没有基础，不是我省的力量所能兴办；激光、光纤通讯技术力量微弱；信息技术开始起步；电子微电子器件的研究和生产，品种少、质量低、成本高、规模小、技术落后；生物工程目前在低的领域有些成就，尚须向高级、深层的领域开发。总之，新的产业革命所复盖的科学技术领域，作为一个省，不能全面出击，要择善而行，充分运用我省有利条件，有预测有计划地改变不利条件，为新的产业革命的某些领域在我省的成功开辟道路。

按当前我省情况和需要，着重发展电子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现代通讯、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的某些方面，较为现实。

电子微电子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各部门，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技术发展的关键。它促进新产品的开发，能源资源的节约，新技术、新工艺的发明，生产、工作效率的提高，工作条件的改善等。例如：机械工业是装备其他产业的工业，我省机械工业要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必须研制或引进电子微电子与机械相结合、效率高、产品质量好、节省能源资源的新设备，如数控自动机床、产业机器人、先进的通讯设备、微机控制的生产设备等，来改造传统工业，大大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

信息是社会活动（科研、生产、管理等）的一种重要资源。信息是影响生产力、竞争力、管理效能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很需要建成为国内外经济、市场、科技等信息灵通的地区。开发信息技术，用电子计算机组成信息网络，储存、加工、传递、处理信息，形成新兴产业，在我省尤为必要。

为了发展电子微电子技术和信息工业，而我省财力不足、人才缺乏、技术落后，其中人才又

是诸因素中最关键的。应以优惠条件大量引进人才，吸收外资、侨资，进行合作、合资开发；引进关键设备部件及其专利、专有技术、图纸资料等软件；超越先主攻元器件研制这一关，进口元器件，在国家或我省之元器件科研生产突破质量成本关后，逐步元器件国产化；同时大力培训自己的人才，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外更加开放，对现有科技人员给予知识更新的机会和条件，为新的变革开发智力资源。

在全省范围内改革科研机构及其体制，使科学研究机构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结构的变革相适应，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于重点发展行业和课题的攻关，并在工矿企业普遍建立规模相适应的科研、信息机构，为新兴产业，企业技术改造、经营管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的开发服务。

面对这样重大的历史性变革的问题，必须组织有关人员深入严谨地进行未来预测研究，提出可靠的符合实际的研究报告，这是处于变革前的基础工作。我省促进这一变革的规划要与国家规划相衔接，互相依存、协调、配合，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不搞本省力量所不能攻克的项目；提倡我省与兄弟省市的合作攻关；确定我省重点开发领域、行业和课题；这些工作不应草率速成，而要有深入、细致、科学的论证。

我省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结构将发生的变革对社会的影响和发展如何，要进行社会科学的预测研究。

在未来预测研究的基础上，制订正确的政策，例如：对外开放政策，劳动人事政策，国际科技交流、人才培养政策，吸收外资、侨资、港资以及海外人才政策，先进技术引进政策，科研成果及其应用推广奖励政策，贷款、贸易、税收、价格、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等等。

加快现有基础工业现代化技术改造的进程，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建立物质力量，在努力消化、吸收、创新引进的先进技术中培训大批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人才，并加强新兴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快科研和技术队伍的成长。

叶春生（广东省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

技术与经济的关系从来是互相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关系。通常是经济上的需要向科技提出新的任务，而新的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又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三大合成材料的出现）。当前我国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在于科学技术。但要改变科技落后的局面，就必须把我们的国策建立在重视教育、加强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上。产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三者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不同的提法。只要我国采取开放政策而不是闭关自守、自我封锁，世界性的经济、社会或科技革命的浪潮，都会向我们进行冲击。我们的对外联系和经济发展，只能面对世界的现实，而不能靠我们主观决定的政治口号和行政命令来对付。政治只能引导、启发和影响经济、社会与科技的发展而不能代替它们。因为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其本身的客观规律性。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近年都在大力推广电脑应用。这同电子工业和电脑技术的成就息息相关。但如果缺乏使用电脑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经济、社会条件，就算买回了最先进的电脑，也还是不能发挥电脑作为先进管理工具的作用，到头来只成了一个毫无表情的“大笨蛋”。实践证明，有了先进的工具，还得有人善于使用和维修保养，还得考虑使用这种先进工具能否带来效果，要作投资和效益的对比分析。任何先进技术能否获得推广应用，都要以应用后是否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为前提。

目前阻碍我们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先进技术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仍然是管理体制的问题。赵紫阳总理在1982年10月24日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指出：“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有两个根本弊病，一是不能很好鼓励企业关心社会的需要，关心市场的需要，结果是产需脱节；二是不能很好地鼓励企业关心技术进步，结果是大家通常说的‘几十年一贯制’”。赵总理强调指出，必须通过体制改革着力解决这两大弊病。

政策（含对策）和体制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指导来制订的。在错误理论指导下，不可能制订出

正确的政策和采用合理有效的体制。在体制改革当中，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与探索，从一些老旧的条条框框束缚下解脱出来，才能对症下药，找出有效的对策。广东邻近港、澳，面对海外，华侨众多，本身人才、物质条件并不差，但在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方面，却大大落后于形势。交通、通讯、能源和文化教育都成了实现四化的最薄弱环节。

在理论上，我们首先要解决如何正确对待商品、市场和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以及正确对待科学和民主管理的问题。如果说，权力过度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和外行领导是旧体制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仍然要积极地认真地解决。

我们的体制是否改革得合理和有效，最基本的评价标准是两条：

(1) 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得到稳定提高和发展；

(2) 人民(包括各级领导、管理人员、广大职工和居民)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精神是否调动起来并充分发挥，使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

根据中国的环境和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能“急于求成”的，但认为“四化不成”也是没有根据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合理的管理制度和办法。

陈继文(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

要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首先要树立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感。这问题之所以值得我们极端重视，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更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能否使我们经济发展在未来世界经济结构中具有战斗力、能否从经济发展上保证国际力量对比对我们更加有利。从广东省说，这不仅涉及能否实现超过翻两番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准备在全国经济建设上作出多大贡献问题。

在研究我省对策的时候，有几点颇值得分析：

第一：“毗邻香港”的优势指的是什么？从新技术革命角度看，若干香港自身优势并不能转化成为我们优势。比如香港在通讯系统上，确有世界水平，但这没有移植可能。香港有些优势，又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远期优势。比如香港电子工

业适应性强，出口发展快，但主要还是属家用消费品型、或半成品元部件型，对我们近期会起提高附加价值、实现部分机械控制的有益作用，但长期影响如何还有待于香港产品结构的升级度。香港某些方面，则还未形成自己的优势。比如高级的信息产业的产品制造，基础还是薄弱。但是香港有很多优势，却可以帮助我们树立优势。比如香港智力资源雄厚、经营管理现代化、海外市场联系面广、金融方面以安排组合贷款金额计，已成为第三世界金融市场、运输条件优越等等。因此，我们要从战略发展角度，来发挥毗邻香港的真正优势，才能做好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对策，有个较好的战略格局设想。

第二：引进外资与引进外技是否一回事？这当然不能划等号，而且后者远远比前者重要。我们不否定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作经营等方面的短期效益(有些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也不排除这些形式会发展为自料加工、自造出口的可能。但是这种发展没有必然性。在较多情况下，引进外技比引进外资难得多。引进外技是硬功夫，消化、吸收与提高更是硬功夫，其难度比之引进还要大。但是后者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它是在更高的意义上迎接新技术革命。

第三：发挥广州市中心城市作用意义究竟有多大？我认为新技术革命的实质是知识革命，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要用知识力量去实现知识革命(当然是在党的领导下)，这点也是无可怀疑的。广州市是全省技术力量、知识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从迎接新技术革命看，这是最重要的条件。其他诸如地理位置、港澳关系优势、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金融机构与外经贸体制与效率，都很重要，各地也都各自有很多优点。但从引进高级技术看，首先要发挥广州中心城市的作用。

第四：微电脑的推广是易还是难？我认为要消除神秘感，又要防止简单化。从操作层次说，它确实没有神秘之处。但从运用在机器控制与企业管理上说，那就有电子设备与机械结合的问题，有软件能否标准化、通用化的问题，有过去记录整理、未来预测、辅助决策诸层次、如何衡量推广实际效果问题，有如何从点到面问题，有能否联结成网络问题。这是步步都要认真对付的。国外走过的弯路，是管理不适应科技发展，也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没有抓好。所以我认为：推广微电脑以争取“逾越”阶段的起点是必要

的，而防止走弯路、防止欲速则不达也是重要的。

迎接新技术革命，以一个省的地位、人力与财力，和全国全面规划当然不同。这样，对策就会有层次结构，而这个层次的特点是要找出突破口。我认为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既要与中央整个规划相结合，又要发挥本省的积极性。经济、技术、社会的发展要有个总的指导思想，有个总体规划。这是我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要求，是必要的。忽视这种规划而盲目引进，就会重复浪费、产销用脱节、网络无法形成；就会经济损失、影响省市声誉、损害形象，使大投资者裹足不前。但是，除了这方面以外，我们也要积极去认定优势、发挥优势。我们的步子与路子，一定要和沿海省份这个客观条件相适应，和华南经济中心这个地位相适应，和我们省市商品经济较发达这个优势相适应，和科技、智力资源相对地集中这个情况相适应。求全求大、求备求多是不实际的，不迈开步子、创出路子也是不应该的。我们的积极性应摆在要对全国作出更大贡献上，要放在重组与开发智力资源、使之能释放更大能量这个基点上。

第二：既要注意传统工业的补课，又要注意高级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工业优势，要作“产前产期产后”分析——原料与市场情况要重新鉴定，对能耗、资源耗要重新评估——又要从未来战略要求作出评价，结合技术改造的可能，然后对真正的优势加以发挥。这样，我们就可以促进短线平衡、扩大经济效益，为进一步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在这方面，黄德鸿教授等在《广东工业结构对科技发展战略的影响》作了详尽的分析，很值得参考。另一方面，我还要补充新技术革命是崭新概念，要求有新的考虑角度。列宁说过：经济学家要永远向前看，向技术进步看，否则他就会马上落后。按照这个教导，我们还要更多地从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来考虑我们当前部署，否则还免不了按部就班、难于摆脱被动局面。当前集中力量引进几个高级技术项目，比配合南海油田未来开发而形成新的结构怕要有利一些。轻纺工业要发展，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工业的机械设备电脑化，提高自动化程度，增加产值，扩展市场；但如果用这种产业结构来迎接新技术革命，那我们还是在框框内打滚，不利于提高省、市的战略地位。一句话，要着重发展一些高级技术，用新技术产业来刺激与促进技术力量与知识力量的开

发与重组，又用技术与知识去武装高精尖技术产业。这样才能使广东工业真正走上良性循环。这个战略才会踏实可靠。

第三：既要主动制定投资项目，又要做好机动性选择。电子产业无论在元器件、半制成品或制成品层次上都有一系列开发可能。信息产业的高级产品，由于知识产品的知识内容具有积累性、突破性，其项目更是多种多样。通讯系统的产品项目，我们连传统的也落后很远。新材料工业我们更是很多空白点。加上计算机辅助制造那种意义的自动化项目，那就更多了。这会形成一系列的开放投资项目。但是，由于我们接受投资的方式还较刻板，手续又繁杂，通讯、融资、信息的状况还欠理想，让出市场还存在很多技术性问题。所以投资环境虽有改善，但还不够吸引力。加上发达国家在高级技术上各自有其算盘，竞争愈来愈剧烈。所以即使我们能将项目作好宣传，在一定时期内，大概只能落实到一定程度。因此，我们应该调动人民的一切正当海外关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欢迎愿意投资的正当财团商团。要做好这件事，我们要把宣传、接谈与谈判方面都形成各自的专业队伍，把高级科技人员、经济人员推到这些专业队伍中来，既提高队伍的素质，又使他们参与改善投资环境的实际工作。这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方向清楚，选择性更强，扎实前进。

钟玉昆（广州市科协技术咨询顾问、广东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对于我们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广东省应该抓紧时机。从战略观点出发，看我省应借鉴些什么，注意些什么？我认为要抓住主要矛盾，既立足当前当地，又要高瞻远瞩。

那么，我省面临这次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中，什么是主要矛盾呢？从大量信息、情报文献资料说明，这次所谓新的产业革命，不管叫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好，叫第三次浪潮也好，或者称作“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也好。也不管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鼓吹什么观点，不管他们讲得确切不确切，或者他们有其政治上的原因，还有别的什么目的。但都认

为,西方国家在三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达到高度工业化以后,现在要从工业社会转入信息社会,或叫做知识、智力社会。这就是说,这次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核心,是知识、智力。所以有人说这是一场“知识革命”。在未来的世纪,是一个国际性的知识、智力竞争时期。知识已经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哪一个国家拥有雄厚的知识基础,哪一个国家就有可能在这场世界新的产业(技术)革命中获得领先地位。所以智力开发,知识投资、智力投资是这次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带方向性、根本性的战略问题。狠抓知识、智力投资,人才培养和智力开发与及科学研究是决定性的一环。

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问题是智力开发不够。薄弱环节是智力方面。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公报,我国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有440万人,文盲率(包括半文盲率)占人口总数的23.5%,按全国人口十亿三千万计算,我们国家还有两亿四千万人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而1976年~1981年我国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仅128万人,按人口平均计算才万分之十二。与1976年前后世界其它国家一万人中大学生人数情况相比,差距甚大。1966年到1979年十三个年头,我们没有培养一个正规的大学毕业生,这个“滞后效应”,必然要反应到九十年代现实生活中来。因此,如何使我国智力资源开发好和利用好确实是当务之急,也是我们迎接世界新的技术(产业)革命挑战当务之急。只要抓住智力开发这个主要环节,使智力资源开发得好和利用得好,我们是可以赶上这次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在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发展速度上,可望比西欧和北美快三、四倍。依据有四个:(一)是目前的信息传递远比过去迅速而高效,现代的书刊、影片、录音、广播、电视都大大加快了知识的传播。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的速度;(二)是目前各行各业的技术水平非当年所能望其项背;(三)是目前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广度和深度都为前所未有;(四)是交通运输速度和效率之高,也是过去所望尘莫及的。有这四大因素,如果抓好智力开发,我国平均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赶上西欧、北美的估计,不是一句空话,是可以实现的。

同样,我们广东省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优势,在这次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中,在全国可以先

走一步,走得更快一些。但薄弱环节也是智力方面。突出表现在智力资源尤为贫乏,对智力开发和智力投资不重视。据1982年统计,全省科技队伍人数只占全省总人口的千分之五,低于全国千分之六的平均水平。近年来,我省大抓搞活经济,忽视了智力开发。较普遍存在抓经济现成实惠,抓智力开发遥远无底的思想。对智力投资在许多地方的领导工作中,并没有真正摆到议事日程,集中反映两方面:一是在国民经济计划中,智力开发投资没有地位,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二是近年来,我省振兴经济不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少工厂企业不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这样做,基础是不牢固,不能持久的,生产盲目性很大。近年来,我省出现大量轻工消费品滞销积压的现象,以及去年全省企业亏损为全国最大的一个省份就是有力的例证。

我省智力资源贫乏还表现在企业技术人才技术力量严重不足。全省上缴利润税收、创财富最多、产品最多的消费品轻工行业,技术力量尤其不足。例如全省二轻系统企业科技人员占职工总人数0.51%,而国外不少同类企业,技术人员与职工人数差不多各占一半。由于企业人的智力技术素质较低,虽有先进设备、装备和先进技术,也发挥不出先进水平。例如我省某玻璃(瓶)厂与日本某玻璃厂,生产装备同是进口国外现代先进的同规格的生产能力相同的设备,日本职工人数为200人,产量为10万个,而该厂则要1700人,产量却只有7万个。可见智力开发和智力投资对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重要性。当今世界市场对产品和经济建设的竞争,核心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因此,我省在迎接这次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应该抓住智力开发这个主要矛盾。大力加强智力投资,把智力开发摆到我省国民经济计划战略地位上来。

为了迅速使我省智力开发这项工作做早做好,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步伐,结合广东的实际,提出如下六点建议,供探索讨论。

(一)大力提倡并鼓励“以智力开发智力”,充分发挥现有的科技人员及知识人才的作用,把他们的潜力发掘出来。鼓励教师、科技人员及知识分子在做好本职工作前提下,兼课兼职,加速智力资源开发,加速人才的培养。

(二)充分利用广东华侨之乡,毗邻港澳的

特有条件，大力鼓励华侨侨胞港澳同胞办教育，加强引进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

(三)改革高等教育，以学分制代学年制，强化智力开发，加快人才成长。推行学分制代学年制，教师必须做到既是培养人才者，又是发现人才者。在具体配合措施方面我个人认为要做到六变：(1)思想变，这是一种大变革，人的思想必须相适应；(2)教师组织结构、层次变，以条条为主(专科、专业)，结合块块(班级)；(3)学生结构变，按学生素质变化，不断分层次，边发现人才，边分层次培养人才；(4)教学措施变；(5)教学方法变，(6)教学手段变，管理办法变。

(四)实行公办与民办学校相结合，大力鼓励民办教育，发动全民大办教育，大搞智力投资。

(五)广开学路，开辟加快智力开发的新途径。例如普遍实行工人技术知识轮训，大量增设技术职业学校，大力发展函授，广播电视学校，通过各种手段向农村农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从工人、农民中选拔造就知识人才和科技人才。

(六)省、市(地)、县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把智力开发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把智力投资列入各级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地位，应与经济建设同等地位。尤其是对中小教育的投资，要大大增加，在各级国民经济计划要有重要比重。

赵元浩(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新产业革命在国外又被称为“第三浪潮”，正在向全世界冲击，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亦开始注意，在中央和地方有远见卓识的人们中，对于这一新形势的挑战，已经有紧迫之感。在这个严重的挑战面前，漠不关心，因循守旧呢？还是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呢？前者是被时代淘汰之路，后者才是奋发图强的正途。

在这个新产业革命的严重挑战面前，我们广东应该怎样应战呢？这是必须认真重视的问题。

首先，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的文化科学水平。

广东五十年代教育在全国列前五名内，但十多年来后退了，现在恐怕在后十名之内，据1982年7月人口普查统计，广东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一千零四十二万^②人，大专院校文化程度的只有

68,320人占总人口0.46%，高中文化的4.666,160人，占总人口的7.9%，全民所有制企业高级科技人员只有十万人，占全体职工总数0.48%，中等科技人员约三万人，占18.63%。全国每万人口中有科技人员60.1人，广东只有43.3人，在全国排25位。

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并逐步加强高等教育，不仅要重视自然科学，同时也必须重视社会科学，因为“信息社会”不仅是自然科学的成果，也是社会科学的成果；信息科学既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在近若干年内，加强中小学教育应成为重点，因为中小学基础不好，则大学教育就难以办好。但新产业革命形势迫人，目前又不能忽视大学教育，因此只能选择重点来抓；同时，应当特别重视现有企业经理、厂长、技术人员及管理干部的培训，把这一类干部培养起来，按照新产业革命的要求来改造企业，就比较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

对于发展教育，无论是中小学教育，还是现职干部教育，都需要增加智力投资，国家应下决心，宁肯削减新建、扩建企业投资，也应增加教育和培训经费。目前全国教育经费之少，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这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太不适应了。

第二，必须加快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之所以优越，是因为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有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改革不合理的体制，应较任何国家都容易。关键在于统一认识，发扬民主，开展全民讨论，无理要服从有理，相信是能加快体制改革步伐的。体制不改，的确无法前进。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中央—地方—企业—职工的权、责、利，打破部门所有制和地方所有制，无论任何部门和地方，都应当服从中央的统一计划和指挥；平均主义，各自为政(分散主义)吃大锅饭必须改变。

第三，必须从管理基础工作入手整顿现有企业，严格“验收”，并把德才兼备的职工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做到有职有权，并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领导水平高的企业权力可扩大些，水平低的可以权力小些)。这个问题几年来没有很好解决，和体制未能同步改革有密切的关系。希望今后能统一各部门的步调，分期分批把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又避免造成混乱。

第四，要下决心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华

侨政策，这是发展新产业革命的重大措施。对于广东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两项政策落实了，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加快企业技术改造，促进新产业革命以及加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才有保证。因为华侨中有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这是一股强大的爱国力量，动员华侨帮助新的产业革命，支持祖国建设，将是很大的助力。广东从省到县到区乡所；从进出口岸到企业，都应当进行华侨政策及知识分子政策教育，并采取果断的措施，保证政策贯彻到底。

最后应付新产业革命的浪潮，应有长远规划和近期规划，并把这个规划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规划结合起来。这些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有充分的调查研究，既要弄清目前自己的能力，又要弄清国外新产业革命的进展情况，使规划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切实可行，有步骤地迎头追赶，我国的落后面貌一定可以改变。

时机不可失，愿全国努力！

雷 强（中山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关于世界新技术发展，最近大家谈得很热烈。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我国从上到下，从中央领导到广大群众的议论和关注。这是个很好的现象。我认为对于当前世界新技术发展的情况，我们必须有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分析和判断。要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一、对于特别尖端的世界新技术，一般说来，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差距比较大。开发、攻克这种新技术，需要时间长，投资多，风险也大。应用这种最新技术，主观上由于我们基础差，在吸收消化上会产生不少困难；在客观上，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将最新技术转让给我们。我们要重点发展经济效益高，国家又急需的最新技术。对于这种最新技术，应由国家和全省组织专业队伍来攻关和研究。我们国家已有一定的科研基础，组织一条龙的技术队伍攻关，是可以尽快取得对国民经济最有意义的最新技术成果的。

这方面国外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是经过规划，建立生产部门、研究部门和高等院校密切结合的工业基地，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开发新技

术。如美国的硅谷、加拿大的工业发展区、我国台湾省仿效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等。我国正在酝酿，在今后若干年内，将在南京、上海一带、京津地区和华南建立电子工业基地等等。我们还可以考虑在华南，经过周密规划，在沿海建立石油化工，化纤、食品、制糖、造纸等轻工业和建材工业等基地。

最近，有同志提出，要充分利用世界专利资料的作用，来加速我国新技术的应用。这个提议值得我们科技领导部门考虑。因为世界各国申请专利的技术，其中不少是世界尖端技术。一般专利期限为二十年。购买我国最需要的专利技术和了解利用已经到期的专利技术，对我国引进尖端技术，对我国在研究、攻克尖端技术过程中避免在别国已经解决了的技术难题上再花费本可节省的人力、物力，大有帮助。

二、对于适用技术，虽不是世界最新技术，但引用这种技术，需要的时间短，投资少，风险也小，经济效益较为明显。应用这种技术消化容易，有普遍应用意义，对我国国民经济起着重大作用。这是新技术的主要部分。这种适用技术大量运用得当，将对我国四十多万个工业、交通企业，连同农村企业共有一百多万个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经营管理改进，有很大的帮助，从而加速整个生产的发展。例如我国有大量轻工业品因电镀技术未过关，影响产品的质量，影响在世界市场的销路。如果我们引进国外的电镀添加剂，电镀技术能过关，这些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将大为加强。

为鼓励和加速利用这种适用技术，我们是否可以让各个部门，设置展览会，每年展出新技术及其新产品。另外，制定合理的奖励开发和利用适用技术的政策，使这些适用技术得以迅速推广。

要建立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工作领导机构，从战略上考虑我国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世界新技术，特别是最新技术的信息和资料，要及时、广泛、系统地收集，加以整理研究。我们十分迫切需要有一个搜集、储存世界新技术信息资料的机构，了解国内外科技、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等状况，以及了解各国科技政策、科技开发、科技体制的情况。还要组织专门队伍，对新技术、包括适用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对新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对世界最尖端技术的应用进行经济效益的估计、预测。这就不仅牵涉到科学技

术工作者，而且还牵涉到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互相协作的问题。这种预测做起来很困难，但它是我们决策机关必须要做的。因为这种预测是我们今后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基础和依据。有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引导经济发展到正确的道路和可能达到的高度。

普及科学技术，是我们开发与吸收世界新技术的基础。这个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和为人们所重视。一般重视智力投资，多半限于高层、中层的科技文化人材培养，很少考虑到普及文化科学技术知识问题。这是智力投资的基础。也是开发与吸收世界新技术的基础的基础。我们很难想象有二亿多文盲半文盲，更多的科（学技术）盲的国家，能够在整个科学技术上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如果我们真正热衷于世界新技术，我们就应该用更多的力量放在科学技术的普及教育上，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年青一代身上。这样，我们才有高、精、尖的科学技术基础。

对于搞科技工作的领导干部来说，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如不及时了解当前科技开发、应用的新进展及其趋势，就很难作出正确的科技发展决策。当前领导干部虚心学习科技知识，这种姿态是好的。但要不是一阵子的。科技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发展的。要有个机构、制度来保证，让他们对科技的必要知识，跟得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对于群众的科学技术的普及教育也是这样。当前举行一个个展览会或报告会的形式是可行的。但是，从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来看，需要有个固定机构、馆场，专门为普及科学技术服务。如加拿大多伦多的国家科学中心（展览馆），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广阔，拥有几乎包括了所有自然科学课题的几十个分门别类的展览馆。它的每一项展出，都巧妙地将科技的基本原理与尖端发展熔于一炉，加上运用最新的、自动化的、饶有趣味的表现形式相结合。这种科技展览馆对大人与小孩、群众与专家都是一种最新最好的自我教育形式。这样的展览馆，我想北京可以办，广州何尝不可以办呢？

三、对于一般技术，就是经济发达国家，有的五、六十年代或更早就普及了的技术，现在还在沿用，以后也还是要沿用的，这些技术对我国来说是很必需的，也应有大发展。首先是创造条件，尽量扩大使用这些一般技术的问题。比如普及电话问题，没有电话，又何来搞计算机的应用呢？国外经济发达国家、地区还在扩大使用这种一般技术，并加以改进，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新技术的发展。为何我们广州在有可能在两三年前便着手从根本上和全面改造的旧电话系统，却迟迟不做，以致今天严重影响了经济工作和社会生活的进行，影响了我们城市的声誉。



“三个面向”是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根本方向（座谈摘要）

三月二十一日，广东教育学会、本刊编辑部邀请了广州地区的部分教育科研工作者、教育行政部门的同志和科技工作者座谈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指示，并联系广东实际，就新技术革命与教育的关系和教育改革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现将同志们的发言简要介绍如下：

“三个面向”指明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何辛（《广东教育》编辑部副主任）：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十分精辟，为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把我们的教育工作指导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个面向”是从教育是百年大计，它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特性提出来的。面向现代化，就是要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和劳动者；面向世界，就是要研究、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第一流人才；面向未来，就是要展望下个世纪和共产主义，使培养出的人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按“三个面向”来考虑，在德育方面要注意：一、在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提高青少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抗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能力。二、要培养为四化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在智育方面，不仅要掌握现代科学知识，还要培养现代科学思维和素质，应将着重点放在智力、能力、适应力的培养上。学生身体素质也要大大加强。按“三个面向”改革教育，要从国情现状出发，从教育指导思想、思想政治工作、教学工作、体育卫生工作、学校管理等各方面全面改革，使传统的教育转变为现代的教育。

李锡槐（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三个面向”的核心是面向现代化。这是总方向，也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当前改革教育尤其要注意：一，端正办学思想，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二，面向多数学生，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因材施教，早出、多出人才。德育要强调时代精神的培养，特别要帮助学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起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智育要实现从单纯传授知识向注重发展智力的转变。体育也要立足于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教育工作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陈飘（广东教育学会副秘书长）：新技术革命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们的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一，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智力和知识已成为生产力迅速提高的关键因素，教育已成为发展现代生产的基础。这就提醒我们要加大“智力投资”，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育跟不上，四化搞不成，我们同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而且还会加大。二，科学技术在生产和其它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运用，对全民科学文化水平要求大大提高。普及教育的步伐必须加快。三，“终身教育”正在取代“一次教育”。“模仿型”培养正转向“创造型”培养，因此，教学制度、内容、方法都要加以改革。

严永晃(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教授):改革教育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一定要着眼于国际上最新的水平。例如,在教学思想上不仅要应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规律为指导,还应用发生认识论研究儿童认识的特点和具体规律;不仅要研究教师怎样教,还要研究学生怎样学;不仅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还要大力开发“第二课堂”;要注意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对教育思想的渗透,它正在引起教学结构、程序、方法的变化。在教学内容上,要重视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但又要看到基础知识的相对稳定性,打好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才可能有效地接受更多新的科学知识。教学方法上,要研究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自觉性、创造性的关系,怎样通过教学过程,更好地开发学生这个学习主体的自觉积极性。

教育科研也要贯彻“三个面向”的要求

江月孙(华南师大教育学系副主任、副教授):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也应按“三个面向”来改革。要及时地回答现代化建设对教育提出的新问题。当前,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要加强研究:一,进一步阐明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巨大作用,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科学地阐明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二,研究新技术革命将对教育产生什么影响,提出什么要求,以及如何适应这个要求。三,研究教育本身如何尽快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包括传统教育转向现代化教育的条件和必然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派”的本质区别,目前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等。

张硕城(《学术研究》编辑部编辑):教育科研面向现代化,包含如下意思:一,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重视研究和回答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现实问题。如教育投资的最佳经济效益、教育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农村普及教育、全民义务教育、德智育科学化、学校管理的改革、普通教育结构改革,等等。二,有选择地吸取世界最新的理论和方法。要从单一的定性分析和单向研究发展为定量定性分析和多向导的综合研究,比较研究、预测性研究,系统观念、集合观念也可以引入教育科研之中。我省的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社会心理学、模糊数学应用于教

育等项目已有苗头,应加倡导。三,教育科研体制、结构、队伍素质也要改革,以适应现代化科学研究。我省应逐步改变研究队伍以少数专业研究人员为主的状况,要吸引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学科专家参加教育科学研究,形成更广大、更集中的教育科研力量。

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陆树培(省教育厅中教处副处长):在中小学逐步普及电脑教育是当务之急,应当成为改革教育的一个突破口。电脑学习的最佳年龄是十三岁至十九岁,外国许多中小学都开电脑课程。所以,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的指示是十分正确、及时的。关于中学电脑教育,我省从前年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八所中学、职业中学开始试点,全省普教系统已有九十多台微型电脑,九十多名师资。中学搞电脑教育,目的有三:一是让学生初步掌握电脑结构知识,初步学会运用。二是要学会编简单程序。三是借此培养智力,迁移到其它学科教学。我省已编出微电脑试用教材。试点经验表明,中学普及电脑教育是完全可行的。我们初步设想,全省三千九百所中学,分期分批进行。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先抓县、市以上重点中学以及二百所教师进修学校、师范学校。一九八六年开始在一般中学、农职业中学和区中心小学推广。一九九〇年以后普及到全部中小学。看来,主要的困难是资金、设备、师资三项。需要省委和各级领导给予支持,逐步解决。

谭栋材(华南计算机公司助理工程师):计算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所以教学用机一定要保证,可多渠道设法。教材内容,可编入一些离散数学、数据结构、集合知识、布尔代数和BASIC语言的常识,以利于学生学好电脑基础知识。同时还要加强汉语和外语学习,为使用汉字终端奠定基础。为减轻学生负担,可删简数学教材,如把几何、代数、三角合在一起上,讲简些快些,腾出时间学新知识,以适应知识更新的加快。

广东省社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张绰同志出席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以及在会上发言的同志还有章权才、李超然、刘展如、黄凤漳、陈兆集、吴奇程、朱仲南、刘斯翰、叶世雄、梁诗雅、蒋江敏等。

(石成、仲南整理)

论一般与个别

——兼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赵 凤 岐

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都是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正确地理解这些范畴，不仅对于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是重要的，而且对于正确理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增强我们在实践中的自觉性，也是重要的。

任何科学的哲学范畴，都是对社会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的概括。它来自于生活，又反作用于生活。而随着生活、实践的发展，人们对这些哲学范畴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哲学范畴本身也处于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过程中。一般与个别这对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在不同场合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实践论》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也反复论述了这个问题。例如，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论述，关于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论述，关于人的认识过程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论述，等等。他在《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则从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展开，以其特有的完备的理论形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矛盾论》所说的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论断，不仅从理论内容上包含着对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而且指明了这个问题在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述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它所显示的逻辑力量，从根本上说，是以中国社会的异常复杂的矛盾和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丰富经验为基础的。因此，即使是同样的概念，人们所赋予它的内容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就有抽象和具体的区别，人们对它的内容的把握就存在着贫乏和丰富的差异。这种区别或差异是不可以忽视的，否则，就有可能走向理论上的失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基本原则，升华到哲学理论的高度，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论断。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上述“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同志在概括革命实践经验时早就指出，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①同时，他在谈到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时还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这些论断，都凝聚着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丰富经验，体现了他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学说的光辉思想。历史早已证明，过去我们搞民主革命，正由于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前进，才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但是这种一般原理的应用只有同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具体地表现出来。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但十月革命的胜利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所取得的突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首先取得突破，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一般原理的新证实。但是这种一般原理又是“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而具体表现出来的，是合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没有这种创造，离开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由此所决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由此看来，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以及反映它们的一般原理和每一国家具体实际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之间的并列关系，而是事物矛盾的两种属性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任何特殊都不能超出于矛盾的普遍联系之外；另一方面，矛盾的普遍性即存在于矛盾特殊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正由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由于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毛泽东同志提示说：“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③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种互相联结的客观性和内在性，是人们在主观思维中之所以能够对它们加以区分和把握的基础；同样，这种互相联结的客观性和内在性又决定了人们对它们加以区分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别绝对化，以至于否定了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结。由此出发，当着我们谈到把一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候，也不是说把一般原理加以死记硬背、照抄照搬，或者只是简单地把一般原理看作一个东西，把实际看作另一个东西，只要在两者之间“挂勾”就行了。这种做法，实际上只能是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上的一种误解，是只有思想懒汉才欣赏的东西。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是在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对每一时期、每一国家以及每一单位等等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从而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期间包括对每一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的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对历史实际和革命实践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的精细的研究和深思熟虑，包括对主、客观条件和各方面情况的统一了解和具体分析，也包括认识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和在

此基础上所作出的合乎实际需要的理论性创造，等等。显然，这就需要化力气，是一个艰苦的创造性过程，特别需要在研究矛盾特殊性上下功夫。

黑格尔在讲到概念的矛盾运动时，曾用“共相”与“殊相”这样的概念来说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照他说来，“真正的普遍者，用通俗的话说来，表现为普遍者自身和特殊者相结合。”④而“如果只就形式方面去看共相，将共相与殊相并列起来，则共相自身也就会降为殊相了。这种并列的办法，即使应用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亦显属不适宜，不可通。譬如，在日常生活里那会有人只是愿意要水果，而拒绝樱桃、梨子和葡萄，因为它们只是樱桃、梨子、葡萄，而不是水果呢？”⑤这里，黑格尔不仅说明了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结合的，而且提出不能把共相与殊相相并列。因为如果把二者“并列”起来，就会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共相是独立于殊相之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割裂的。而一旦把它们“并列”起来，不仅会剥夺了普遍性的真实内容，而且在把普遍性独立于特殊性之外的条件下，必然把普遍性自身也降为一种特殊性了。这样，就不再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而成了一种特殊性与另一种特殊性的关系了。黑格尔认为，这种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来的做法，把共相与殊相并列起来的做法，是对两者关系的形式主义的了解。这种形式主义之所以要不得，因为它“仅是把捉住一些抽象的命题或公式，例如，‘在绝对中一切是一’、‘主客同一’等话，遇着特殊事物时，亦只有重复抬出这千篇一律的公式去解释。”⑥黑格尔讲的是概念的自我运动，但是透过其唯心主义的迷雾，他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观点，不能把两者并列起来即不能对它们作形式主义了解的观点，都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肯定过的。恩格斯在讲到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及其应用时，曾尖锐指出：仅仅知道麦植株和微积分被“否定之否定”这个概念所概括，我还不会把麦子种好，也不会演算微积分，正好象仅仅知道音乐取决于弦的粗细长短的规律，我还不会演奏提琴一样。⑦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深刻论述的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特别是他所着重论述的关于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上来把握特殊性、关于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论断，关于一般来自于个别、又必须以一般为指导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新事物的论断，既是对人类认识史上积极成果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丰富经验的科学概括。不了解或忽视问题的这后一个方面，就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学说，也无法理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我国具体条件下时所作出的种种理论性创造。

二

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不只表现在同一过程的各个方面，而且表现在此一过程向他一过程的推移和新过程的发展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历史时期，这个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和探索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了我国多年来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在概括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和考察现实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在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并且开始找到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⑧这个基本结论，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一基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是在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国情认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理论性创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切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走自己的道路。其中包括对于各方面关系的正确处理，包括对于我们已有经验的历史回顾和重新认识，也包括对于在四化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条件的具体分析和对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就我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说来，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条件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历史传统等等情况的不同，因而我们既要认真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同时又必须立足我们自己的实际，正确地有选择地加以吸收。由于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然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建设的道路、方针和方法。这是由每个国家所固有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的，是与每个国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所以，决不能脱离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即使是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不能生搬硬套。此其一。第二，就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来说，今天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条件，对于这种有利于我的新条件我们当然要加以利用。这就要从已经出现的新情况、新条件出发来决定我们的对策。邓小平同志说：“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⑨党中央关于对外开放的决策，正是反映了四化建设中新的实际，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合乎科学的组织和管理大生产的经验，对于那些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技术，我们当然都要学习。但是，这种学习也必须以有利于改善我们的经营管理，以有利我国的四化建设为原则。就是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终是我们的立足点。至于一切体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腐朽的、反动的东西，我们则必须坚决加以抵制。第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包括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们自己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自于客观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深刻分析所引出的科学结论。但是任何正确的理论都要由实践赋予活力，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某些个别原理、个别结论由于条

件的变化而必须加以修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关于无产阶级在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后必须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思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实行按劳分配，以及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以不断满足人民需要的基本观点等等，都是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证的。因此，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同时科学社会主义又决不是一字不差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去实现，否则，就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活的马克思主义，而只能变成一种僵死的没有生命力的教条了。

正因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同实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我们的思想就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就要历史地辩证地对待已有的理论和我们自己在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这就是，对于凡为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理论原则都要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而对于凡属于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实践要求的東西都应当敢于抛弃，对于已有理论中的某些个别结论、个别原理，以及我们已往经验中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東西，都应当用现实实践所提供的新经验、新结论取代之。这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理论和发展理论，也是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体化，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尊重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是与尊重人民群众、尊重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相一致的。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几年来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事物，党中央及时总结了这种经验，加以提高和升华，使之成为符合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和广大群众要求的农村经济合作的新形式，反过来成为推进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强大力量。因此，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包含着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才能这样的内容。

如上所述，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立足于我们的实际，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验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要历史地辩证地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在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地创造新经验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主动性等等，都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之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正确地加以处理的几个方面的关系。而贯穿其中的根本之点就在于一切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⑩只有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实际，一切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各种问题，才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才是对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正确处理。

胡耀邦同志最近在讲到这个问题时说：“有同志问：能不能开出一套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来？我们说，这种预先设想好的一套现成答案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⑪那么，既然没有一套现成答案，是不是就可以照搬国际上某一种模式呢？

胡耀邦同志指出这也是“行不通的”。这里，既不能预先开出一套现成答案，又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这期间除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相辅而行的就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相互关系的正确理解。

按照辩证法，“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②任何一般都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进入一般之中。这是因为，某一个别事物不但有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共性和本质，而且还有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个性、特殊性。作为思维中的一般，它所反映的是诸多事物的共性、本质，但并不能反映个别事物的所有具体特性，并没有把诸多个别的一切细节都包罗无遗。否则，一般就不成其为一般了。也正因此，当我们把普遍性的认识应用于特殊事物的研究时，当着把从诸多个别中所概括出来的一般应用于对新事物的研究时，就特别需要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结，防止把一般僵化，而要把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用一般的东西为指导，着力于对特殊性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提供的只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指导原则，至于这种一般原则在每一国家怎样实现，以怎样的具体形式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怎样进行，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国情和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诸如此类的问题归根到底要依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为转移，要由实践经验提供的决定性指示为准绳，要通过实践来解决。

一般说来，人们对于个别不能完全地进入一般之中这层意思还易于理解，而对于一般或普遍的理解上则往往存在歧义。例如把普遍仅仅理解为“抽象”的，把一般理解为根本排斥个别，便是这种误解之一。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肯定了这样的思想：“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 东西的全部丰富性！）”^③列宁认为这是绝妙的公式，好极了。

大家知道，黑格尔是在谈到“具体概念”时表述上述思想的。在以往的哲学史上，人们往往把概念仅仅看成是抽象的，认为它所表现的只是一些事物的共同点，而并不涉及事物的特殊性、个性，因而认为愈高的概念其内容也就愈贫乏。针对这种情况，黑格尔提出“具体概念”与之相对立，认为概念不只是抽象的，而且也是具体的，即体现着特殊东西的全部丰富性的，因而愈高的概念其内容也就愈丰富。黑格尔还用“格言”、“文法”“逻辑”等事例说明了这个道理。黑格尔还特别强调不要把具体的普遍性与排斥了特殊性的共同点混为一谈：“无论为知识或为实际行动起见，不要把真正的普遍性或共相与仅仅的共同点混为一谈，实至关重要。”^④总之，黑格尔在阐述他的“具体概念”时说明了对普遍或一般不能作抽象的了解，其间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作为对个别或特殊之概括的概念（一般或普遍），当然是抽象的，但又“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别东西的全部丰富性的“这种普遍”。也就是说，普遍或一般作为对诸多个别的共同之点的概括，这“共同点”不是形式上的共同点，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同中有异，不是排斥一切“异”的“同”，而是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别、体

现了特殊、个别之丰富性的“同”，即作为具体概念的普遍或一般。

列宁之所以对黑格尔的上述思想给以高度评价，就因为其中包含着对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之关系的辩证理解，坚持了普遍以特殊为它的内在性质的辩证法观点，批判了那种把普遍与特殊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错误；同时也由于黑格尔表述了人的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发展过程。

自然，黑格尔所讲的“具体概念”，是概念的自我运动，他把客观事物当作概念发展的不同环节，同时他又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说成是客观事物被创造被产生的过程，这都是其唯心主义观点的表现。只要我们不忘记这一点，而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坚持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那么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说，上述思想都是很有意义的。

既然普遍或一般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是以特殊为它的内在性质，在普遍之中体现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那么我们在认识上就要注意：普遍或一般是对诸多个别的抽象，这种抽象说明了一般与个别的区别；但也不要忘记，它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只是相对的，因此不能把这种区别绝对化，不能把普遍或一般理解为一种空洞的抽象。否则，这种“一般”或“普遍”（即空洞的抽象），就是贫乏的，软弱无力的。

既然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两者之间确有区别，但又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么，人们在认识上就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或绝对对立起来，否则就要走向失误。把一般或普遍绝对化，就会走向绝对主义，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把特殊绝对化，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走向相对主义。而列宁所说的一般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毛泽东所说的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告诉我们要善于从每一事物的内部发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互相联结，把特殊性作为我们认识的现实起点等等，都在于强调不要把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割裂开来，特别是强调不能把一般绝对化。如果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一般，那么它在各个国家的具体表现就是个别，在我国它表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也表现为其各自的特点。在这诸多的个别之间也表现为千差万别的特点。所有个别的一切特点，不能完全地进入一般之中，在一般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把一切个别的一切细节都囊括无遗。此即一般之所以为一般、普遍之所以为普遍之所在。但是，在一般或普遍之中，又不仅内含着中国的某些重要特点，也内含着其他个别的某些重要特点，体现了个别的、特殊的東西的全部丰富性。这又是一般或普遍把特殊作为自己的内在性质的科学规定。这也是作为具体概念的一般或普遍与空洞抽象的“一般”或“普遍”之间的分界线。把特殊作为自己的内在规定，这是一般之所以为一般、普遍之所以为普遍的又一根据。

按照辩证法，思维的运动是辩证地进行的。概念抽象的程度愈高，在形式上离现实也就愈远，同诸多个别之间联系的环节也愈多，认识上发生失误的可能性愈增加，诸如脱离实际、把认识的某一片段直线化，把一般原则变成枯槁的没有生气的东西，思想僵化，等等。正因为这样，我们就愈要坚持“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包含着特殊

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坚持这个辩证法的“绝妙的公式”，以求得在思维运动的辩证行程中少犯错误，达到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再现事物的本质。

三

实践是个伟大的学校，坚持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和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积累，经过我们对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在现实实践中的不断摸索和创造，现在我们终于开始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它的主要内容已经反映在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纲领中和党中央的一系列有关文件中。诸如对我国国情的再认识和具体分析；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战略的高度，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经济建设中坚持量力而行、积极奋斗、循序渐进的原则；坚持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合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原则；以及正确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等等。上述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内容，既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根本精神的体现，又是把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同我国四化建设这一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经过多年的探索，特别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随着四化建设实践的发展，新的课题又将不断出现，要求我们去解决。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下，我国人民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定会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以我们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独特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宝库增添新的财富。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522

②同①书P822

③同①书P306

④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P72（三联书店1956年版）

⑤《小逻辑》P67，三联书店，1954年贺麟译本

⑥同⑤书P65

⑦参见《反杜林论》

⑧《邓小平文选》P372

⑨同⑧书P122

⑩同⑧书P372

⑪胡耀邦：《最好的怀念》（见1983年12月26日《北京日报》第一版）

⑫《列宁选集》第二卷P713

⑬《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P98

⑭同⑤书P338

社会主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探讨

齐 振 海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建国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课题。本文拟从哲学特别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统一的角度作一些探讨。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而且它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系统，还突出表现在是社会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

社会发展规律根据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可以分为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一般规律是这样一些规律，它们在一切社会形态或一类社会形态中发生作用。特殊规律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或在某一个别社会形态中发生作用的规律。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内是一般规律，在另外的条件、更大的范围内则是特殊规律。如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对于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来说是一般规律，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则是特殊规律。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是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交织作用的结果。所以，既不能用特殊规律去代替一般规律，也不能用一般规律去代替特殊规律，更不能把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完全隔离开来。我们要认识社会主义，就应该既要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了解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特殊规律。一般规律揭示社会主义发展各个阶段的联系和统一，指明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反映社会主义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整个运动进程。它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包括阶级、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认识它，掌握它，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科学地预见它的未来，并善于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也只有认识一般规律，或者认识这些规律起作用的客观条件，才有可能利用这些规律来建设社会主义。否则，仅仅看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就会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彼此脱节的、各个孤立的、无法掌握它的发展趋势和运动进程的东西。我们也就不可能充满信心地去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由于一般规律说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本质、最基本的特点，而特殊规律则是同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特点联系着，所以，特殊规律不能取消一般规律，而只能体现一般规律，或从属于一般规律。固然，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有特点、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取消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的一般规律。例如，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方面，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中国都是有特色的。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行了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并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实际上，我们用赎买的办法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

因为一般规律制约特殊规律，特殊规律表现一般规律，或者受一般规律制约，所以，我们一旦认识了一般规律，也就找到了判定一个事物的基础，或者说也就大致认识了该事物及其表现形式。因此，认识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也就成为我们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依据。就以我国农业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来说，它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在国外的模式中也找不到这样的形态。但是，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中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即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国家、集体所有。而它恰恰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完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这也就决定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违背或者不承认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就会造成工作中的失误。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是社会发展的—条一般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的—条一般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在于，上层建筑如国家所起的作用特别突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这种特殊性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一般规律并不矛盾。相反，只有在承认这一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它的特殊性。大家都还记得，林彪、“四人帮”—伙否认这条—般规律，宣扬上层建筑决定论，曾经给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在对待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方面有两种错误倾向必须反对：—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论述太—般化，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他们企图以现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特征，来补充或取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概括，甚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规定性，似乎社会主义可以任意地规定和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或者使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普遍规律淹没在次要的东西之中。另—种倾向是，局限于对社会主义—般规律的了解，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甚至把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成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东西。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尽管认识、掌握社会主义—般规律这样重要，但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来说，仅仅认识社会主义的—般规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认识和掌握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规律。因为—般规律不可能把某—社会主义社会的独自特征、特点概括进去，

它总是撇开了各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因此，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只知道一般规律是远远不够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只有“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②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来说，尤其是这样。而特殊规律正是说明某一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展，表现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和发展；说明它所特有的联系和关系，即反映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但这决不是说，只知道一般规律就够了，就一定能够做好工作了。如果只局限于一般规律，忽视特殊规律，我们就看不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这样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注意阐明，“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③

一般规律同特殊规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共同发生作用的。我们认识、掌握了特殊规律，才能深刻地理解一般规律在个别国家中发生作用的机制。虽然我们不能说任何一个一般规律在不同的国家都有相应的特殊规律，任何一个特殊规律都可以归纳为一般规律的表现。但是，在任何国家里，一般规律都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共同的一般规律在个别国家的表现，都不能不带有某些特点。它总是同特殊规律联系着，互相渗透，共同作用。即是说，一般规律不可能完全脱离特殊规律而单独地起作用。列宁曾嘲笑死板地运用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普遍原理而不考虑不同国家发展特点的种种企图，并把它斥之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他尖锐地指出：“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因为这顶多不过是苏兹达尔城的蹩脚画罢了。”^④

我们所以强调要认识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还与发现社会主义一般规律的历史特点有关系。如果说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后很久才被认识的，那么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就它的主要方面来说，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和它的发展趋势的研究中概括出来的。他们的那些关于社会主义发生、发展规律的理论，就成了各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针。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还不能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因为还没有材料用来说明社会主义的特征。”^⑤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一般规律和基本特征的概括不可能做到十分完善，它需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作进一步的丰富、发展，以至必要的修正。特别是要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根据，不断加以深化。我们党的十二大遵循了这一原则，明确地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本质特征，明确地把它同物质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一起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纲领。这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的新结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一大贡献。

可见，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以及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

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我们总结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得出来的科学结论。

我们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一生中作了两大发现，其一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二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正是“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⑥

科学社会主义从一种学说、运动变成一种社会制度，正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本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分析出发，提出了反映社会主义一般规律的普遍原理。这些普遍原理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依据。但如何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能机械地搬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反映了社会主义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俄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胜利。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⑦列宁还强调，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从本国的情况出发，“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⑧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克服了在党内曾一度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坚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⑨

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⑩三十多年来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管是在取得伟大成绩的时候，还是在遭受到某些挫折的时候，无不取决于我们是否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否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承和发扬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传统，在认识国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新阶段。

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强调的或它的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

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它有着本质的规定，即具有区别于一切其他社会制度而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征。“特色”离不开它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征。特色是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所采取的社会主义的不同形式。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是探索社会主义特色的前提和基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鲜明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总的指导方针；决定了我们的体制改革必须以是不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其成功与否的标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强调了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具有中国的特色。也就是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重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并在实践中把两者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具有共同的特征，但社会主义没有共同的模式。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不尽相同，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各国实际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各国带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生产比较落后而又人口众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这些特点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使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中国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建设”二字也是不容忽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特色是各个事物都具有的。虽然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但是，社会主义又是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自觉地进行建设的。同以往的社会形态不同，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按照科学的计划自觉地建设起来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的特色不是自发地形成的，它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建设的结果。唯其如此，我们才要认识、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时代提出的历史课题。这也就是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重视分析中国国情的原因之所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这也就是说，要把反映社会主义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体现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特殊规律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基本特征的论述，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是什么呢？党的十二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科学地概括为：剥削制度的消灭，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违背了这些基本原理，我们的建设事业就会走上邪路。

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中直接

演绎出来。而只能是以它作指导，从我国国情出发，进行新的探索。我国的国情或者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建国三十多年来，已经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但是，从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的底子还薄，国家还比较贫穷落后，科学技术也不发达，而且人口多，耕地少，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在这样一个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我国的这些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农业生产责任制，就是我们党领导亿万农民在“结合”上作出的生动文章。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各个国家由于具体条件不同，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建设起自己的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形成毛泽东思想之路，也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之路；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路，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之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相对于外国社会主义模式来说的。各国之间没有统一的模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处理好学习外国经验和中国实际的关系。

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比较各国的经验”中选择自己的道路。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①这是完善自己的制度，加速自己的发展，少走弯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学习外国经验，当然首先要学习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同时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合乎科学的组织和管理大生产的经验。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服务，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特色。

但是，由于各国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各个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然有着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的模式中有反映普遍规律的，也有只反映自己特点，即只适合一国情况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必须有所鉴别和选择。就是学习那些带有普遍性的成功经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而是仔细地分析它在该国所以成功的原因和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有无成功的可能。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还要同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结合起来，同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道德、风俗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采取人民喜闻乐见和易于理解与接受的形式。

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外国经验，还必须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学习外国经验，决不是崇洋媚外，更不是把资本主义的腐朽、反动的东西也当作宝贝拿来宣传和实行。不然的话，我们非但不能建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反，甚至会丢失革命和建设的成果。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要走自己的道路”，要依靠中国人民自

己的力量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⑩这是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必须牢记的一条思想原则。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相对于我们过去的模式来说的。一个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处理好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已经创造、积累起来的经验同当前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也有不少自己的特色。例如，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方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原则；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等等。所有这些，都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又反映和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点，是我们必须珍视的宝贵思想财富。

但是，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是在实践中逐步被掌握的。我们过去有些熟悉的东西已经搁了起来，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逼着我们去认识，去解决。所以，所谓“中国特色”，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这样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并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也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几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
- ① <邓小平文选>p372
 - ②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p310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p23
 - ④ 同②书第二十三卷p65
 - ⑤ 同②书第二十七卷p134、135
 -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67
 - ⑦ 同④书p64、65
 - ⑧ <列宁选集>第四卷p246
 - ⑨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500
 - ⑩ 同①书p149
 - ⑪ 同①书p88
 - ⑫ 同①书p372

论 庄 子

鲁 凡 之

(一) 生之忧——心芒物化与大哀大惑

不管是个体人或集体人类，都始终经历着一则作为普遍自然一部分，另则又从普遍自然中分裂出来的二重性。人或人类这分裂出来的一面，既要受由普遍自然构成之外在及内在条件制约，同时也具有主观能动地超越、改造客观条件的作用。人所具备的这种改变世界的功能及其实践体现，一方面可理解为人的一种特殊的自然本能，另一方面正是人的本质所在。

这里所谓人的本质，是指体现在每一个活生生个体人生命力里的能动性、创造性，即人作为一种特殊发展的物类，异于宇宙间或人已知部分所有其他物类的基本特性之一，而非某些学说所宣扬的抽象人崇拜；①人从普遍自然中分出而成特殊自然，然后这特殊自然又反过来在普遍自然的条件规限下，改造普遍自然及作为特殊自然的人自身，即庄子所谓“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②没有客体世界便没有我作为人的主体世界的自存体，而没有我的自存体，也就没有我这个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相互矛盾统一的自为体。可以说，自存体即人内的普遍自然，自为体即人改变世界及自我塑造的特殊自然，自为据于自存而高于自存，特殊自然源于普遍自然而超越普遍自然；而人的这种由普遍而特殊，由与宇宙混然为一而分裂出来的过程，以及其间的有机关系，实际上是由古迄今中外哲学所不断作出回应的一个重要命题。

庄子有云：“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③这浑沌死的神话意指，正包含着人生于宇宙混一体分裂的意思；而在庄子的意识形态里，那个先于人生而客

观存在的宇宙混然为一体，也就是道本体，它通过不断的演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④而分裂出天地、万物，再而分裂出人；人由于具有精神活动及意识作用的本能，便给宇宙即道带来一个质变，人与道成了一个相对待，即有待，⑤道由无知无觉的绝对变成为受到人挑战的相对。这人的挑战固然蕴含着人本体向道本体提出挑战的内容，但也同时包藏着人自身要独立地面对客体世界总和时的生存恐惧。庄子写道：“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怱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亦有不芒者乎？”⑥

所谓终身役役，不死奚益，即人若离道而苟活，则人之生也不过是心芒而已；心芒也就是失道、迷道之生，这里暂且不讨论庄子的道是什么，但他提出其形化，其心与之的芒为人生之大哀，所谓“人之生也，与忧俱生”。⑦用现代的术语说，亦可理解为某种对于生之忧的世界恐惧。人在宇宙即道本体的不息演化过程里的某一阶段上分生而出，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便是被道本体的普遍自然抛掷出来，成为某种特定条件制约的特殊自然；这种特殊自然一受其成形，便要同周围客体世界及人自身内在的物相及相靡，终生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即徒具一副臭皮囊的营营役役，枉用尽背离大道的人心即“机心”，⑧使之陷进怱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不亦悲乎境界里。

正是这不亦悲乎、可不哀邪的人生无聊感，显现出一种中国文化形态下的生之忧，把它归入中国式的物化范畴内，亦无不可。庄子本人就使用了“物化”⑨这个概念。著名的“庄周梦蝶”⑩寓言，就精彩而富想象力地表达出了某种对生之忧⑪的艺术式解脱即绝对主观主义的自我迷幻甚至自我魔法式的解脱。辩证地考察庄子这一命

题，便可发觉他在自我心理施法上的艺术感染力越高，便越深刻地显衬出他对生之忧的内心彷徨困惑即大惑^⑫以至恐惧。对生活的无聊感，促使庄子对生命价值的追寻。他的基本方案是：“一之间无敢设也……既雕既琢，复归于朴”，^⑬“道通为一”，^⑭由“与物相及相靡”而“外物不可必”，^⑮“物物而不物于物”，^⑯“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能体纯素，谓之真人”，^⑰所谓真人的标的，便是回归七窍未凿的浑沌。

道就是包括人的本质在内的普遍自然，而普遍自然的总体存在，则是一与朴；心芒与物化，须拢芒去物而不物于物，即恢复人自身的主体性，回归于道的普遍自然，或复归于朴。在这里，对庄子思想的理解，可产生两种实质相反的阐释：一是根本否定生命价值，所谓人生而浑沌死，人的生存本身便在本质上是道的对立，人本体必然导致向道本体挑战，人的挑战却又必然促使心芒与物化的形成，使人堕进大哀大惑的失道之境，因此，最干净利落的做法，便是根本否定人的生命力展开，否定人及人对自身的既雕既琢，否定一切文化及人类智慧，所谓绝圣弃知；^⑱另一种理解则是高度强调生命价值。庄子本人提出过天与人不相胜^⑲的概念，所谓回归浑沌、复归于朴、绝圣弃知等等，亦可理解为对文化的超越而不是全盘否定。在其间，人的生命力得到展开，生之忧得到从实践到精神的相对克服。我是倾向后一种阐释的。庄子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大体上亦可概括之为如下的提法：人只有在更全面的心芒物化过程中，才能自觉地体会到道通为一、天人互不胜的更深刻的人的境界。

（二）死之惧——死生一体与近死之生

在人的世界里，生与死的矛盾无论如何是最根本的矛盾之一，由于恐惧被毁灭而来的对于死亡的恐惧，始终是人类文化成长过程里的其中一般主要原动力；从神话到宗教，从哲学到科学，其根源都与死亡恐惧有关。庄子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哲学流派，重要的内容之一，也在于对死亡恐惧作出回应。

1.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⑳首先，庄子抓住一个道本体，而人的生与死，物的合与分，种种发展都只不过是这根

本的道本体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显现形态而已。从道通为一的角度来看，则固然万物与我一，而我作为人的生与死，也只不过是一本质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所谓“生者，假借也，……死生为昼夜”，^㉑“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㉒庄子借四位虚构人物之口，将交友之道的准则列出，便是要做到以死生存亡为一体的标尺。

秋毫之末作为宇宙即道本体一部分，当然至大，而大山再大，在与宇宙道本体相对待的时候，当然小得很；同理，殇子之短寿若作为道本体永恒之流的一部分，诚为至寿，而彭祖再长寿，若与道本体永恒之流相对待却又短得很了。这样，不仅寿夭之间而且生死之间都没有质的区别，矛盾双方不过是死生存亡之一体的总体空间一部分，不过是天地与我共生的总体时间一部分，这总体空间及总体时间合构成与“我”为一的道本体即宇宙，“我”在其间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故为至寿而无惧于死，亦为至大而无惧于毁，是为庄子式的自我心理施术，作为主观上克服死亡恐惧的第一招。在这里，中国的原始道家实在比印度佛教还要彻底。释迦只不过说众生平等，人与其他生物在佛本体里相通为一，彼此互易转世。庄子却进一步说万物为一、死生为一。假如中国儒家哲学是人生为本论，印度佛家哲学是众生为本论，那么，中国的道家哲学便是万物为本论。这种齐物论，相对于人本论与生本论来说，固然阴冷，却能以独有形态在主观上克服死亡恐惧，且为传统中国的物学奠定哲学基础。李约瑟就曾高度肯定道家哲学之于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的重大意识形态作用。^㉓

2. 庄子在提出一个道本体，将人的根本矛盾即生与死归列为一，即“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㉔后，便进一步论证死不仅在本质上与生为一，而且在发展形态上比生更能体会相通于一之道。因为生有机心阻挠，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借虚构的援髀、枕而卧的夜半髀见梦，而提出死之说。死由于没有种种人伦关系的束缚，而且与四时天地混然为一，于是使用死比生乐的命题，从而在主观上达至克服死亡恐惧的心理施术。

庄子又认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②死之悦尤如归家，归大道之本，又谓大得；^③“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④生与死之间既相互有所待，亦相互无所待，无待则生与死皆有所一体也。然而，生与死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在生与死背后将二者同通起来，却需个体人格内在修练过程。这方面，庄子借颜成子之口说，一年而不文、二年而从天理、三年而通天地、四年而齐万物、五年而来物人、六年而神而化、七年而成己物、八年而天地与我共生、九年而达德——大得而合乎道。

“莫知其所终，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⑤庄子将生死一而化之的九个层次的修练过程，就是将生与死之间的有待关系化为主观上的无待关系的过程——生无待于死，死无待于生，无始无终则有命即无命、无命即有命的至美境界，这是庄子克服死亡恐惧自我心理施术的第二招。

3. 至于前述的两种自我心理施术，庄子本人确是身体力行的。当其妻逝世时，庄子箕踞鼓盆而歌，并回答逻辑学家惠子的质问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乎芒易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⑥这里，庄子的死亡恐惧克服法带着相当清晰而具理性成分的自然现象观察，即气变而生，生变而死。及至庄子本人面临死亡时，《列御寇》篇记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万物为赇送……’”^⑦庄子确是身体力行自己所宣扬的以一死生为求天放^⑧的学说的。

4. 庄子先而提出一死生，进而提出死为至乐至美，但人既生而为人，所谓受其成形，却总不能都去自杀求死。庄子并没有叫人去死，而只是叫人不要畏惧死亡，生与死都要顺乎自然。但庄子虽没有宣扬以自我选择的死去回应死亡恐惧——这所谓自我选择的死，既可狭义地理解为自杀，亦可广义地理解为尼采式的选择死亡。^⑨可是庄子却诡秘地提出追求某种近死之生，作为介乎自我选择死亡与死亡恐惧之间的中间形态。所谓近死之生，实可用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⑩来概括。

在庄子的意识形态里，由于强调无用之用于

大用，^⑪即强调对于生存本身就是得到最大的用，因而对于在生存过程中所形成而赋予生存之种种价值的准则，庄子都是一概加以否定的，并认为这是对于人与道通的天性的沦丧。然而，不管人在主观上如何加以否定，人在生存过程中总会形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价值准则。因此，庄子必须在这里作出妥协，一则将人为的作用放到最低限度，变成某种不得已^⑫的哲学，另则将不得已的人为界定为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的形态。这正是庄子哲学的一个关键。

近死之生有常态、异态之分。常态即前述所谓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异态则可包括病与睡。庄子相当喜欢谈病与睡，或许此两种存在状态颇能与他探讨主题相涉之故。“夫大块载我之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⑬而病，则是生命仍在之际而又最能感受死亡——死亡悦的特殊时刻。至于睡，即是梦，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的著名寓言，更是众所周知，其中所透视出来的幻中幻心理境况往往蕴含着介乎生死之际的主观想象和感觉扭曲。总括起来，这对近死之生的自觉探求则是庄子克服死亡恐惧的自我心理施术第三招。

（三）道与德——所好者道与进乎技矣

庄子的《外篇·秋水》写道：“既已为一矣，……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那个一就是道，就是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⑭“夫大道不称”，^⑮“道未始有封”，^⑯“道昭而不道”。^⑰“道”这宇宙本体或普遍自然，是混然为一而不能作质的分割的，而且道自身就是道自身，能够用名称或其他人为方法显示出来的，本质上就不可能是道，而只能是关于道的讨论或描述之类。但道与论道却根本是两回事。道是物我未分判之前的浑沌，人自浑沌中分出便同时酝酿着人的萌生文化。在庄子的观念里，文化本质上就是道的破坏。所谓一与言为二，文化始终是文化，二始终是二而非一，言论都是道的分裂者（但庄子又似乎不能全盘否

定言，否则，他也不会留下文章或对话录，并显出非常着意与当时的儒家争夺影响力^④）；这二是自无适有的必经之途，但要再由有归无，即二与一为三，庄子认为必须诉之于文化以外，实行彻底的反文明、反建制。

庄子说：“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搥玉毁珠，小盗不起；梵符破璽，而民朴鄙，拊斗折衡，而民不争；殪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擢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⑤

这大巧若拙就是二与一为三的三，即在文化的条件上破文化障而回归普遍自然——道本体或宇宙本体。这种回归自然同时也是人的提升（故三虽归于一，但又与一般的一并不绝对相同），其途径却不在言，而在于不言，在于我在上节所谈过的对近死之生的生动追求，以及纯粹属于主观境界的想象力解放。庄子实质上是在提倡将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放置到个体人内在的精神自我塑造上。所谓“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⑥人自道分出而成人，人之成就是道之毁，再超越成毁的相互有待（好些论者也曾将庄子哲学称为相对主义哲学^⑦）而成“无待”^⑧（绝对，所谓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而成三，亦即得道之德。

这由道本体经历失道、迷道而得道，或由道经历论道、求道而德的辩证过程，可说是《庄子》书的整体核心所在。庄子曾通过南伯子綦之口，向女偶发问：“道可得学邪？”而得到的答案是“恶”，但女偶却接着提出一个“撝而复成”的个体修练（见独是标尺之一）过程，所谓“三日而后外天下，……七日而后能外物，……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微；朝微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各为撝宁。撝宁也者，撝而后成者也。”^⑨由生而修练为不死不生，并不是一个由学而德的过程，而是一个由不学而德的过程。以道日损为重心之一的道家文化可称之为一种减数文化，而不是着重文化正面积累的加数文化。

德，就是要在主观上超越矛盾的有待二面。任何矛盾以至对立，都可将有关的层次撤退到无

待的一面来。任何正、反都失其偶而归合——“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穹，是亦一无穹，非亦一无穹，故曰：“翼若以明。”^⑩这个无限大亦无限小的环中虚位即圆环中空及所谓以明，正是道本位的枢纽即道枢所在。能掌握到道枢（虚，无之用，庄子是以无作为宇宙本体的），便是能回应无穹的得道。但这种德，是要化有为无、化人为天、化我为一、化一为零的一种减数文化，与一般人求积累、求正数的取向完全相反。庄子对一般人的取向提出责难，指出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⑪是为失天性、迷大道。

要达到得道之德，庄子认为“唯达者，知通一，……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固是已，已然不知其然谓之道”，^⑫“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⑬“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⑭所谓已然不知其然、不可奈何、不得已等等，都是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减到最低限度，以至形若槁木、心如死灰、不死不生、近死之生，或陶醉于病呓梦幻，便是庄子心目中的至德之人。这至德之人与道、与德的关系，也可以产生两种前提相同而实质截然相反的可能导向：

1. 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减到最低限度，可意味着对特定对象之自然结构充分掌握，顺乎客观规律。在这种意义上，至人即充分掌握客观规律，以至于道技一体化境的人。《庄子》书里著名的寓言故事庖丁解牛，就通过庖丁之口说：“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依乎天理，……被（指牛）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馀地矣。……（解牛毕）提刀而立，为了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⑮在这里，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减至最低限度（“官知止而神欲行”^⑯），是要以人的主观能动性高度发挥，以至通晓有关对象之客观结构作先决前提的。

2. 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减到最低限制，又可意味着某种宿命论的认命观。庄子通过虚构的潦倒穷夫子桑之口，说：“父母岂能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贫困之境），命也夫！”^⑰这段话，可说是庄子思想最消极处的暴露。依乎天理的科学精神（《庄子》书里是充满着对自然现象的客观观察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便变成绝对主观主义（也是绝对客观主义，总之否定

主体与客体的种种相互互动关系),安之若命变成认命、宿命。

在《庄子》书里,那位依乎天理,能够确立自我主体以将技变成道的延伸的庖丁,是达德之人;但那位以命回避一切主客观矛盾“若歌若哭”的子桑,却也被视为达德之人。这个矛盾,在庄子本人的意识形态里没有得到区别、澄清和解决。然而归结起来,不管命题范畴存在着何等矛盾,庄子对所谓达道之德的界定,却是相当清晰的,并与儒家所鼓吹仁义道德之德作出区别。庄子说:“吾所谓藏(善)者,非仁义之谓也,藏于其德而已矣,……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⑧

尽可能撤回普遍自然的道,以二与一为三即得道,这三归一就是庄子以及道家所说的德;兼且,这三归一是一种永无终止、与生命共始终的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的循环往复过程。

(四) 吾丧我——物化三态与道人三等

庄子假托南郭子基问颜成子说,今者得道的我灭亡了昔日物化而失道的我。庄子或许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的物化”范畴、并进行深入讨论的第一位哲学家。

庄子认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分性以身为殉(指所谓小人殉利、士殉名、大夫殉家、圣人殉天下),一也。……天下尽殉也,其殉一也。”^⑨人生命力里的自然性分,被文明建制所形成的种种价值取向(利、名、家以至天下等)所模铸,这些都是个体生命以外以至人以外的非人之物,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天下尽殉也,庄子这些说话的内涵大有人被全面物化为非人之意。

庄子又在谈及他自己与蝴蝶互为梦幻的虚构故事之后,接着说:“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⑩这一重物化的意思,则与前述那一重有所不同,它强调人也好、虫也好,一旦自道本体的普遍自然中分出,而与混然为一的道离开而成己为物——这重物化关系的重点,是万之于一的物化。

至于物化的人,庄子称为畸人及菑人,他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下,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⑪“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命之曰菑人。”^⑫不难看出,畸人重点在于人作为万物之一疏离于道一的物化,而菑人则重点在于人为的

文化侵蚀人的自然性分的物化。庄子对技术文明的看法,有两个重点值得注意:

1. 汉阴丈人对子贡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道之所不载也。”^⑬为了得道,汉阴丈人情愿保持用力甚多而见功寡的落后灌田技术,并拒绝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先进灌田技术。庄子是将“技”与道对立起来的。2. 庖丁对文惠君说:“所好者道也,进乎技已”,则是将技与道统一起来的。

关于庄子在道与技关系上、或人主体与技术文明关系上的观点,人们可以得出至少如下三种不同看法:1. 全盘否定技术文明;2. 并不全盘否定技术文明,但却将之维持在低度的人力技术水平下;3. 重点在于强调人之于技术文明的主体性,为了不让后者反过来支配人,便情愿使技术维持在人力比较容易直接控制的低度水平上。

庄子将机械与机心等同起来,而这都是对于道的物化。如果说庄子全盘否定文明,我觉得也是冤枉的。庄子反对的是发展的文明,而希望将文明永远保持在某种原生性的萌芽的文明形态即所谓“微明”,^⑭近乎未产生而刚产生的原始文明。所以,他借自作的盗跖训孔寓言,说:“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⑮氏族公社的母系制时代,就是庄子所向往的微明,而后母系制时代的种种发展,在庄子眼中,便都成了脱离道一本体的物化。

所谓“吾丧我”,既可理解为我失物化的蓬之心而回归于道一,亦可反过来理解为我失普遍自然在我内之道心而物化为失道;人正是在失道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为人及与道一的矛盾统一关系,然后才可能达于德。抓住这种基本关系,对理解庄子使用得相当混乱的心的范畴,是有所帮助的。例如:庄子说“与接为构,曰以心斗”,“近死之生,莫使复阳也。”^⑯“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⑰等等的心,是指失道物化的蓬之心;而“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⑱“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⑲“形莫若就,心莫若和”,^⑳“以其心得其常心”,^㉑“心有天游”^㉒等等的心,则是指克服物化而得道的道心。

扬弃蓬之心以回归道心,或解除成心以提升

游心等，正是庄子式道学与心学之间辩证关系的症结所在。大体言之，原儒是以心学吸纳道学（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⑭），原道则是以道学吸纳心学——道学才是老子、庄子对得道的修练过程，除提出了一个“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⑮的总体原则之外，还提出了所谓得道之人——道人的三个主要等级层次的标准，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⑯关于这道人三等的讨论；也可窥视出庄子对于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哲学见解：

第三等的是圣人。“圣人不从事于名，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是为“妙道之行”；^⑰“众人役役，圣人愚菴，参万岁而一成纯”；^⑱“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⑲“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⑳“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㉑“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㉒在庄子的界定里，圣人虽已一般地不直接处理具体事务，但在寻求个体解放的游乎尘垢之外的同时，圣人毕竟还有一个争取人心的国的观念、为国用兵的观念、以及议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的观念——名的范畴是可以丢弃了，但仍受着功的范畴支配着。

第二等的是神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㉓“（神人）御风而行，冷然善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㉔在庄子的界定里，神人虽已将所有的事功之心都抛弃了，所谓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孰肯以物为事，其尘垢秕糠即足以模铸尧、舜等圣人（以示神人比圣人在修练的意义上高等级），但在寻求个体解放的游乎四海之外、以至藐姑射之山等想象力解放的同时，神人御风而行毕竟还有待于风——功的范畴是可以丢弃了，但仍受着物我二分而相对有待的我己范畴的支配。

第一等的是至人，或称真人。“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雪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㉕“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自伤”，^㉖“独来独往”，^㉗“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来独往，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㉘“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㉙“游方之外者也，……游乎天地之一气，……游乎遥荡恣雕转徙之深”，^㉚“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圜垠之野”，^㉛“若乎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穹者，彼且恶乎待哉！”^㉜在庄子的六定里，至人或真人是与万物合为一体，与道本体化合为一；一方面，是宇宙在我本体里化合为一，所谓“独有之人，是谓至贵”，我在我的想象力里自由游荡，包括种种“不能热”、“不能寒”、“不能惊”等等自由王国；^㉝另一方面，是我在宇宙本体里化合为一，我自己的范畴也可以丢弃了，道本体与我为一而成为绝对的唯一存在——彼且恶乎待哉，从作为宇宙本体一部分的角度来看，种种伤害以至生死变化，都只不过是宇宙组合形式的变化，而对宇宙本体的质是没有影响的——所谓物莫之伤。庄子这种二千多年前的直观和想象，竟与近代物理学所揭示的物质不灭定律，客观地有着共同范畴。

庄子关于得道之人即道人的界定，还有着其他提法，例如天人^㉞等，但基本出不了前述三种等级。严格地说，圣人、神人都并未到得道即德的境界，而只是为道日损过程中的两种主要阶段：弃名去功，而及至达德的圣人或真人境界却是试图通过个体解放的最高限度即独来独往、独有之人作为途径，以达至熄灭个体、熄灭人本体的回归浑沌；故庄子最后将至人界定为与草食之兽、水生之虫同通，^㉟以至与螻蚁、稊稗、屎溺同通。^㊱庄子可说是一位以个体主义作手段，企求达至绝对反个体主义的宇宙本体总体论者。所谓“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㊲“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㊳庄子的意思是，人在宇宙中生存，就只是自自然然地在宇宙的普遍自然中生存，象水中之鱼、林中之兽一样，将人的特殊自然——主观能动性减至最低限度；但既然在

现实上，人不可能回归为兽、为虫、为便溺，庄子实在要比印度佛教更彻底地否定人本体，释迦不过鼓吹“众生一体”，但他更提出齐物论，那么折衷之法，便是以形若槁木、心如死灰加病吃梦幻的不生不死、近死之生，作为人生之最高境界——是谓庄子严格意义上得道、达得、归于寥天一、二与一为三的至人。

- ①见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②、⑥、⑨、⑩、⑭、⑰、⑳、㉑、㉒、㉓、㉔、㉕、
 ⑤⑩、⑤②、⑤⑤、⑥⑦、⑥⑧、⑦⑥、⑦⑦、⑧⑩《齐物论》
 ③、⑱、⑳、㉑、㉒、㉓、④⑩、④⑨、⑤⑦、⑤⑧、⑤⑨、
 ⑥⑩、⑥⑦《大宗师》
 ④、⑥④《老子》
 ⑤、③⑩、④⑧、⑥⑥、⑦⑤、⑧①、⑧②、⑧③、⑧④、⑧①《道
 遥游》
 ⑦、②②、②③、③①《至乐》
 ⑧、⑥③《天地》
 ⑩这“生之忧”是某种面对生命内在时的焦虑、不
 安、痛苦等矛盾的综合，与西方存在主义关于
 生命焦虑提法有共通性。
 ⑫、⑤⑧、⑤⑨《骈拇》

- ⑬《应帝王》、《山木》
 ⑮《外物》
 ⑯《山木》
 ⑰《刻意》
 ⑱、⑤⑤《胠篋》
 ⑳见佛洛姆：《逃避自由》
 ㉑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㉒、㉓、㉔、⑦④、⑥⑤《知北游》
 ③⑩《寓言》
 ③②《列御寇》
 ③③《马蹄》
 ③④见尼采：《查斯杜拉屈如是说》
 ③⑦、③⑧、③⑨、⑥②、⑥③、⑦⑩、⑦①、⑦②、⑦③、⑦④《人世间》
 ④④《庄子》书多以儒家人物为虚构故事的主角
 ④⑦如关锋“文革”前论庄子文章
 ⑤①、⑦②《德充符》
 ⑤⑤《养生主》
 ⑥⑤《盗跖》
 ⑦③见孔子：《论语·卫灵公》
 ⑥⑤、⑥⑩《应帝王》
 ⑫、⑥⑥、⑥⑦《在宥》
 ⑥②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⑥③《天下》
 ⑥④《田子方》



建国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综述

李 宁 冯崇义

三十五年研究概况

建国三十五年来，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49年到1965年是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开发阶段。这一阶段搜集出版了部分重要史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等上十种。史学工作者还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概括这一历史。华岗的《五四运动史》、黎澍的《从辛亥革命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丁守和、殷叙彝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堪称颇有份量的学术著作。

“文化大革命”十年，五四运动史的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惨遭浩劫，不但没有健康发展，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逆转。

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短短几年时间里出版的资料、专著、论文集达六十多种。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彭明的《五四运动论文集》就是其中的新成果。更令人鼓舞的是一些有价值的新资料不断发掘出版，如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二档案馆合编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材料》、第二档案馆编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张允侯等编的《五四时期的社团》以及各地编辑出版的五四运动的地方资料，如《五四运动在湖南》、《五四运动在上海资料选辑》、《五四运动在天津》、《五四运动在浙江》等等。这，为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特别是加强对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前景。

五四运动领导权及其性质问题

华岗在1951年出版的《五四运动史》一书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既然是在十月革命和列宁号召之下所发生，自然也就要摆脱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旧范畴，加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范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失去了领导这种运动的能力，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思想”，因其“最先进、最能动员广大革命群众”而在这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①

六十年代初,朱务善著文献疑,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领导了五四运动”的观点。文章指出,无产阶级并没有在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因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尚未成立。“正是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所以五四运动存在着很多缺点,没有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没有达到一场伟大革命运动应有的目的。”^②

朱文的发表引起了一场争论。许多论者在反驳朱文时对无产阶级领导权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有的作者指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起了组织、推动和骨干的作用,他们是运动的领导者,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③有的作者认为无产阶级对五四运动的领导除了体现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外,还体现在:第一,无产阶级已在运动中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二,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正是它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结果。^④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自发的运动。黎澍近来著文指出:“这次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根据许多参加者的回忆和事实来判断,完全是自发的,……缺乏严密的组织和领导。”不过,他又从民族新觉醒的角度指出五四运动“又是中国人民进行自觉反抗的开始。”^⑤

李新、胡华、胡绳、孙思白等在他们的论著中明确地将五四运动划分为五四爱国运动(从1919年5月4日天安门示威到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和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两个方面。对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权,他们的提法比较慎重,一般只是提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以五四事件为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化代表,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向封建主义的文化猛烈开火;后期则出现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生力军,将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主要成果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⑥

六十年代初期一些论者对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时期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问题展开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已“开始初步具有自为阶级的一些基本成份”,因为从工人阶级斗争的规模、程度、形式及其所起的作用等方面看都是空前的,而且主观上工人阶级已有比较鲜明的独立阶级意识,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而采取了独立的政治行动。^⑦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当时工人阶级“还处于自发阶段”,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尚未产生,工人阶级不可能在自发斗争中产生科学社会主义而达到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三个“理解”(即:“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⑧),也不可能真正在组织上“汇集成整个阶级的力量”。^⑨

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一般认为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不过论述角度不尽相同,有的强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赋予它“新民主主义的色彩”;^⑩有的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⑪李新等人则强调应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三方面综合考察^⑫,指出,五四运动处在旧民主主义革

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关节点上，虽然出现了指示着新方向的新质，但还不是一场成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

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普遍认为，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彻底”的含义，只是指彻底精神或坚决态度，而不是指它所达到的程度或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一扫而光，与封建思想残余作斗争仍然是长期的任务。^⑬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直是建国以来史学工作者十分重视的研究课题。五、六十年代，人们致力于揭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五四爱国运动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揭示马克思主义又如何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取得胜利。^⑭近年来，特别是1988年以来，史学工作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的争论颇引人注目。一些同志把起点远远地推前了。有的甚至推前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而指出，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构成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特色，赋予这一运动以批判资本主义、注意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变革、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初步联系等历史特征。^⑮刘桂生等则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应从五四时期以南陈（独秀）北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⑯

近年来，一些史学工作者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各地传播的具体历史。他们发现《广东中华新报》于1919年11月11日到24日，连载了杨匏安的长文《马克思主义》，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此文与李达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几乎同时问世，不愧同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我国传播的不朽丰碑。有的作者精确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起点、渠道、形式、内容及其特征。^⑰至于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上海、天津、江西等地的传播也陆续有专文论述。

近年来，还提出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三次论战的重新估价问题。有的作者对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这一结论提出了异议。指出经过这次交锋，胡适并没有“理屈词穷”，而仍有《三论》、《四论》；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也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有的作者则反驳上述观点，认为李大钊在这场论战中击中了对方的要害。经过论战，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共产主义者队伍日益扩大。因而说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论战的胜利并非过甚之词。^⑱

社会主义论战的性质问题，六十年代以来就有过争论。蔡韦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一书中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当时的新思潮之一，因而当时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一般说来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这种观点一提出，立即遭到了反驳。姚芳藩著文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冒牌之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之凶

恶敌人”，研究系拥护孔教，与封建军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把他们当作新文化运动的一分子。^⑩

对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长期以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但一些作者试图历史地肯定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所曾起过的积极作用，指出他们在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府的同时，曾经揭露过北洋军阀政府，并且提倡过勤工俭学。^⑪有的作者指出：“经过无政府主义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无产阶级的斗争，这是五四时期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路。”^⑫

五四人物评价问题

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对五四人物的研究仅涉及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几个人。近年来研究范围迅速扩大，出版了《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李大钊传》等较有份量的传记，出版了《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五四群英》等专集，出版了《蔡和森文集》、《恽代英日记》等一批文集。大量论文着重探讨了五四群英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对陈独秀、胡适等比较敏感的人物展开了富有成果的讨论。

关于五四群英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史学工作者对各人实现这一伟大转变的不同过程、不同条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涉及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衡量标准问题。张静如提出了一个颇为严格的标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了初步的了解，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赞成俄国十月革命，主张暴力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努力为此而奋斗。”^⑬最近有作者则提出了不同标准，认为应是：第一，向往和赞成十月革命，但还没有深刻认识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性质；第二，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但还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第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真正理解。^⑭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是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人们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有些作者指出，以陈独秀1920年9月发表《谈政治》一文为主要标志，说明他突破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藩篱，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因而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们同时也指出陈独秀没有完全克服早期的英雄史观，不能成为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埋下了他后来犯错误以至堕落、反动的祸根。^⑮有些论者则否定陈独秀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张静如指出陈独秀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始终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最后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⑯另外一些论者则认为陈独秀只不过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他没有彻底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世界观，更没有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⑰

胡适也是五四时期风云一时的人物。五十年代初，一些史学工作者在指出胡适在五四时期攻击马克思主义，起了反动作用的同时，也承认他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白话文、反对儒家学说等，自不能说没有一点进步作用。”^⑱五十年代

中后期，思想文化界开展对胡适的批判，人们倾向于认定胡适初以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侧身新文化运动，而当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之时便投入“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②③}甚至认为胡适是“心怀篡夺革命果实的一个文化革命中的大奸细。”^{②④}近年来，一些论者试图在一定范围内肯定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历史作用。有的作者认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因为：第一，他所倡导的白话文“不但被证明是创造新文学的利器，而且还在传播新思想和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二，他所鼓吹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社会自由等资产阶级思想客观上起了反封建的作用；第三，他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从思想角度说“有反宗教迷信的启蒙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封建思想的武器”，从文化学术角度说，他“用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对待古代文化典籍，……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独尊两千年的孔孟学说的‘神圣’外衣”^{②⑤}。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如斯评价肯定过多，有矫枉过正之嫌。

- ①②⑦ 华岗：《五四运动史》第八章，上海海燕出版社，1951年版。
- ②⑩ 朱务善：《五四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 ③ 刘惠吾：《试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文汇报》1963年2月26日。
- ④⑪ 陈慧道：《五四运动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朱务善先生商榷》，《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1期。
- ⑤ 黎澍：《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
- ⑥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孙思白、韩凌轩：《五四以来反封建文化运动之史的考察》；胡华等：《中国革命史讲义》（上）的提法稍有不同，他们指出，五四运动表明“无产阶级已经有力量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
- ⑦ 荣天琳：《论中国工人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最后阶段》，《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 ⑧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5页。
- ⑨ 项立岭：《试论中国工人运动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
- ⑫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
- ⑬ 代表作有黎澍《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孙思白、韩凌轩《五四以来反封建文化运动之史的考察》，徐宗勉、朱成甲《论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皆见《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
- ⑭⑲ 参阅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63年第1版，1979年重版。
- ⑮ 姜义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 ⑯ 刘桂生、钱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人民日报》1983年5月25日。
- ⑰ 宋斐夫、刘泱泱：《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求索》1983年第3期。
- ⑱ 谭双泉：《论“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求索》1983年第5期。
- ⑲ 姚芳藩：《我对五四时期三次论战中几个问题的看法》，《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 ⑳ 沈骏：《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 ㉑ 杨才玉：《党建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 ㉒⑳ 张静如：《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 ㉓ 韩凌轩：《关于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
- ㉔ 时进、徐华国：《怎样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邓野：《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近代史研

究》1980年第4期。

②魏知信：《评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沙健孙：《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③侯外庐：《揭露美帝国主义奴才胡适的反动面

貌》，《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④耿云志：《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胡曲园：《论五四运动时期的胡适》，见《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



邓世昌殉国情形考辨

廖宗麟

在《辞海》的《邓世昌》条目中，曾写到邓世昌管带致远舰殉国情形：“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虽弹尽舰伤，仍下令加快速度猛撞敌舰吉野，不幸被鱼雷击中，与全舰官兵二百五十人壮烈牺牲。”这段描述来源于清人姚锡光所撰《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上的记载。但姚的记载有许多失实之处，且就其中两个问题略作辨证。

一、致远舰向日舰吉野冲击问题。不少记载都提到致远舰欲冲击日舰事，但是都没有指明所冲击的对象即为吉野舰。例如，泰莱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中指出，致远舰“欲撞吉野、浪速，与同尽，而不克。”（《中日战争》第六册，第48页）则致远舰所欲撞者为两艘日舰，并不仅仅是吉野。济远舰二副守备陈天德所撰《冤海述闻》也提到致远舰向日舰进攻事，但也不能指明舰名。此外，在海战时曾“躬履行间，沈机观变”的英国海军提督斐利曼特而则指出：致远舰所欲冲击的乃日本舰队，并无十分明确之对象：“致远既受重伤，志欲与日舰同归于尽，于是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50页）《中东战纪本末》也有类似的记载。既然这些亲历战事的人所作之记载均不能指明致远舰所欲冲击者为哪艘日舰，则《东方兵事纪略》明言致远舰所冲击者即为吉野，那就未免有些失实了。

二、致远舰中吉野所发鱼雷而沉问题。有许多记载认为致远舰不是中鱼雷而是被日舰炮弹击

沉的。例如，丁汝昌在八月十九日的海战报告称：在黄海海战中，致远等舰被击沉，“倭船快，炮亦快且多。对阵时彼或夹攻或围绕，其失火被沉者，皆由敌炮轰毁。”（《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02页）战后，海军官弁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奉命总结海战失败之教训，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等人呈文称：“譬如致、靖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1页）海军守备高承锡的呈文亦谓：“水师战船贵有铁甲，甲厚则船坚，交锋之际经战持久，不易沉没。如大东沟之役，超勇、扬威、致远，皆因无甲，故中炮即透入机舱，进水沉没。”（《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6页）在外人的记载中，也指出致远舰为敌炮击沉的事实。如泰莱谓：中国“为敌炮所沉者三舰，其中有一为忠勇之邓君所统之致远舰。”（《中日战争》第六册，第48页）英国海军提督斐利曼特而也称：致远舰向日队冲击，“已垂垂到矣，不料日炮毕萃于其舰，独中沉渊之祸，惨哉。”（《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50页）《中东战纪本末》也有相似记载：“方事之毁也，邓军门督率诸勇士，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哨，无不洞合机宜。乃如孤雁之失群，船身叠受重伤，偏右斜欹，势将及溺。群见其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而去。”（《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67页）这些记载都证明致远是被日舰舰炮火击沉的。

党成立前的省港工人阶级

赧倩红 卢 权

省港地区是我国第一代产业工人诞生之地，也是工人罢工斗争和工会组织活动开展得最早的地区之一。研究本地区早期工人阶级的状况，对全面了解我国工人运动发展史具有一定意义。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探讨。

我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伴随着我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而且还早于他们，首先从帝国主义在华直接经营的企业中产生出来。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逐步侵入我国。他们虽以商品输出作为主要侵略形式，但同时也开始在中国直接投资和经营航运、船舶修造业及其他一些加工工业。广州是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外国资本主义就在广州一带进行经济侵略活动。

一八四五年，英国人柯拜在广州黄埔兴建了一个船坞公司，修理船只，这是外资在中国境内非法经营的第一个企业。五十年代后，黄埔地区又相继出现了另一些外资船坞公司，如英商于仁船坞公司及美商旗记船厂等。一八六三年，另一些英商合资收买了柯拜船坞在黄埔的全部设备，成立香港黄埔船坞公司，雇有中国工人约一千名。①再加上其他船坞，七十年代黄埔地区约有中国工人两千名左右。②这是省港地区、也是全国的第一代产业工人。

自从英国侵占香港后，便着力把香港经营为世界性的贸易港口和进一步侵略中国内地的基地。他们经营投资，首先从船舶修造业和航运业开始。一八四三年，英人揽文在香港兴建了一个小船坞。以后，其他外商也陆续在香港兴建船坞公司。到六十年代中期，外资船舶修造公司共有

九家；七十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八家。一八七六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放弃了在广州黄埔的企业，而把力量集中到香港，并逐渐吞并了其他船厂，垄断了香港的船舶修造业。该公司所雇用中国工人，经常达到二千五百人，旺季时更增至四千五百人。③

随着香港贸易的发展，来往船只不断增多，更加刺激了香港船舶修造业的发展，除了外资继续投放外，华资也在香港经营了一批规模较小的造船厂。香港造船业的迅速发展，使造船业工人队伍日渐壮大。据一篇文章称：“（香港）各造船所约有劳动者一万二千余名”。④另一外国著作称，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前，香港造船业工人不少于五万人”。⑤仅黄埔船坞便有工人四千名。⑥

航运业是外资在香港经营的另一重要行业。一八四二年，英怡和洋行派“哥萨克”号轮船开辟了香港广州间的航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外资在香港相继建立了一系列航运公司，大批来自广东各地农村的破产农民、船民和手工业者被招雇上船作工，成了中国第一代海员工人。一九二〇年，香港海员“约有二万五千人”，⑦加上一、二万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海员合共四万人左右。

香港加工工业、轻工业和公用事业等方面，也不断发展。如制糖、纺织、水泥、绳缆、制冰等企业及码头、仓库等公用事业。这些“外人所经营的工业，大致上组织规模都很宏大，主要的是新式的机械生产。”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华商也开始在香港经营织造、火柴、烟草、化妆品、罐头、玻璃、造纸等轻工业。上述中外企业的陆续兴办与发展，无疑使香港地区的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如从事机器行业的工人达一万名

(内有一部分与造船工人人数重复), 织造女工约一万多人, ⑨华资开办的南洋烟草公司有工人四千余名, ⑩码头工人有数千之众, 建造工人约一万人, ⑪电灯, 电车等公共事业工人不下数千人。

仅据以上具体数字汇计, 香港近代工人不下十万人。此外, 香港还有一批其他行业的工厂企业工人、市政工人以及在香港各机构和外国人家庭作工的洋务工人等等。据一九二五年上海总商会的调查, 香港工人约共二十五万名。⑫

广州也是工人阶级较集中的地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外国侵略者在其控制的沙面租界里, 设立了一些为其服务的企业如银行、酒店、仓库及其他一些公用事业等, 雇用中国工人约三千名, 再加上在外国人的住宅教堂等处作工的华工, 总共四千人左右, 称为洋务工人。⑬

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在广州也举办了一些近代军火工业及官办企业。一八六九年, 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创办军装机器局。一八七四年又在增步设军火局。一八八六年, 两者合并, 约有工人二百余名。⑭一九〇六年又加以扩充, 改为广东制造军械局, 工人数目也随之增加。一八八七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广州筹建制钱局, 建成后改为广东造币厂。一九二一年以前, 该厂工人达一千余名。⑮一九〇八年, 粤督岑春煊于广州创办士敏土厂, 雇佣工人五百余名。⑯由于广州市区扩充及开辟马路, 所需水泥日增, 该厂于一九一九年扩建, 所雇工人亦随之增加。这样, 一九二一年以前, 官办企业的工人人数, 不少于二千名。

在外资刺激下, 广州地区及其附近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相继兴办了一批民族工业。一八七二年, 华侨商人陈启沅于故乡南海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 雇有女工六、七百人。尔后, 三四年间, 大小丝厂计有七十余家。一八九四年, 广州地区有机器缫丝厂五、六十家, 共有工人九千余名。⑰至一九一〇年, “则全省缫丝均用机器, 多至百数十家, 妇女之佣是业者十数万人。”⑱这是我国出现最早和最集中的一支庞大的近代产业女工队伍。

为适应机器缫丝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 一些资本家相继在广州创办了联泰、广昌隆、艺兴、均和等一批机器厂。广州是我国火柴工业兴建最早的地区之一。一八七九年, 旅日华侨商人卫省轩

于广东佛山开设了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巧明火柴厂。至一九〇八年, 广州及附近各县共有十三家火柴厂, ⑲仅义和公司就有工人约二百名。⑳如据此推算, 则当时火柴业工人共约二千余名。民族资本的机器造纸、印刷等近代企业, 也于广州地区兴起, 因而也伴随产生了一批工人。

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 近代公用事业在广州地区陆续出现。一八九〇年, 旅美华侨商人黄秉常等集资创办电灯公司。一九〇五年, 美旗昌洋行经营了一电力公司, 四年后为清政府收买, 改为广东电力有限公司, 官商合办。一九〇六年, 由官商集资合办广州自来水公司, 用户有七千五百家。据一九二一年调查材料称: 广州电灯局有工人一百六十名以上, ㉑自来水厂有工人二百名以上, ㉒广州电话局有工人二百余名。㉓

一九一四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打仗, 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我国民族资本得以乘机发展。广东情况也是如此。如纺织、橡胶、机器碾米、榨油等企业, 均在广州地区兴起, 原有一些企业如火柴、印刷等行业, 也得到进一步扩充, 这就进一步壮大了民族工业方面的工人队伍。

一九二一年, “广州市内缫丝工厂十数家, 每家工人不下数百”, ㉔合计约四、五千人。“广东规模较大之针织厂达五十余所, 小工厂则数百家”, ㉕其中大部分工厂集中于广州。一九二一年, 广州地区的织袜厂“大小合计百余家, 此项工人全属女界, 操织袜者二千余人, 挑袜嘴者数亦相同, 惟打纱者, 大约不及五百人”。㉖“广州织布厂几及百家, 全市统计男女工不下二万人。”㉗广州织绸工人约有一千余人, 男女各半。此外, 织毛巾、线衫等织造厂, 为数亦不少, 其中“以宁水公司为最大, 职工约千人, 亚通公司次之, 职工亦在三百人以上。”㉘仅就上述不完全的资料统计, 广州纺织工人便达二、三万人。

一九一七年, 南洋归侨陈玉波在广州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橡胶公司, 制造橡胶鞋底。该公司“营业发达, 大获巨利”, 其他商人乃纷纷仿效。一九二〇年, “全市橡胶工厂多至二十余家”, ㉙每间胶厂所雇工人, 一般约在二百人上下, ㉚据此推算, 广州橡胶工业工人约达四、五千人。

广州第一间机器碾米厂恒丰泰创办于一九〇六年, 至一九二一年间达二十八家之多。所雇工人多的“达七十名, 其余最普通者为二十五

人”，⑤如以每家平均三十余人计，则广州碾米工人可达一千人。一九一七年后，广州相继出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的榨油业。据有关资料称：一九二一年广东油业工人达二万人，广州地区则有四千名。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广州火柴业也获得长足发展，一九二一年前广州地区增至十八家，平均每厂约三百五十人，⑦当有火柴工人六千名以上。广州印刷业也获较大发展，一九一九年有具体厂名的印刷厂便有十五家。⑧印刷工人分为排字、铸字、点石、印字及装订等五行。一九二一年，广州全市“排字行（工人）已有三千余人”，“其余四行，或达千人，或数百不等。”⑨广州地区的机器厂“先后成立，共有二十余家之多”，一九二一年广州市区机器工人“约有三、四千人”。⑩

仅就上述情况统计，一九二一年前后，广州地区属民族资本的工厂工人，共约增至五万人左右。

从一九〇三年起，广东境内先后修建了广三铁路、广九铁路、粤汉铁路（广东段）以及潮汕铁路、宁阳铁路。据记载，一九一六年广九路共有工人四百四十名，广三路有工人一百五十余名。⑪一九二一年粤汉路（广东段）工程处、车务处及机务处共有工人一千四百七十名。⑫宁阳铁路约有工人一至二千名，潮汕铁路约有工人五百名。⑬据此合计，广东铁路工人约共三、四千名。此外，各铁路还设有机修厂、木工厂、铁工厂等附属工厂，亦拥有一批工人。

广东境内河流密布，海岸线长，水运发达，因而拥有一支数目庞大的航运工人队伍。一九二一年“广东轮船工业同业，统计不下二万人”，“入（工）会会员共约八千三百余人”。⑭

广州是国内繁盛的城市之一，人口众多，一九二二年，广州居民“人口七十八万七千人，然事实上当在一百二十万人以上”。⑮因而市内拥有一支数目庞大的市政工人队伍。如一九二〇年广州粪便工人“实有八千余众”。⑯广州人力车夫“一九二〇年六月前为四千人，自马路开辟后，人力车大增，车夫亦增至五千余人”。⑰广州运输工人则“不下万人”。⑱

据以上资料统计，党成立前广州地区共有近代工人约十万人。⑲再加上手工业工人及店员等，⑳共约二十万人。㉑

除广州外，潮汕、佛山等城镇也是广东省内工业较发达的地方。一九二一年前后，汕头约有

工人一万余人，㉒潮州有陶瓷工人三千余人，㉓佛山石湾有陶瓷工人一万余人，㉔等等。

还要指出，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投资矿业等，因此我国采矿业有所发展，矿业工人亦随之而增加。一九一六年，全国矿业工人达五十三万人，其中广东矿业工人则从过去一千人增至十一万余人。㉕

综合上述，估计在党成立前，省港工人总数约为五、六十万，其中近代工人不下三十万左右。

在省港工人阶级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工人分布较集中。从地区分布看，大部分工人集中在香港、广州两地；从职业分布看，则集中于造船、航运、纺织、矿业等行业。香港工人又多集中在外资企业中。工人集中，就有利于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有利于显示其阶级力量和开展斗争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大规模的工业不够发达，机器工业数量不多，因此，省港工人虽有五、六十万，但其中真正属于产业工人的数目却不多，特别是广州地区，真正的产业工人仅限于交通、军用和公用事业等部门；数百人以上的工厂也不多，相当数量工人只是在规模较小的工厂里作工。这部分工人实际上只算是手工工厂工人。在这样的生产条件下，他们身上小生产者的观念较浓，容易受小资产阶级思想以至封建意识的影响，因而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又会带来消极因素。

二

“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就开始了厂主对工人阶级的前所未有的、毫无限制的和肆无忌惮的剥削。”㉖省港工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本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剥削，处境凄惨。

工人们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般都超过十个小时以上，而工资收入却十分微薄。普通工人每月收入一般仅得一、二十元，熟练工人也不超过三十元，几乎无法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如在外轮作工的香港海员，日常“做至十二小时”，甚至“每天做工长达十七、八小时”，而所得工资，低的仅得十元左右，高的也不超过三十元。㉗香港

造船工人名义上每天工作九小时，但因工资太低，入不敷出，因而往往超时工作至十三小时以上。广州机器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一般“由上午六时至下午五时”，有些“则有至夜间九时半方算一工者，计有十三、六小时”，^⑭而工资一般约为二十元，有些厂则“少至七、八元至十五、六元者”。“其工值之微，工时之长，不只为世界机业所无，抑且别类行业所未有”。^⑮

省港工人生活费用昂贵，物价不断上涨，工资又长期未能增加，日子更为难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物价相比，香港白米每百磅价格由四元五角涨至九元，每月房租由七元涨至十二元，土布及其他日用品均涨价一倍。^⑯而工人工资却长期未获提高，生活十分困难，不少“香港海员丝毫无能力积蓄，所以家庭供给时不能济，因而卖妻鬻子者，往往有之。”^⑰

工人收入虽然如此菲薄，但仍要受资本家、包工头的重重盘剥掠夺。香港造船等行业工人，进厂前后都要缴交数额很大的“猪仔费”。不少工厂盛行罚款制，动辄借故对工人罚款。如广东造币厂规定，如工人有争先挤拥、嘻笑喧哗、取巧误工或造谣生事等情者，每次要罚扣三至五天工钱。此外，资方还经常无故拖欠，克扣工钱；逢年过节，向工人勒索礼物。种种手法，真是层出不穷。

工人们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又十分恶劣，很多工厂都没有安全设备，工伤死亡事故时有发生，而资方视工人生命如草芥。如在外轮作工的香港海员，在舱底作工的，终日站在高温的火炉旁，没有降温设备，“常常因热度太高，不能抵受，加以待遇苛刻，百般痛苦，有跳入海死的”。^⑱广东不少工厂大量招雇女工和童工。如香港南洋烟草公司“雇用未满十六岁之女工，竟占全厂人数十分之三”，她们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与男工差不多，但收入却往往不及男工的一半。

省港工人，特别是香港工人，更直接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他们被辱骂为“劣等民族”、“下等人”。他们的工资待遇与外国籍海员相差甚远，前者工资仅及后者的四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一。外籍海员一般一、两人住一间房，而香港海员却往往十多人同挤在一间空气混浊昏暗的斗室里。当轮船经过外国一些港口时，中国籍海员往往要受通咽喉、肛门等侮辱人格的体

检，还不准上岸。

工人们深受封建主义和旧势力的压迫剥削。在很多企业中，资方设包工制，并制定了一系列苛刻条例，以控制压迫工人，甚至剥夺工人的人身自由。如一九〇八年，广州火柴行业资本家为了共同对付工人，联合成立了一个“启源堂”，制订各种压迫工人的条例，凡工人不服管理等情而被开除者，“启源堂”便通告各厂，一律“不得徇情录用”。^⑲广东士敏土厂及广东官纸印刷厂所订章程，都有压迫工人的条款。资本家利用封建行会、邦口来束缚控制工人。如在一艘轮船上，资方往往同时雇用不同籍贯的海员，以便利用他们之间籍贯、语言及生活习惯各不相同，从中挑拨离间，分裂他们之间的团结，从而达到控制、压榨他们的目的。

广东工人还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如广东佛山石湾工人万余，失业工人达七千余人。香港失业海员经常达一、二万人。他们生计无着，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悲惨异常。

三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⑳省港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剥削，因而很早就奋起进行反抗斗争。

早于一八四四年，香港工人为反抗香港当局勒收“人头税”举行罢工，斗争坚持了三个月，终于迫使香港当局宣布缓期施行。一八五七年，香港工人为抗议英法联军侵入广州，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至翌年三月，先后离港返回广州者达二万余人。一八八四年九月，香港工人为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挑起中法战争，又一次举行了罢工。造船工人、搬运工人、店员、车夫、轿夫、旅业工人、船工等都参加了斗争，“凡我中国士民，莫不志切同仇，心怀敌忾”。^㉑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终于取得了胜利。

一九〇五年，广东工人积极投入反美爱国运动。他们“集众矢誓，实行不扛美货”。^㉒在广州白鹤洞承建美孚洋行工程的部分建筑工人，决定“如美国不废苛约，即行停工，以示抵制。”^㉓

辛亥革命时期，广东工人也积极参加了反清革命活动。特别是香港海员工人，积极协助革命党人运送军火，转递消息，筹备经费以至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一部分海员积极分子如陈炳生、

苏兆征、林伟民等，还先后参加了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清朝统治的活动，成为辛亥革命时“广东方面的活动分子”。^④

广东工人也为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维护起码的人身权利而举行斗争。如一九〇八年香港太古船厂因洋人监工无理殴打中国工人，激起全厂机工的愤怒，一致怠工抗议，迫使资方向工人赔礼道歉。一九一二年，顺德丝厂女工五千人反对厂方以贬值的纸币发放工资，以及反抗虐待工人而举行罢工，其规模之大，“实中国向所未有之举”。^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一方面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他们所受压迫剥削也日益加深，生活处境每况愈下，因而他们的反抗斗争也就有了进一步发展。

一九一五年，广东工人同全国各地人民一道举行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的斗争。部分海员工人拒载日货，“查近日四邑轮船公司，系由港开往新会北街，一律实行不载日本货物”。广州搬运工人“将日本输入货物剔出，拒不肯挑。”^⑥一九一五年，香港部分造船工人向资方要求将“判工制”改为“日工制”，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九小时，以减轻对工人的盘剥。一九一八年五月间，广州石井兵工厂工人为抗议厂方拖延发放工资，相率罢工，厂方“恐酿事端”，只好“将各工匠薪饷清发”。^⑦

在省港工人初期的斗争中，曾经出现过一些工会组织的萌芽。如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间，广州搬运工人成立了“打包工业联合会”的组织。^⑧一九〇四年，广州的木匠、石匠及油漆工人曾联合建立工会。^⑨广州机器工人于一九〇九年参加了“机器研究公会”。香港机器工人也成立了“研机书塾”。一九一八年，两者联合成立“中国机器总会”。^⑩辛亥革命前后，香港海员先后成立了“联义社”、“公益社”及“慈善社”等团体。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八百余人组织了“惠群工社”。^⑪至一九一九年，省港共有工会二十六个。^⑫

在上述省港工人早期的斗争与组织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省港工人从其诞生之日起，便英勇地投入了反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他们尤其具有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迫切要求团结和组织起来。另一方面，省港工

人的斗争，还处于早期的和初级的斗争阶段。省港工人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进行活动。斗争规模不大，分散孤立，只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⑬至于这时期的工会组织活动，或为劳资混合，或仅抱“求工艺之进步”的目的，因而仍属于萌芽状态的行会工会的性质，还谈不上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使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号召下，省港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并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罢工斗争较前频繁，规模较前扩大，涉及面较广。如香港海员从一九一九年以来，接连举行了一系列斗争。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来往香港至广东内河航线海员因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有轮船十五艘不能开行”，“尚有多艘抵港后，亦将停驶”。^⑮资方恐怕“风潮蔓延，则严重之情势将发生”，^⑯终于接受海员的加资要求。翌年，在一艘英国轮船作工的香港海员，在苏兆征带领下，毅然举行了反对包工头无理殴打海员的斗争，其他轮船的海员纷纷响应，终于迫使资方辞退该包工头。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〇年一月至十二月，省港工人举行罢工达十七次以上；一九二一年仅五月一个月，则发生了十五次罢工。上述罢工涉及航运、铁路、电话局、机器、洋务、榨油、建筑等行业，罢工人数少则数百人，多则达数千人。如一九二一年四月间，广东境内东江、北江和西江的小轮渡工人七千余人，为要求加资而联合举行罢工，取得了胜利。

第二，多数罢工是直接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举行，较明显地“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⑰在不少罢工斗争中，工人们较明确地提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待遇等要求，并开始意识到这些斗争是为了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如一九二〇年四月间，香港机器工人罢工时发表宣言说：“途来百物奇昂，米珠薪桂，终年食力，入不敷出，困苦艰难，问天无语。厂主无情，诸多搪塞，哀求数次，总不加工，忍气沉沦，般般轻视。凡有血气，莫不裂眦”，“跻吾侪于黑奴之列，视我辈若亡国之民，般般轻视，种种侮辱，若不奋起，岂得为人！”^⑱一九二一年五月间，广州机器工人在宣言中明确提出，如厂方不答应增加工资

的要求，就要“采用工人抗争利益的手段。”^⑦

第三，带有同盟性质的罢工有了明显增加，斗争方式与水平也有所提高。好些罢工都是当地甚至几个地方同一行业的全体工人一致行动，或者各行业工人之间互相支援。如一九二〇年四月间，香港机器工人五千余人一致举行罢工，香港所有船厂、水泥厂、制冰厂、电车、煤气、电力、自来水等企业的机器工人和广州地区机器工人也奋起声援，终于迫使资方答应了加薪要求。一九二〇年底，粤汉铁路英德站工人要求发还欠薪而罢工，几天后，“全路（广东段）工程各部工人，业已一致行动矣。”^⑧

第四，在斗争实践过程中，工人们也日渐认识到组织工会团体以保障工人利益的重要意义，因此工会组织活动有了迅猛发展。据有关资料称，在一九二〇年香港机器工人罢工胜利推动下，“使南部工人尤其是广州工人受了很大刺激，由二十六个增加到一百个工会了。”^⑨香港地区成立的工会数目也差不多。一九二一年三月间，香港海员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是我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会组织之一。

第五，省港工人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一九一八年，在华侨工业联合会的主持下，广州士敏土厂、雄球丝织厂、石井兵工厂、协同和机器厂、印字行、茶居行、理发行等行业工界代表集会，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广州出版的报纸也冠以《工人万岁》的题目对这一活动加以报道。^⑩此后数年，广州、香港、汕头等地工人连续举行纪念“五一”节的活动，并且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广东工人与青年学生一道，投入了抵制日货等各种反帝爱国活动，一些工厂工人还邀请爱国学生前往工厂演讲。

这期间的广东工人运动，也暴露了一些较为突出的弱点。由于广东工人中产业工人数量较少，力量较弱，相反小工厂工人，手工业工人数量较多，因而在工人队伍中仍存在较浓厚的小生产者思想观念，一定程度地影响着工人的活动和斗争。如在组织工会过程中，同一行业往往分别成立若干工会，如饮食行业就同时成立了酒楼公余社、酒楼茶室工会、粉面茶点行公会等四、五个工会组织。不少工会的上层组织，往往仍被一些政客、工贼所把持，受资方的影响。他们在工

人中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纠纷，给工运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

其次，省港与海外接触较早较便利，既易受世界革命潮流的促进，也易受欧美工运中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正如邓中夏所指出的，“香港为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免多少渲染英伦职业工会的影响，香港那时就有这类欧化的行会工会。这种影响于是由香港间接及于广州。”^⑪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组织无政府主义社团同时，也插手工人运动，在一些手工业工人中组织了“工人合助社”等团体。他们鼓吹工会只应是松散的组织，反对严密的组织纪律。这对工人阶级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强阶级的团结和提高战斗力十分不利。

虽然如此，由于省港工人身受三重压迫，处境每况愈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有增无已，工人运动仍然继续向前发展。工人阶级在斗争活动中所表现的觉悟与力量，也日益引起了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注目，促使他们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下半年，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广东工人生活及处境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工人中开办夜校，帮助工人组织工会。他们还创办了《广东群报》等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及介绍工人的生活及斗争情况。共产党组织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一九二〇年底一九二一年初，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到广东工作期间，也亲自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公开发表文章，号召广州青年“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⑫由于党组织加强在工人群众中的积极宣传和组织活动，从此，省港工人运动呈现了新的面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①、②、③转引自汪敬虞、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的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年第3期。

④《香港九龙之将来》，载《东方杂志》，第15卷11号，1918年11月15日。

⑤（苏）阿卡托娃：《省港大罢工》，东方学术出版社，1959年。

⑥记者：《香港罢工纪略》，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1日。

⑦雁声：《香港海员的劳动状况》，载香江晨报社

- 编《劳动号》，1920年5月1日。
- ⑧李史翼、陈湜：《香港——东方马尔太》，华通书局出版，1930年。
- ⑨、⑤⑨、⑦⑧雁声：《中国劳动者第一次罢工的胜利》，载香江晨报社编《劳动号》1920年5月1日。
- ⑩《广东中华新报》，1919年6月7日。
- ⑪《广东群报》，1921年6月13日。
- ⑫转引自荣天琳等：《五四前后的中国工人阶级》，载《北大史学论丛》。
- ⑬据省港大罢工老工人梁国志等回忆资料（未刊稿）。
- ⑭参考《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187页。
- ⑮、⑳、㉑、㉒《广州劳工状况调查录》，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7号，1921年4月10日。
- ⑯据《广东经济年鉴》（1940年度），第14章。
- ⑰、⑱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955页。
- ⑲、⑳《中华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10月出版。
- 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1200页。
- ㉒、㉓《广东群报》，1921年5月14日。
- ㉔《广东群报》，1921年1月22日。
- ㉕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
- ㉖《广东群报》，1921年6月14日。
- ㉗《广东群报》，1921年3月3日。
- ㉘《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第11章：工业。
- ㉙据《广州之工业》，广州市立银行经济调查室编，1937年。
- ㉚广州市工商联编：《广州米粮业历史资料汇编》，第37页。
- ㉛高语罕：《广州纪要》，1921年。
- ㉜据《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称：1923年广州共有火柴厂21家，共工人7400名，平均每厂约350名。
- ㉝《广州指南》，1919年11月出版。
- ㉞《广东群报》，1921年3月10日。
- ㉟《民国五年国有铁路各路总况》，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1期，1918年。
- ㊱据《广东群报》，1921年3月18、19日。
- ㊲据《上海商报》1927年1月17日记载，宁阳路工人有2000名，潮汕路工人580名。1921年至1927年间，宁阳、潮汕两路规模应有所变化，现推算1921年间两路工人数字各为1000——2000名及500名左右。
- ㊳《广东群报》，1921年7月4日。
- ㊴李宗黄：《新广东观察记》，1922年出版。
- ㊵、㊶《工界》，第10、11期，1920年8月1日至14日。
- ㊷《广东群报》，1921年4月7日。
- ㊸另据1925年上海总商会调查，当时广州有工人十万名。
- ㊹据邓中夏《一九二六年的广州工潮》称，当时广州有手工业工人约十二万人，店员工人约一万二千人。
- ㊺据《广州纪游》（高语罕）称：“广州市工人数目，约在三十万以上。”《新广东观察记》（李宗黄）称：“当时广州工会会员人数当在二十余万。”《一九二六年的广州工潮》（邓中夏）称：“广州工人共计二十万人”。
- ㊻据《伟大祖国的广东》（油印件，未公开出版）。
- ㊼《广东群报》，1921年3月12日。
- ㊽《天声日报》，1918年6月15日。
- ㊾转引自《第一回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出版。
- 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76页。
- ①雁声：《香港海员的劳动状况》，载香江晨报社编《劳动号》，1920年5月1日。
- ②、③《广东群报》，1921年5月14日。
- ④苏兆征在中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1月。
- 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 ⑧《述报》，1924年9月24日。
- ⑨《1905年广东人民反美运动大事记》，载《广东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
- ⑩丁又：《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辑。
- ⑪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 ⑫《时报》，1912年11月8日。
- ⑬《人权日报》，1915年4月6日。
- ⑭《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5月22日。
- ⑮据陈达：《中国劳工问题》。
- ⑯据《东方杂志》，第1卷第10号，1904年12月1日出版。
- ⑰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33年。
- ⑱据《广东劳工的运动史》，载《青年周刊》，第4、5号，1922年8月22—26日。
- ⑲、⑳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

1926年。

⑰、⑱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⑲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0日。

⑳上海《申报》，1919年12月24日。

㉑《广东群报》，1921年5月27日。

㉒《广东群报》，1921年1月5日。

㉓据《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5月2日。

㉔陈独秀：《敬告广州青年》，载《广东群报》，1920年10月20日。



全国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在广东召开

全国“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广东省社联、中共广东肇庆地委、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高教局等十个单位联合召开的。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总干事王正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广东省社联主席张江明等主持了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百九十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共六十余篇。

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为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而召开的。会议以胡乔木同志的重要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基本精神作为指导思想。这就是：研究和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个具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作指导，而不应当用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作指导；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应当有助于社会主义实践的进行，而不应当去损害这种实践，为这种实践设置障碍，制造困难。

这次会议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运用说服、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着重围绕关于人道主义两种含义的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的价值、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上，不同观点都进行了交锋，进行同志式的商榷，在相互切磋中共同前进。会议的气氛是热烈和融洽的。

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胡乔木同志的文章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就我们应当怎样来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究竟应当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作为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等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方法论和实践的意义。认识到这篇重要文章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指明了方向，但是，不是为这一讨论封了顶。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问题是大有研究和探讨的余地的。

通过讨论，收获很大，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大家结合回顾哲学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普遍认为，乔木同志的文章提出区分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一个创见，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不少同志从理论上、实践上和历史上阐述了这种区分的根据，并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提出了论证。第二、通过对出发点问题的讨论、比较和分析，使大家对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认识更加具体化和深刻化。第三、通过讨论，大家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涵义的理解比以前具体得多，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共产主义道德以及同作为伦理道德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关系的了解，也有所提高。第四、在探讨人的价值的方法论问题上，认识也有所前进。第五、对异化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对马克思提出异化问题的发展过程也作了分析，大家认为，把资本主义的异化硬套到社会主义制度中来是不对的。

大会号召广大的哲学工作者，把理论研究同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结合起来，努力开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局面。

（广哲）

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史实考辨

桑 兵

1903年旧历元旦的东京留日学生会馆排满演说，是辛亥革命时期具有一定政治影响的事件，曾在留日学界和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它象一朵报春花，预示着革命热潮即将来临。然而，目前史学界关于此事引以为据的两条主要资料，即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和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的有关回忆，却有不少失实之处。两人的回忆是这样的：

“壬寅、癸卯间，东京学生杂志风起，高谈民族主义，倡言革命，而讳言排满。先生（按：即孙中山）忧之，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匣剑帷灯之宣传无益也。召成禺及马君武赴横滨曰：‘吾朋侪中有勇气毅力，莫如两子，余非依违两可，即临阵脱逃者。民族革命，要在排满，舍排满而言民族，其能唤起国内人民之清醒乎？今有一机会，元旦留学生团拜，欢迎振贝子，公使蔡钧、监督汪大燮皆在，开演说会。禺生与君武，能提出排满二字，以救中国，大放其辞，自能震动清廷，风靡全国。禺生楚人，君武原籍湖北蒲圻，彼亦楚人也。身家性命功名富贵之徒，不足以言亡秦之事矣。’元旦日，莅留学生会馆，首由马君武登台演说排满，声泪俱下，予继之。当日全国通电，皆言刘成禺，而不言马君武，故予一人获罪。”^①

“癸卯元旦，各省学生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正团拜礼，到者千余人。清公使蔡钧亦到。时有广西人马君武，湖北人刘成禺先后演说满洲吞灭中国之历史，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慷慨激昂，满座鼓掌。满宗室长福起而驳之，为众呵斥而止。事后刘成禺因此被开去成城学校学籍，不许入士官学校。长福由蔡钧力保，得充横滨领事。”^②

这两条记载，乍一看言之凿凿，仔细推敲，则难以奉为信史。下面对其中的疑点逐一进行考证。

一、演说的时间及与会人数。冯、刘两人的回忆称演说发生在癸卯元旦，即1903年1月29日。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著作均沿用此说。但当年《选报》第51期发表的详细报道《满洲留学生风潮》一文记载：“新正初二日，东京留学生会馆大集同学，兼请国人到馆演说”。据此，则演说的具体日期实际是1903年1月30日。《选报》的主持者与留日学界关系相当密切，并在东京设有访事人，从行文上看，这篇报道似为录自东京的来稿而非捕

风捉影的传闻，因此可靠性较大。当时有些报刊的报道标以“元旦排满演说”，应系泛指。

关于与会人数，冯自由说有一千余人，而《选报》记为五、六百人。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中的学生题名录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为642人^③，除去一些未到会的学生，估计与会人数在600人左右。《选报》的记载是准确的。

二、演说者的问题。据刘成禺、冯自由的回忆，当日演说排满者为刘成禺、马君武两人，然而从当时的报道看，发表排满演说的只有马君武一人。《选报》发表的《满洲留学生风潮》一文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大会的过程：“时有广西马某在座，众首推之，马登坛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应如何仇视，如何看待。座中除三十余名满人外，约有五六百人皆鼓掌。逾刻满人互相语曰：宁送朋友，不与家奴，诚吾人待汉奴不易之策也。马退而湘人樊锥继之，言中国患在外而不在内，满虽外族，仍为黄种，不宜同种相仇，与人以鹬蚌之利。满堂寂然无和之者。最后则汪大燮续演，略谓诸君皆在学年，正宜肄力学界。语曰：‘思不出其位，吾敢以为诸君劝之’”。据此，这次大会共有三人演说，即马君武、樊锥、汪大燮。后两人的演说，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反对马君武的主张。此外《黄帝魂》中的《满学生与汉学生》一文也说：“元旦学生会馆演说，有某生者，主张排满”；陈天华的《狮子吼》说：“留学生在日本，有一个会馆，每年开大会两次。有一回当开大会之时，一人在演台上，公然演说排满的话，此时恃着人众，鼓掌快意。”^④可见，当天演说排满的只有马君武一人。马君武虽与梁启超和《新民丛报》关系十分密切，却怀抱革命宗旨。他利用时机鼓吹排满，是十分自然的事。

至于刘成禺，则并没有在会场上演说排满，而是乘势响应，“在《湖北学生界》畅说人种，与元旦议论颇多疑似，故亦为满学生所忌。”^⑤刘成禺的文章题为《历史广义·内篇》，连载于《湖北学生界》第一期和第三期上，其第一章即为《人种》。由于两人当时在不同场合发表过排满言论或文章，又同时出现在有关报道之中，容易使人产生误解。1903年12月《汇报》的一篇论说已将演说者误记为刘成禺，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中也只提到刘成禺的名字，后来刘自觉不妥，撰文为马君武表功，然而有意无意间又把自己加了进去，结果虽然刘、马之误部分得以纠正，演说者却由一人增为两人，真是越理越乱了。

三、关于演说的策动者。刘成禺说这次演说的策动者是孙中山，并且详细引述了孙中山召他和马君武去横滨面授机宜的谈话内容。可是，唯其愈详则漏洞愈多。孙中山是1902年12月初离开日本由香港转赴河内的^⑥，此时距癸卯元旦尚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孙中山布置得如此具体周详，本身已属可疑。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元旦团拜已成通例，可以预先计及，清贝子载振去日本一事，却无论如何是孙中山当时不可能得知的。1902—1903年间，载振曾两度去日本。第一次是1902年9月，处理留日学生为成城学校入学一事与驻日公使蔡钧所发生的冲突。他于9月5日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召集成城、弘文、同文、清华、帝国、高等商业等校中国留学生四百余人，鼓吹了一番他的所谓“爱国”观念。9月24日回国。第二次去日本，是在1903年4月底至5月底。他此番东渡，是为了参加日本在大阪举行的劝业博览会。载振这次到日本，并未与东京留日学生会面。孙中山

既不可能在1902年12月上旬就得知载振将来日本，而载振也不可能出席1908年1月80日的东京留学生会馆大会。可见这次演说虽然很可能是受了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但直接的策动者却不是孙中山本人。

四、关于长福。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以及其他一些记载说，当马君武演说之际，满族学生长福从座位上跳出来大肆反对，并由此得到清政府的青睐，事后由蔡钧保荐，当了横滨领事。《苏报》报道却说：“今年元旦留学生会馆演说时，有满人长福闻而鼓掌，某满人怒之以目。迨回寓将时〔时将〕责福曰：‘彼毁我满人，汝何鼓掌耶？’某曰：‘吾未闻其有毁我满人之语也，其所言善，吾安得不鼓掌？’”^⑦这一记载所刻画的长福，完全是另一幅模样。他非但没有跳出来反对排满演说，而且是满族学生中唯一与汉族学生一齐鼓掌表示赞同的人。两种记载，截然相反，一个是面目可憎的跳梁小丑，另一个却是凛凛正气的进步学生，究竟哪一个是历史上真实的长福？

从各方面材料看，冯自由笔下的长福是被扭曲了的形象或是张冠李戴。长福，字寿卿，清朝宗室，从1898年起以工部员外郎任记名外务部章京。1901年11月，他与其他二十五名满族学生东渡日本，进入弘文学院警务科，并担任学长。^⑧留学前长福的思想状况，据他本人说，为官数年，昏昏扰扰，“甲午之役，渐知自愧，戊戌之变，寻知自强，至庚子之变，发奋投袂，游学东瀛。”^⑨留学期间，他潜心研究日本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日本官制及一切法度，都知之甚详。^⑩1902—1908年，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发表劝同乡父老送子弟游学书。长福也慨然挥毫，撰写并发表了长篇《劝游学书》，呼吁八旗青年子弟东渡扶桑，为国求学。文章劈头一句：“呜呼！我中国今日几不国矣！”接着历述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种种野蛮侵略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惨痛事实，指出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使中国“门户尽失，无险可据，而列国惟以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公例，日寻竞争。我不筹防止之术，则举凡利权胥归乌有。”对于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骇人暴行，长福尤感痛心疾首，肝胆俱裂；同时清醒地指出：列强所以没有瓜分中国，“非我有所恃，亦非彼有所不能也。盖以列强势均力敌，莫敢先发我。”他呼号国人，奋发自强，提出中国必须矫正三大弊：一，不可过重保守，墨守古说。二，爱国当有热心。三，不可缺乏公德。长福不仅具有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和救国切望，作为一名满族学生，他还对十八省同胞怀有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他痛斥当此亡国惨祸临头之际，满人仍然歌舞升平，昏庸误国，“愧我直奉八旗之人，犹复醉饱酣歌，安于扑塞固陋，而不知可危孰甚，可鄙孰甚哉！”辛丑和局虽成，“重以赔款四百余兆，负债五十年，虽各省为我分负之，而我直奉八旗之人，问心能不耻乎？”为此，他呼吁直奉八旗子弟源源赴东，“考求各种专门学术，迨至卒業回华，各就所长，施诸行事，”使得“民德日进，民智日开，民力日厚”，这样才不致“无以对各省之为我同负巨款，”而“我直奉庶不为十八省同胞所见弃也！”^⑪这封书信洋洋数千言，饱含痛楚、悔恨和愤懑，爱国救亡激情，充满字里行间，比之于其他各省留学生所著劝游学书，毫不逊色。无怪乎《汇报》发表专文对此加以评论：“宗室长福劝八旗子弟游学一书，觉得脑筋为独灵。其目的为最准，其

思潮与心血尤为极膨胀而极热诚，然后叹八旗中莫谓无人，固自有识时务之俊杰在也。”^⑧

长福的思想倾向还不止于此，从爱国救亡的动机出发，他甚至对于排满革命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长福回国后，1903年6月3日，曾与外务部同僚孙宝璋等人置酒纵谈。席间他说：“今日之游学日本者，多主张革命排满，或立会，或演说。吾虽满人，决不斥以为非，引以为忧。”孙宝璋一见之下，不禁赞叹长福“人极开敏，其脑中已灌注无限新理想。”^⑨孙氏热衷西学，主张改革，在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中是新派人物。如果长福是一个顽固守旧甚至极端反动的人物，决不会得到他的如此赞赏。

长福这种思想倾向在行动上也有一定的体现。1903年5月，他在东京和另外三位满族学生一起，毅然参加了革命色彩较强的爱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这个组织的13名干部中有8名是革命团体青年会的会员，刘成禺也是会员，如果长福在三个月前刚刚扮演了一个反对排满革命、人人唾弃的丑角，恐怕就未必会加入，也未必会被留学生们准许加入这个组织。

冯自由说长福因反对排满演说有功，由蔡钧力保当上了清政府驻日本横滨的领事，则更是无稽之谈。长福的确在日本任过领事，但既非由蔡钧保举，也不是在横滨，更不是由于反对排满演说而得到的奖赏。事实是，1903年5月中下旬，长福由日本启程归国，^⑩在外务部任候补主事。1904年8月26日，横滨总领事请假销差，驻日公使杨枢以“横滨一埠，最称繁杂，侨寓该埠之华商多系广东人，商情颇难接洽，现值考察商务，呈报商部之际，该埠领事更须慎加遴选，以期得力”为由，举荐原神户正领事吴仲懿（广东人）调补横滨总领事，而让长福接任较次要的神户正领事一职。^⑪蔡钧早已于1903年10月15日离任，^⑫此事与他毫无关系。杨枢保举长福，不过说他“年富力强，趋公勤慎”，^⑬根本未提及反对排满演说的“功劳”；而且以横滨正领事的空缺让神户领事接充，只让长福当地位较低的神户领事，可见对他并无特殊恩遇。此次调迁不知因何故而未实授，到1907年9月3日，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又再次提出让当时仍以外务部候补主事名义在神户领事馆办事的长福当神户领事。^⑭到第二年的5月27日，长福即已离任，所遗职位由长崎领事张鸿调补。可见他在宦途上是颇为失意的，根本没有丝毫血染顶子、官运亨通的迹象。

实际情况是，当马君武演说时，满族学生虽然忿忿不已，但众怒难犯，只能窃窃私语，都不敢公然表示反对；改良派的樊锥腆着老脸上台鼓吹了一番满汉“不宜同种相仇”的论调，却无人响应，弄得十分狼狈，监督汪大燮慑于学生声势，也不敢正面反驳，只是让学生专心于学业；并没有长福从座位上跳出来反对排满演说一事。而蔡钧因成城学校入学事件遭到留日学生的群起而攻，几乎砸了饭碗，此时仍心有余悸，生怕又激起风潮，藏头缩尾，不敢露面，何以保荐长福？

长福其人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他的思想和活动说明，甲午战后，由于亡国危机的日益严重和西学的传播，不仅汉族知识分子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的知识分子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们中间不仅产生了象良弼那样利用所学到

的新知识来死心塌地维护清朝统治的反动分子，也出现了一些倾向于开明、赞同改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长福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们本来可以而且应当为中国的革新贡献力量的，可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不出一个能够动员包括统治民族中的进步分子在内的人民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正确纲领口号，排满的声浪掩盖了他们身上焕发出来的民主精神的光芒，使其湮没无闻，难以有所作为。长福的出现及其言行，只能成为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统治垮台的必然性的一个小小例证，以增强我们对社会变革时期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之间联系与区别的认识。长福的形象在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民族偏见的长期侵蚀中已变得面目全非。今天，是我们依据确实可信的史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还长福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 ①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第46页。
- ②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第48—49页。
- ③该报告统计到1903年3月止，共668人，其中有26人是旧历元旦后才到日本。
- ④《陈天华集》（中国文化服务社版），第172—173页。
- ⑤《记满汉留学生之冲突》，《苏报》1903年3月9日。
- ⑥孙中山抵达香港的时间是1902年12月13日，当时香港至横滨有英、法、日等国轮船通航，途中正常航行时间为6—7天。参见《东游统计表》，《岭东日报》1903年12月7日；《游学详记》，《汇报》第392号，1902年7月9日。
- ⑦《由日本回国者之谈话》，《苏报》，1903年4月24日。《选报》第51期《满州留学生风潮》记载与此基本相同。
- ⑧《满州警察学生之历史》，《苏报》，1903年6月12日。
- ⑨长福：《劝游学书》，《湖南官报》第294号，癸卯正月。
- ⑩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癸卯五月十四日（1903年6月9日）。
- ⑪长福：《劝游学书》，《湖南官报》第294号，癸卯正月。此文在《新世界学报》续编的《经世文潮》杂志上亦曾刊载。
- ⑫《论宗室长福劝八旗子弟游学》，《汇报》第534号，1903年12月2日。
- ⑬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癸卯五月八日（1903年6月3日）。
- ⑭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于5月11日，而6月8日长福已在北京，计及途中航行时间，估计其归国日期当在5月中下旬。
- ⑮《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调人员派充领事官折》，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六日，《交涉史料》卷68，第25页。
- ⑯《驻日本大臣蔡钧致外务部电》，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交涉史料》卷67，第30页。杨枢于1903年6月15日即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国大臣（即驻日公使），10月15日到东京正式接任。
- ⑰同⑮。
- ⑱《外务部奏拣员派充驻日本使署参赞领事各缺折》，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交涉史料》卷71，第11—12页。折中有“4人上各员，除神户领事官长福、长崎领事官张鸿二员系由臣部司员派充，应请准其补授”等语，而续任各员均作“接充”，则此时长福方得实授。

中国五口通商时期丝茶出口贸易

杨 源 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对外通商。从这时起，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再次被迫增辟口岸时止，通称“五口通商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出口贸易中，中国传统的丝茶出口，增长迅速，长期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丝茶出口的扩大，对当时和尔后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起了很大的影响，很值得加以研究。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丝茶出口口岸和路线的变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对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英国，在丝茶贸易中得利甚大。英国东印度公司“自从一八一五年以来，对中国贸易的平均利润每年都超过一百万英镑，但事实上，所有这些利润都是从进口的中国产品上取得的”，而“东印度公司的进口货主要是茶叶”。“英国政府从茶叶上获得的利润几乎和东印度公司获得的一样多。”^①一八三〇年后，“对华的茶叶贸易，因为重税的缘故，英政府从茶叶贸易征收税，年至三百万英镑之多。”一八三六年高达四百六十万英镑。^②中国生丝对英国丝织业关系也甚大。一八三六年二月曼彻斯特商会上，首相迈尔本和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备忘录中提到：“中国输出茶叶和生丝，生丝价值在一百万英镑以上。没有生丝，我们这一门极重要的迅速增长着的制造业便将大大地瘫痪了。”^③但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限定广州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茶叶和生丝从主要产地华东长途跋涉运到广州出口，路途远，时间长，运费大，成本高，因此英人很早就渴求在盛产丝茶的华东沿海开辟通商口岸。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日，英国伦敦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协会向英政府鼓吹用战争强迫中国缔结一项条约时，提出

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广州（译按：原文误以 Canton 与 Kwan-Chou 为两地），在北纬二十九度至三十二度之间，与茶、丝、棉布产地相近，也是畅销英国呢、绒、布匹、羽纱的地域。”^④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中国增开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四口通商，固然是为了便于其推销商品，也是因为这些地方靠近丝茶的主要产区，有利于英商以低廉价格大量收购丝茶。

五口开放后，丝茶输出的口岸立即发生了变化，上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我国丝茶出口的主要口岸。

上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它地近我国主要蚕丝产区杭、嘉、湖平原，距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茶区也不远。而且上海地踞长江口，附近水网纵横，对内对外航运便利。因此，上海开埠后，丝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首先，杭嘉湖地区的外销生丝几乎全部从这里输出，“上海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的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求的全部。”^⑤一八四三——四四年度，上海出口生丝五千余包，超过了广州；一八四五——四六年度为一万五千余包，占当年全国生丝出口量的百分之八十一。此后，上海生丝出口不断增加，每年都占我国生丝出口量的八、九成以上，一八五六——五七年度达九万余包，比开埠初年增长十七倍多。同时，通过上海出口的茶叶也在不断增加。四十年代末，上海出口茶叶只占全国四分之一左右。到一八五四——五五年度，上海输出茶叶八千多万磅，超过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七成，为开埠初年的六十九倍。

五口通商后，广州失去了昔日垄断外贸的地位，但她有着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仍是我国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江西茶，也许是湖北、湖南茶，肯定是在一个时期中继续经过折岭关和梅岭关而趋向旧有的广东市场。”^⑥广州的茶叶出口，

初期有较大的增长，一八四四——四五年度达到空前的七千六百多万磅。一八五一年，广州茶叶出口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只是到一八五二年后，广州茶叶输出的盛况才衰落下去，但仍占我国茶叶出口量近四分之一。广州由于远离我国蚕丝的主要产地，本地的蚕丝生产一时尚没有很大发展，因此在上海开埠后，生丝出口一落千丈，由一八三六——三七年度的一万二千五百余包，⑦减少到只有几千包甚至千来包了。

此外，宁波这个港口却使外国商人大为失望，因为浙江的丝和茶，大部分都被吸引到上海市场去了。厦门虽然靠近武夷山茶区，但交通不便，外贸也没有什么起色。离武夷山茶区更近的福州，在开埠初期，茶叶出口也无多。直到一八五三年，由于战争阻隔，外商不易在上海和广州买到茶叶，美商旗昌洋行乃“派遣中国代理人携款前往武夷茶区，收购茶叶，经闽江下福州。他们的尝试获得成功。此后其他洋行也照样仿行。”⑧福州于是也逐渐成为我国茶叶输出的重要口岸。

五口通商后，通过汉口输往俄国的茶叶也在增长。“约在一八五〇年，俄商开始在汉口购茶，于是汉口成为中国最佳之红茶市场。”⑨这样，除广州外，逐渐形成了三个新的茶叶集散输出市场。《清史稿》就这一情况写到：“厥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宁波茶输至日本。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⑩

随着出口口岸的变化，丝茶由产区运往口岸的路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地，向来是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华东地区。生丝的产地也主要在江、浙两省尤其是杭、嘉、湖地区。鸦片战争前，华东的丝茶要长途运到广州出口。当时，江、浙的外销丝茶从苏州、湖州等地运到杭州，然后逆富春江船运而上，到浙、赣边界上的常山县卸船挑运过山，到江西的玉山县再装船，顺信江而下，到达河口镇。外销的武夷茶也运到这里。丝、茶从这里运到鄱阳湖，转入赣江，溯水

而上到赣州的大庾县起岸，越梅岭到广东南雄州的始兴县装船，运到韶州，再顺北江运往广州。⑪

上海开埠后，江、浙的丝茶不再远运广州，而是就近通过纵横交错的水道运往上海出口。武夷山的茶叶集中到河口装船，然后再“分途运往广州或上海。如果要运往广州，便向西顺流而下，运至鄱阳湖，”再从赣江南去广州。“如果要运往上海销售，茶船就要逆水上行，向东运至玉山。”然后挑运到常山，再装船顺流下运。“茶叶运到杭州后，即由小船转运到运河的船只上，运往上海。”⑫一八五三年后闽茶越来越多地从闽江运到福州出口。赣西和皖南的茶叶以婺源和屯溪为集散中心。从新安江运至杭州转往上海的茶叶，大部分在屯溪装船；从乐安江运至鄱阳湖转往广州的茶叶，则多从婺源起运。湖南的茶叶外销，多在湘潭装船，溯湘江而南，再翻越南岭，运往广州。长江航道，也是丝茶的运输路线。一八五九年，容闳受宝顺洋行所派，到产茶区调查。他由上海出发，经过杭州、兰溪、衢州、常山、玉山、河口，到南昌，然后向西南到长沙、湘潭一带了解茶产情况后，从武汉乘船顺长江而下，到九江，转入鄱阳湖，再经河口从来路回上海。⑬他经过的路线，也就是当时丝茶运输的主要路线。

出口路线变化后，丝茶的运输路程大大缩短。以往，江、浙的丝茶运到广州，行程三千五百多里，费时三个月以上。现在由上海出口，距离最远不过数百里，需时不过数天。闽、皖、赣的茶叶，运往上海也比运往广州近。如武夷茶，从产地运往广州，远达二千八百里，全程要六周到两个月，运往上海，是一千八百里左右，约需二十八天。⑭这样，时间大大缩短，运费大大降低。以前华东茶叶运往广州，“有人曾估计最粗的茶叶的运费达总成本的三分之一。”⑮而一八四九年有人统计，普通茶叶从武夷山运到上海，运费只占成本的八分之一强。⑯加上运输便捷，途中损耗少，因此，丝茶的成本降低，价格也随之下跌。这种情况在上海最明显，“欧洲人能在上海以低于广州百分之十的代价买到丝、茶和其他土产。”⑰“绿茶在上海的售价比广州几乎便宜百分之二十。”⑱

二、丝茶出口贸易的扩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输出的丝茶即在稳

步增长。一八三六——三七年度，茶叶出口近五千九百万磅，二千一百余万元；生丝出口一万二千五百包，四百九十余万元。^{①⑨}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丝茶出口因受战争影响，一度大为低落。到一八四二——四三年度，茶叶出口只有一千七百余万磅，生丝出口只有一千七百余包。五口开放通商后，丝茶出口迅速恢复和不断增长。一八四四年，茶叶出口达到七千余万磅，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第二年，生丝出口又达到前所未有的上万九千余包。此后，丝茶出口不断扩大。一八五五——五六年度，茶叶出口增到一亿三千余万磅。一八五六——五七年度，生丝出口也达到九万余包。^{②⑩}

五口通商时期，中国丝茶出口扩大，呈现了几个特点：

第一，丝茶出口增长速度快，数量大。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丝茶出口增长比较缓慢，从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三七年，十七年间，茶叶出口量只增长百分之七十五，二千五百余万磅，生丝出口量只增长二倍半，约六千包。^{②⑪}而五口通商后，从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五六年，十三年间，茶叶出口量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六千余万磅；生丝从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五七年，十四年间出口量增长了十倍半，八万四千余包，大大超过战前。

第二，生丝出口值逐渐赶上茶叶，成为我国出口货值最大的商品。五口通商前，生丝出口远远不如茶叶，从一八二三年到一八三三年，茶叶出口总值二亿三千七百余万元，生丝只有一千八百余万元。^{②⑫}五口开放后，生丝出口大增，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茶叶，出口值也逐渐赶上了茶叶。到一八五八——五九年度，仅上海生丝出口便达二千六百万元，而同期五口茶叶出口值只有二千一百万元。

第三，丝茶出口值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增大。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茶叶和生丝出口值已分别在我国出口商品中占一、二位，通常共占出口总值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五口通商时期，随着丝茶出口量扩大，丝茶出口值在我国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随之增大，从一八四四年起，每年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最高达到百分之九十六。

五口通商时期，中国丝茶出口扩大，有国际和国内诸方面的原因。

……中国是丝茶的原产地，丝茶产量占当时世界

丝茶产量的大部分，因尔，这个时期，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上还居垄断地位。如“一八二八年，西方共消费了约七千万磅茶叶，都自中国运入。一八六七年，中国供给了西方消费的一亿九千万磅茶叶的约百分之九十。”^{②⑬}蚕丝，当时除中国外，欧洲的意大利、法国，亚洲的土耳其、日本都有出产，但意、法、土三国产量和出口都不多，日本丝当时也未大量输出。因此，这个时期华丝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得以独占鳌头。

同时，西方国家对丝茶的需求在不断扩大。茶叶已成为欧美一般人民爱好的饮料，在英国成了“全部人口必需的日常用品之一。”^{②⑭}欧美丝织业的发展，也使它们对中国生丝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外需求的增长刺激了中国丝茶的生产与出口。“自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起，复因欧洲发生蚕病，致意、法二国所产生丝，骤见减少，于是华丝出口数量，益见激增。”^{②⑮}

国内方面，五口通商后，去除了过去一些阻碍丝茶出口的因素。中国的封建王朝，向来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不但将对外通商限定在广州一口，而且对丝茶出口屡有限制。如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下令严禁丝斤出洋，“倘有违例出洋，每丝一百斤发边卫充军。”^{②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对外通商，清政府诸多限制被迫取消，丝茶源源输出国外。

这个时期，国内还出现了一些影响丝茶出口的重要因素。一八五三年后，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江南地区的战争连绵不断，这一带原先颇为发达的丝织业受到很大破坏。南京地区原有丝织机五万架，这时都大部分停织。^{②⑰}生丝的国内需求陡减，于是大量运到上海进入对外市场。冯桂芬评论这种情况：“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②⑱}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天国在占领区实行奖励生产，保护合法贸易的政策，对丝茶出口起了有利的作用。参加太平军的英人呤喇认为，正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政策，“有价值的生丝贸易才骤然增加，并且在他们据有产丝地区的期间继续不断地发展。”^{②⑲}

但是，这个时期丝茶出口扩大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首先，这个时期中国丝茶的出口，基本上被英、美两国商人所垄断。英国商人每年运出的生丝，通常占生丝出口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时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八。^{③⑰}“红茶贸易事实上亦

为英商所垄断，因欧洲各国所需华茶，除由陆路输往俄国者，俱由英商经营”，^⑩每年占中国茶叶出口量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其次是美国，每年所购生丝占中国生丝出口量的百分之一到二，所购茶叶占中国茶叶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茶之输往美国者，几全为绿茶，衡其数量，足抵中国绿茶产额四分之三。”^⑪这种情况，使中国丝茶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被英、美两国商人所左右，丝茶生产也越来越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外市场尤其是英、美两国市场。

其次，在丝茶出口量扩大的情况下，丝茶的出口价格却在不断下跌。茶价下跌尤甚。丝茶出口量最大的上海，生丝从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四年由平均每担330元降到237.5元；茶叶从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七年由平均每担37两银跌到18.2两，降了一半强。^⑫因此，五口通商时期，丝茶出口值的增长大大落后于出口量的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丝茶出口体制混乱落后，不能自觉地控制价格水平，更重要的是由于外商倚仗不平等条约，深入各口岸以至茶区，操纵了我国丝茶市场的缘故。

再有，这个时期，清政府实行了许多不利于扩大丝茶生产和出口的政策。五口通商后，清政府除征收丝每担10两、茶叶每担2.5两的出口税外，还要征收丝茶原从广州出口时沿途经过的各常关税课：“内地贩运湖丝前赴上海，应查明赴粤路程，少过一关，即补纳一关税数。”^⑬这样，就使丝茶运输里程缩短产生的成本下降的好处抵销了不少。太平军起义后，清政府为筹措军费镇压起义，千方百计进行搜刮，对丝茶也加征各种名目的捐税。这样，就使得丝茶的成本增加不少，而当时丝茶的出口价格又在下跌，所以严重地影响到丝茶的生产与出口。

三、丝茶出口贸易扩大的影响

丝茶出口贸易扩大，对中国城乡社会经济特别是丝茶产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五口通商后，不少城市由于丝茶出口贸易的扩大使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通商口岸如上海、广州等自不待言，就是一些内地原先较僻寂的小城镇，也由于丝茶出口贸易的扩大而繁盛起来。如南浔，原是一个乡间小镇，由于丝业发展，不几年就成为著名的丝市而兴旺起来。镇中

有许多整齐的街道和大商号，“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镇之人太丰衣食于此。”^⑭一八五二年，英人R·Fortune到茶区考察，他描述了河口、屯溪两个作为茶叶集散转运中心而繁荣起来的市镇的情况：河口“约有三十万居民，它是红茶贸易的一个大市场。……到处都可以遇到大客栈、茶行和仓库，沿河一带更多。停泊在市镇附近的船只非常之多。”^⑮“屯溪是一个繁盛而热闹的市镇，……本地人口约十五万。此地有若干大茶商向茶农及寺院收购茶叶，并加以精制和分类，标以庄号，运至上海或广州销给洋商。……屯溪及其附近人烟稠密之区，可以说事实上是依靠茶叶的对外贸易为生的。”^⑯

行商制度废除后，一些城镇中办起了茶行和丝行（或叫茶栈、茶庄和丝栈），成为中外丝茶贸易的中间机构。如上海，“近来设有丝茶专栈，……货物到栈，即有通事，往觅售主，货售归银，不烦客虑。”^⑰“湖州北门附近有许多大规模经营丝业的大丝行。生丝在丝行内分类、存储，并装成包件，然后运往上海，售给外商。”^⑱

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茶商们因“内地所制之茶，每以不明了外人之嗜好，多有货不对样之弊，于是乃附设茶厂，专做纠正不合之处。”^⑲这样，兴起了许多茶叶加工工场。如广州，许多茶行中都挤满了上百的妇女、儿童和男工在从事拣茶分类和制茶的工作，“外销花熏茶差不多全部是在广州制造的。”^⑳上海“迨至咸丰初年，即华茶对外贸易极盛时代，国外需要激增，……于是上海沪商，乃采买毛茶，在沪改制，所谓‘土庄茶栈’应运而生，成为专业矣，当时上海土庄茶栈，约三、四十家，营业颇为发达。”^㉑

因丝茶出口兴盛，城市中还出现了一批因经营丝茶贸易而致富的商人。在湖州，丝商们“以低价向农民购丝，以高价售之于上海之洋行。一转手间，巨富可以立致。”吴兴由丝商起家以至“家产在百万以上者，据闻计有五家。”^㉒不少丝商的财富，就是在五口通商时期积累起来的。茶叶贸易中，如广州张殿铨，在“城西十三行街创办隆记茶行，贸易致富。”^㉓上海也出现了经营土庄茶栈的巨商姚以舟、王乐等。^㉔

五口通商后，随着丝茶出口的增长，农村植茶业和蚕桑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轮船踵至，华茶日兴，由福建、浙江，以及安徽、江西、湖广等省，产茶之区，推行渐广。”^㉕五十年代，在武

夷山北坡种着上万英亩的茶树以制茶外销，其中大部分土地是新开垦和栽种起来的。^①广东除本省茶业有发展外，粤商还积极帮助开发两湖茶业，以供收购出口。他们“赴湘示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因价高利厚，于是各县仿制，产额日多。”^②植茶业中还出现个别大规模经营的例子，如胡元龙，“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③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由于生丝出口大增而有很大发展，“一片一片的桑园布满了这个地区。”^④蚕桑业还向江南其他地区扩展。常熟“近年西乡讲求蚕业，桑田顿盛，所栽桑秧，均购之浙江。”^⑤苏州，“通商以来，丝茶为出口大宗，人人皆知其利，长洲县所辖之西北境，凡与无锡、金匱接壤者，遍地植桑治蚕。”^⑥“镇江丝业废置已久，至咸丰初年，地方当局提倡蚕丝。”^⑦甚至内地一些蚕桑业也和出口发生联系，如四川桐梓，有“洋庄远客来”，购丝远运出口。^⑧

丝茶业的发展，使一些地区成了丝茶的专门产区。这些地区丝茶生产的比重往往超过了粮食。如湖州，“湖俗之桑，利厚于农。”^⑨农人多植桑养蚕缫丝，“无复有心种菽粟。”^⑩武夷山的茶树“漫山遍野，愈种愈多，”以至“等良田于硗确，置耕织为缓图。”^⑪一些地方还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桑茶。如广东，“向来种稻的大片土地，现已经或正在辟为桑林，因此每年的出口都可望增加。”^⑫湖南平江，“近岁红茶盛行，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地，悉以种茶。”^⑬

丝茶生产，是纯粹的商品性生产。因此，农村丝茶生产的扩大，意味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给自足的农家经济的缩小。城镇中丝茶贸易与加工工业的兴盛，也推动着城市商品经济的扩大。丝茶生产者和商人需要买进粮食和棉花等消费资料为生，因此，他们人数的增长，也就扩大了对商品化农产品的需求，刺激着商品化农业的发展。这样一环扣一环，就使越来越多地区的经济卷入了国内外商品市场，促进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丝茶出口的迅速增长，使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顺差，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金融状况。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通常处于出超的地位。十九世纪初开始，由于英、美等国将鸦片大量地违法输入我国，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开始恶化，赤字不断增长，被迫输出大量金银来弥补差

额。五口通商初期，外贸逆差还很严重，国内作为主要流通手段的白银严重不足，以至“银贵钱贱，民之生计既艰，商之货物不售”，^⑭“富商大贾，倒罢一空，凡百贸易，十减五、六。”^⑮开埠初期的上海，由于白银缺乏，竟到了以货易货的地步。随着丝茶出口扩大，这种情况逐步有了改善，国际收支逐渐好转，由入超趋于出超。外人惊叹：“中国的输出大大地扩张了，仅生丝一项，即足抵偿全部进口货而有余，……直至一八五三年为止各方面所慨叹的中国白银外流已变成白银继续不断地流入。”^⑯冯桂芬指出：咸丰五、六年间，泰西诸国“一年中买丝至六、七千万两，各货及鸦片不足抵，则运银偿之，银遂骤贱，以迄于今，是为中外通市一大转关。”^⑰白银的流入，改变了“银贵钱贱”的局面，使中国经济的这种困境得到了改善。由于外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银币，特别是墨西哥银圆，在流通中比中国原来成色、重量不一的各种银两方便得多。因此，银圆的大量输入使用，使商品流通得到便利，促进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使中国的货币开始向近代币制过渡。

丝茶出口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资金、劳动力和市场条件。

五口开放后，外国商人纷至沓来。他们为了收购丝茶等中国土产和推销其国工业品，在中国设立了许多洋行。如上海，开埠第一年，设立的英、美洋行就有十一家。^⑱到一八五四年，外国商人在上海设立的洋行达到一百二十多家。^⑲许多洋行，如著名的怡和洋行、旗昌洋行、宝顺洋行、琼记洋行等，都经营大宗的丝茶生意。

外国商人来到中国，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他们为在中国收购丝茶等土货和推销货物，雇用了一批华人为其服务。这些人就是所谓“买办”。他们从外国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中分得残羹剩沥而发财致富。替外商经营丝茶贸易就是他们起家的主要途径之一。例如由于湖丝出洋，南浔人“在洋行服务者，谓之买办。镇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⑳当时的许多大买办都经营过丝茶。如唐隆茂，就专门为琼记洋行赴内地购买茶叶。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替英商收购丝茶，推销鸦片、纺织品起家。宝顺洋行买办徐宝亭、徐润父子，“为英商必里士所重，……业丝茶名满中外，……致富巨万。”^㉑这就产生了中国最初

的买办阶级。

在丝茶出口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商人和买办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企业的最早投资人。如吴兴经营生丝贸易致富，家产在百万以上的五家中，“庞氏名元济，字怡斋，后斥资设龙章造纸厂于嘉兴。梅氏名莪卿，后仍以丝厂为业。”^①上海茶商进行茶叶加工的“土庄茶栈”，至“光绪初年，渐有改用机械者，”^②由旧式手工工场过渡到近代企业。买办唐廷枢、徐润后来成为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中国最早一批近代企业的主要投资人。

丝茶加工业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土地，他们或是经营家庭丝茶加工，或是进入手工丝茶加工作坊和工场，依靠丝茶加工业为生。这些人，拥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技能。其中不少人，以后转入中国最早的近代丝茶工厂做工，成为这些工厂的骨干。如继昌隆等最初几间机器缫丝厂开办时，“使制土丝及〔手机房之〕丝织女工趋往丝厂工作。”^③上海一些机器制茶厂的工人，原来就是手工制茶工场的工人。所以，可以说，因为丝茶出口扩大而发展了的丝茶手工加工业，为最早的一批近代丝茶厂提供了较有生产经验的劳动力。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中的一部分，由此转化而来。

丝茶出口的扩大，开拓了一定的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需要，反过来又刺激了丝茶加工业的发展，并为我国近代丝茶加工企业的产生预备了市场条件。现在所知的我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继昌隆缫丝厂，就是陈启源为了适应生丝出口的需要而开设的。在我国新兴的近代企业中，缫丝厂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人统计一八九五年以前中国兴办的八十七家民营近代企业中，缫丝厂有四十八家，占一半强。^④这些缫丝厂生产的生丝，主要就是为了出口到国际市场去。

①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9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2页。

③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④同②书，第654页。

⑤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0页。

⑦⑧同上书，第191—192页。

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3—474页。

⑩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上海开明1949年版，第54页。

⑪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志九十九，食货五。

⑫⑬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July, 1839, P.144—149.

⑭⑮同①书，第8册，第1539—1540页。

⑯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9页。

⑰同②书，第1541页。

⑱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⑲同①书，第557页。

⑳㉑五口通商时期丝茶出口量、值，占出口总值百分比及输英、美百分比见张仲礼：《1834—1867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变化与背景》，《学术月刊》1960年第9期，部份数字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579、582页。

㉒㉓同①书，第254—255页。

㉔里默：《中国对外贸易》，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5页。

㉕同②书，第647页。

㉖同①书，第509页。

㉗《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百三十。

㉘同⑧书，第2卷，第64页。

㉙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筹国用议。

㉚吟喟：《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页。

㉛㉜同①书，第567页。

㉝同①书，第582页。

㉞《清朝续文献通考》，第8131页。

㉟汪日楨：《南浔镇志》，卷二十四。

㊱同①书，第3册，第1536页。

㊲同上书，第1532页。

㊳王韬：《瀛壖杂志》，卷一。

㊴同①书，第3册，第1545页。

㊵㊶㊷㊸同⑧书，第488页。

㊹同上书，第484页。

㊺㊻同上书，第2卷，第84页。

- ④丁仁长等：《宣统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一。
- ⑤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五。
- ⑥同①书，第3册，第1473页。
- ⑦同⑧书，第481页。
- ⑧同①书，第3册，第1476页。
- ⑨同上书，第1544页。
- ⑩庞鸿文等：《常昭合志稿》。
- ⑪曹允源纂：《吴县志》，卷五十二上，舆地考，风俗一。
- ⑫同①书，第3册，第1484页。
- ⑬李世祚修：《桐梓县志》，卷二十四，实业志，商业。
- ⑭丁宝书等：《长兴县志》，卷八。
- ⑮周庆云：《南浔志》，卷三十。
- ⑯卞宝第：《卞制军奏议》，卷四。
- ⑰同①书，第3册，第1464页。
- ⑱李元度等：《平江县志》，卷三十。
- ⑲窦漪：《请特设议政大臣折》，《滇文丛录》，卷四十九。
- ⑳㉑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十一。
- ㉒A.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London, 1900, P.203—204.
- ㉓同⑤书，第399页。
- ㉔同⑱书，第25页。
- ㉕周庆云：《南浔志》，卷三十三。
- ㉖徐润：《除禺斋自叙年谱》，第93页。
- ㉗同⑧书，第2卷，第44页。
- ㉘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8—40页。



关于《幻缘记》传奇作者由云龙

官桂铨

庄一拂先生编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近代作品》云：“由云龙，号碧峣山人。字号、里居皆未详。《幻缘记》传奇。附刻《高峣志》民国排印本。二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本页1736）。

按：《高峣志》为由云龙编著，其自序末题“共和二十八年莫春岁己卯，姚安由云龙叙于高峣别墅”。《高峣志》后附《幻缘记》传奇二卷，题碧峣散人撰，《汇考》误作碧峣山人。全书均为1939年铅印本一册，非刻本。碧峣山为昆明西山一峰。

民国二十八年（1939）陈启周《幻缘记传奇序》中云：“此定庵先生《幻缘记》传奇之所由作也。”按定庵为由云龙的别号。

《高峣志》卷下“诗人征略”自我介绍说：“由云龙字夔龙，别号定庵，姚安人。光绪丁酉科举人，京师大学毕业。仕至云南盐运使，赠勋四

位，代云南省长”（页四二下）。由云龙居住高峣山——“在昆明县西南碧鸡山右”，“筑屋三楹而居之，其形庵也，其义定也，其地上邻普贤古寺。”（见《高峣志·定庵说》），故别号定庵，又署碧峣散人。

1957年第4期《近代史资料》（科学出版社铅印本）刊由云龙修订的《护国史稿》时，作者还在世。从《护国史稿》得知：由云龙在1915至1916年的护国运动中曾任护国军政府秘书厅厅长，他在1955年7月写的《护国史稿·前言》说：“执笔的人，年近八旬，精力大差。”他大约生于光绪三年（1877）左右。

《幻缘记》传奇二卷十六出，有抽印的单行本，我在云南省图书馆就看到此单行本一册。由云龙还著有《定庵诗话》二卷（1934年昆明排印本）、《定庵诗话续编》二卷（1935年昆明铅印本）等。

欣赏对象与欣赏主体的矛盾关系考察

——兼谈艺术欣赏的特质

杜书瀛

艺术欣赏是读者和观众对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进行感受、体验、领悟、理解，从而获得由浅入深、情理结合的审美把握。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既可得到悦耳、悦目、赏心、怡神的美的享受，又可得到思想、认识、情操、道德等方面的教益。在艺术欣赏中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欣赏对象（艺术形象、艺术意境）和欣赏主体（观众、读者）之间的矛盾。因此，要想深入地把握艺术欣赏的性质，就必须对艺术欣赏中矛盾对立的每一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艺术欣赏的客体方面——欣赏对象。

作为欣赏对象的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进行审美把握、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造的时候，一方面要再现客观的现实生活，一方面要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所谓再现，固然是要描绘得象生活本身那样鲜活、生动、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又绝非照相式地有闻必录，而是经过了艺术家的选择、提炼、集中、概括，甚至允许有某种变形；所谓表现，就是艺术家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评价，自己的思想倾向，自己的爱与憎，肯定与否定的情感态度，甚至自己的意志冲动等等，都灌注于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之中。任何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有的虽然可能更偏重于再现，有的则更偏重于表现，但都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正是这种再现与表现融合一体的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作为艺术创造的成果出现于读者或观众面前，成为他们的欣赏对象。

我们再来看看艺术欣赏的主体方面——读者和观众。

读者和观众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有一定世界观、一定思想立场、一定阶级、一定民族的人。他们不但会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某种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普遍必然性，某些共同性的思想、理想、愿望、要求；而且还表现出他们每个人的个性特点，他们特殊的爱好、趣味，甚至纯属他们个人的某种偏爱。但是，不论是谁，作为艺术欣赏者，他还必须具有能够进行艺术欣赏的一些主观条件。譬如，他必须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审美感受力，审美想象力，审美理解力，具有一定的审美情感，以及去进行审美体验的欲望。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①一个完全不懂艺术，不懂起码的艺术规律的人，是很难领略艺术的美的。要欣赏

专门的艺术品，还必须对那门艺术的性质和特点有一定的了解，取得欣赏那门艺术的一定的经验，获得一定的专门的欣赏能力。马克思说：“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②而且，即使一个有一定音乐修养的人，还必须有一定的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生活经验。一个不甚了解贝多芬的时代、社会及其人的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绝不会有较深入的感受和理解的。

艺术欣赏的客体和艺术欣赏的主体在欣赏过程中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呢？

从艺术欣赏的客体方面来说，是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对艺术欣赏的主体即读者和观众，必然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譬如，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在艺术欣赏过程中作为独立于欣赏者的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事先就为欣赏者规定了一定的欣赏活动的范围、方向和路线。任何艺术家在创造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时候，都必须给它一定的确定性（当然还有非确定性的一面）和明晰性（当然还有朦胧的一面），不能完全是一种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不可理解的东西。画家作画，不能把一只大象任意画成一头小驴。艺术家创造任何形象，也不能纯粹是朦胧的一团，不可辨认。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等等一系列人物，作者是给了他们以质的规定性的。这种质的规定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这些形象作为客观现实的再现，他们就必须符合生活本身的真实面貌和本质规律。欣赏者在欣赏这些艺术形象的时候，也就不应该任意对这些形象进行变更，而是必须受这些形象及其所再现的客观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本质规律的制约，如实地把贾宝玉和林黛玉看作是封建社会末期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的形象，而不能任意把他们看成是封建卫道者的形象。二是这些形象作为艺术家的主观世界的表现，体现着艺术家的思想情感、认识评价、爱憎态度、肯定或否定的倾向。一般地说，欣赏者在欣赏这些形象的时候，也是要受艺术家体现在艺术形象身上的主观思想倾向、爱憎态度的制约的。当然，这里情况比较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现代人在欣赏古典作品的时候，常常出现同古典艺术家的主观既一致又不一致的现象，或者说，受其制约又常常冲破这种制约。这一点，我们后面还将谈到。不同艺术种类的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对欣赏者的欣赏活动有着特殊的规定和限制。马克思曾经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受与耳朵不同，而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③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意思之一，是说视觉对象与听觉对象对主体具有一定的特殊的规定和限制作用。具体说到艺术欣赏，我们会看到造型艺术、音乐、文学、电影、戏剧等等的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就对它们的欣赏者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规定和限定。绘画和雕刻形象只能直接看到而不能直接听到；音乐形象只能直接听到而不能直接看到；文学形象既不能直接看到，也不能直接听到，而只能通过读者的想象，在观念中看到和听到；戏剧形象虽然能直接看到和听到，但是

又受到时间、空间的许多限制……这些都是对欣赏者的特殊的规定和限制。此外，不同的艺术流派的艺术形象也对欣赏者有特殊的制约作用。那些浪漫主义的以抒情为主的艺术，常常更重艺术家主观情志的抒发，而客观事物的形象的描写总是服从于艺术家的主观表现，作为主观表现的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类艺术作品中，如果欣赏者想去寻找客观事物形象的精确描写，将是比较困难的。那些现实主义的叙事为主的艺术，常常更重客观事物形象的描绘、刻画，而艺术家的主观倾向往往不那么直露，而总是隐藏于客观的形象描绘之中，通过形象自然流露出来。如果欣赏者过分追求艺术家直抒胸臆的表白，同样是较困难的。这些也是对欣赏者的制约。

然而，欣赏者并不甘心情愿地被动地消极地承受这种制约和限制。所以，从欣赏主体方面来考察，我们就将会看到欣赏者作为有意识、有意志的人，怎样主动地、积极地在承受制约和限制的同时，又突破这些制约和限制，对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进行“再创造”和“再评价”——我国的一位艺术理论家早在50年代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对艺术欣赏活动的能动和积极的因素，是把握得相当精确的。艺术欣赏的这种能动、积极地“再创造”和“再评价”，主要表现在通过读者和观众在欣赏中的体验和想象，不但把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原来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复现出来，加以充分地领悟和理解；而且还总是因每个欣赏者的主观条件的差异，各人重新创造出各具特点的艺术形象，甚至能够对原来的形象进行补充、加以变动、加以改造，体会到艺术家在创造这个艺术形象的时候不曾说出、甚至不曾想到的东西，甚至纠正艺术家原来认识得并不正确的东西，深化原来并不深刻的东西，从而使艺术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是那些高水平的艺术欣赏。

我们知道，艺术家创造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过程是由“面”到“点”、由“多”到“一”的过程，他要尽量地把“面”压缩在“点”之中，把“多”集中在“一”之中，把无穷之意概括在有尽之言之中，从而能够做到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意无穷。在欣赏活动中，要想点正欣赏这个艺术形象，欣赏者就必须做到由“一”见“多”，由“点”及“面”，由有尽之言领悟无穷之意；如果做不到，那欣赏就是失败的。实现由“一”见“多”的成功艺术欣赏，靠什么？主要依靠欣赏者进行能动地、积极地体验和想象。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艺术家在创造艺术形象的时候，为欣赏者的体验和想象创造必要的条件，提供尽量多的可能性。虽然任何艺术家也不可能把“多”全部概括在“一”之中，把无穷之意全部收容在有尽之言之中；但是，优秀的艺术家，却是善于运用各种手段，尽量调动读者和观众的主观能动性，为欣赏者的想象活动创造广阔的天地。一旦有了这些条件和可能，就要看欣赏者如何施展他的本领了。一个好的艺术欣赏者，总是善于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艺术形象所给予的能够进行想象的可能和条件的导引之下去施展的。而且，因与创作家的各种差异，欣赏者通过自己的体验和想象“再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与原来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就可能有很多不同。正如鲁迅所说：“读者所推论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④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但是无论怎样不同，仍然必须是哈姆雷特，而不是麦克白斯。欣赏者所再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当然也可能不如原来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那样丰富；但是，由于欣赏者的思想、立场、生活经验、看问题的角度等等的特殊性，也可能补原来艺术形象之不足，有新的发现，甚至领悟到比艺术家所提供的更多、更深刻、更广阔的东西。这就是所谓“被动中的主动，制约中的能动”，突破艺术形象的制约和限制的再创造、再评价。正如，我们读《红楼梦》，我们直接感受到封建社会末期一个日趋衰落的贵族大家庭的各种人物、各种生活、各种矛盾冲突；进而我们想到其他封建家庭也是这个样子；最后我们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必然解体的趋向。而这些，甚至曹雪芹本人也未必充分认识和理解。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艺术现象，即人们常说的“形象大于思想”，或者说作品的“客观思想大于主观思想”。这话的意思是说，艺术形象因为是象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地去反映生活，而且总是立体地、多面地、多向地反映生活，因此，虽然艺术家只从自己所感受到的那个角度来创造形象，而他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的这种多面性、多向性、立体性，却又比艺术家主观上对它的把握要丰富，或者说，艺术形象“客观”具有的“思想”，比艺术家原来的“主观思想”要丰富。这里所说的比艺术家“主观思想”还要大的“客观思想”，其实是艺术欣赏活动的产物，严格地说，这“客观思想”就是欣赏者“再创造”和“再评价”的思想。这种情况在欣赏古典作品时更容易发生。

欣赏者突破艺术形象的一些制约和限定，还表现在欣赏者总是能够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力，特别是利用所谓“通感”，打破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某些界限，获得对艺术品的全面欣赏效果。譬如，绘画和雕刻本是只能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但是当我们欣赏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塑象时，看到两个正在交谈的罗汉形象，那神情，那口形，那手势，使我们仿佛能够听到他们交谈的声音。好的欣赏者必须善于通过自己的想象，从直接性进入间接性，譬如从造型艺术的直接性的视觉形象，进入间接的听觉形象，从音乐的直接性的听觉形象进入间接的视觉形象，等等。同时，欣赏者还必须从艺术形象的直接性的感性形式，进入间接性的理性内容。

总之，在我们欣赏任何一种艺术形象的时候，总是在艺术家所提供的欣赏条件的导引之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有限见无限、由现象到本质，逐步地、深入地把握艺术形象，获得全面的欣赏效果。这就是欣赏对象与欣赏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艺术欣赏的过程，就是欣赏对象如何制约和导引欣赏主体，而欣赏主体又如何积极地、能动地接受和突破那种制约，对艺术形象进行再创造和再评价，从而达到欣赏对象与欣赏主体之间的辩证统一。

就其本质而言，艺术欣赏活动也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全面的精神把握。不过，这里的主观是欣赏艺术的读者和观众；而客观，则是艺术创造的成果——艺术作品。而且，这种全面的精神把握，当然也要符合一般的主观把握客观的精神活动规律，但又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表现出一系列特殊的心理活动规律。阅读科学或哲学著作，基本

上是一种冷静的理智的认识和思维的过程。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情感和意志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情感、意志的成分非常微弱；想象和具体的生动的感受，也不占什么重要地位。艺术欣赏则不同。这是一种审美活动。在欣赏的心理活动过程中，感受、情感、意志、想象、理解（认识、思维），几乎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欣赏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从对美的形象的具体感受开始。形象的感受是任何艺术欣赏活动的基础和起点，舍此，欣赏则无从谈起。例如，我们欣赏徐悲鸿的国画《奔马》。首先是那飒爽英姿的骏马的外在形态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几乎与这种具体的感受同时（或稍后一点）而产生的，是我们的情绪和情感的^{活动}。从对徐悲鸿所画的马的形态的感受中，我们的情绪被拨动了，我们被激发了某种兴奋的情绪、某种昂扬的而不是低沉的情绪，某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情绪。这时我们不知不觉之中产生了一种欣喜之情，一种对这马的形象的倾心和爱慕的感情。至此，我们的心理活动已经从感官的感受进入情绪和情感的^{感动}。几乎与这种情绪和情感的感动一起发生的，是我们的意志活动。而且上面我们分析的情绪活动中，已经夹杂着意志的成分，那种积极的、向上的、昂扬的、兴奋的情绪，实际上就是某种意志欲望和冲动力的表现形态，意志是与情绪、情感混杂在一起的。从马的形象给予我们情绪和情感的感染之中，我们心理上产生了一种要求实践某种美好愿望的实践力量——意志力量，我们会想到杜甫歌颂骏马的诗句：“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但是，欣赏活动中的这种要求实践的意志力量，却又与现实生活活动中要求实践的意志力量有所不同。在生活中，某种意志力的驱使可以导致立即进行的直接实践活动；而在艺术欣赏中的意志力量，则不要求立即直接去实践。你看《白毛女》，产生了消灭黄世仁那样的恶霸地主的意志力量，但你不能在戏院里立即采取直接的实践行动，你不能去“消灭”那扮演黄世仁的演员。艺术欣赏中的这种意志力量，虽不要求立即实践，但最终会促使我们去为美好的事物而斗争。但是，我们的欣赏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还要继续下去。如果仅仅停留在由感官的感受，到情绪、情感的感动，到意志的阶段，那么，我们的这种感受、情绪、情感、意志，相对来说就只是浮浅的，甚至是不确定的、不稳固的，因为它们还没有理性思维作为基础。事实上，任何艺术欣赏活动，最后都必然导致理性思维阶段。欣赏者不能只感受、只感动、只想实践某种愿望却丝毫不考虑为什么。当着我们从对那马的形象的感受而产生欣喜之情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机器也开动起来了，我们思考着、理解着，我们会想许许多多事情：那马的形象不是表现了某种活跃的生命力吗？那马的无拘无束的形态，多么自由自在，那不是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吗？为什么要这样热烈的追求自由呢？我们会想到画家在作这画的时候，正是处于不自由的环境之中，原来，他是在黑暗中对光明的追求，在不自由中对自由的追求，这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人民要求的自由，祖国所要求的自由……。这样，我们的欣赏已经达到了理智把握的阶段。有了这种理智的基础，我们再回过头来检查一下我们的那些感受、情绪、情感、意志到底对不对，我们会根据理智的规定，对前者的心理活动的正确与否加以校正，加以指导，加以规范。只有理解得深刻才感受得更清楚，也只有理解

得正确，才能爱得或恨得更强烈，这就叫做理以导情。

在艺术欣赏中，感受、情绪、情感、意志、理解、思维虽有区别，但无明显的更无绝对的界限。它们几乎同时存在，互相交织在一起。它们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但绝不能互相代替，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而想象，则贯穿于欣赏过程的始终。

上述诸心理因素的结合，使艺术欣赏既有悦耳悦目的美的感受，又有陶情养志的情感的感动和意志的激发，最后达到赏心悦神的理智的满足。这就是对艺术作品的完满的审美状态，这就是真正的艺术欣赏，是与把握科学理论的心理活动不同的艺术欣赏。

在艺术欣赏的心理活动过程中，我们还要特别指出其中两种心理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来进一步说明欣赏中的心理活动特点，这就是欣赏中的共鸣与观赏及其关系。

共鸣与观赏，是艺术欣赏的心理过程中情感、意志与理智几种心理因素的特殊的活动状态，是把握科学理论的心理过程中不存在、也不需要的。

所谓共鸣，就是欣赏者在对欣赏对象的具体感受的基础上，进而深深地被欣赏对象所感动、所吸引，从而在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从情感、意志到思想达到了契合一致。这时，观众、读者与创造艺术形象的艺术家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同悲欢，共休戚。清代的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商人的女儿，貌美，会作诗，酷爱《红楼梦》，后来得了肺病。快死的时候，她父母把这部书烧了。她在床上大哭说：“奈何烧杀我宝玉！”这是一个有点极端的例子，但是它可以说明欣赏者与欣赏对象之间的契合一致能够达到怎样紧密的程度，共鸣中的情感、意志、思想状态可以达到怎样强烈的程度。共鸣的发生，需要在读者、观众与创造艺术形象的艺术家的之间有相同或大体相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经验基础。如鲁迅所说：“是弹琴人么，别人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⑤鲁迅就指出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是当然的事”^⑥，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发生共鸣的基础。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作品与欣赏者之间，还是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的。如我们读《水浒传》、《红楼梦》，就常常有共鸣现象发生。这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有进步的积极的因素，而我们作为欣赏者又可以从我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出发加以能动的感受和理解，加以再创造、再评价，因而可以达到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契合一致。

欣赏者必须既入乎其内，产生共鸣，又必须出乎其外，进入观赏的境界。所谓观赏，就是欣赏者与欣赏对象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更多一些理智思考的成分，使欣赏者意识到自己与欣赏对象之间有一定的区分，从而把欣赏对象的丰富内涵加以细细品鉴和认识，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欣赏对象的性质，使它的艺术感染力量沿着正确的轨道扩展、深化。共鸣和观赏，都是情感、意志、理智之间的统一的交错的运动，在共鸣中，更多的是情感活动，在观赏中，更多的理智活动。艺术欣赏必须达到共鸣与观赏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形象对欣赏者所发生的感染力量既准确又动人。

欣赏者对欣赏对象的共鸣与观赏，从艺术效果上来看，表现为娱乐与教育的统一。

艺术就其本质来说是对社会现实发生积极作用的意识形态，它必然要对群众发生思想认识的、伦理道德的社会教育作用。而艺术欣赏则是艺术发挥其社会教育作用的必然途径。群众去欣赏艺术，不一定都抱着受教育的目的，大多数人倒是为了娱乐，为了获得美的享受，得到精神的和感官的愉悦、振奋，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①当欣赏者被欣赏对象所吸引，在思想感情上引起共鸣和观赏活动时，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生活内容、主题思想和创作意图，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对欣赏者发生深刻的教育作用。艺术作品只有适应欣赏者的娱乐需要，才能征服读者，使之在娱乐中受到教育。而欣赏者只有达到共鸣与观赏的境界，才能既得到审美愉悦，又受到深刻教育。

此外，艺术欣赏的心理活动还有一个与把握科学理论的心理活动的显著不同之点：它允许个人趣味、甚至个人偏爱的存在。艺术欣赏活动总是通过具有各种不同的趣味和爱好的个人实现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不同欣赏趣味的人们对欣赏对象的自由选择。例如，有的人喜爱富有激情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作品，你就不能强迫他去欣赏那些长于理性思考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的人喜欢听音乐，你也不应该非要他去看绘画不可。但是，趣味的这种个人独特性，也不是绝对的、无有任何限定的，而是必然要受社会的阶级的审美意识的制约，一个无产阶级的读者或观众，他的个人趣味和偏爱再特殊，他也不会欣赏和喜爱那些污蔑、反对无产阶级的作品；反之亦然。因此，所谓独特的个人趣味，不过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普遍必然的审美意识的独特表现罢了。任何人的欣赏趣味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个人特殊性与社会阶级普遍性的统一。如果一个欣赏者的独特趣味和爱好越过了社会或阶级所允许的界限，那就会受到干涉。我们今天反对低级、庸俗趣味，反对对黄色、下流的作品欣赏，大力培养群众健康的审美趣味，就是这个道理。

审美趣味是可以培养的。培养审美趣味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大力提倡创作具有健康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建立人们健康的趣味和爱好。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②反过来，群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要求，也极大地影响着艺术创作——这里充分表现出艺术欣赏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辩证关系，促进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在内的整个艺术活动的健康发展。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8—109页。

②③ 同上书，第79页。

④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29页。

⑤ 《热风·“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第423页。

⑥ 《集外集拾遗·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637页。

⑦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⑧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

中国诗坛社与华南的新诗歌运动

陈颂声 邓国伟

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中国诗坛社是南中国最大的诗歌团体，它不但对华南的诗歌运动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全国也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过去，由于忽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人们对它缺乏系统的全面的了解，以至在解放前后出版的为数不少的新文学史著作和新诗研究专著中均未见提及。笔者最近作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访问工作，并对所得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现对这一社团的战斗历程、诗歌理论和作品成就，以及与华南新诗歌运动的关系等等，作一扼要的论述。

—

华南新诗歌运动的兴起，较之北方的先进地区是迟了一大截。大革命时期，在鲁迅和郭沫若等人的直接推动下，华南的新文学运动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却又很快地沉寂下去。抗战前夕，以温流、黄宁婴、鸥外鸥、陈残云、芦荻、黄鲁等人为核心的诗歌青年，在抗战炮声的感召下，揭竿而起，组织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诗歌团体——中国诗坛社，才又揭开了华南新诗歌运动的新的一页。中国诗坛社从三十年代中期一直坚持战斗到四十年代末期，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历程。这个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初创期：从一九三六年秋到一九三七年秋，即广州“艺协”诗歌组成立到广州诗坛社改名为中国诗坛社之前。三六年十月，广州“艺协”在追悼鲁迅逝世的活动高潮中成立，成员多为进步青年，有些人这时已秘密加入党的组织。“艺协”诗歌组由温流负责，他是一位追随党组织的革命倾向性非常鲜明的青年诗人。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发展，一九三七年初，以原诗歌组成员为核心，联合了广雅中学和培英中学等学校的

诗歌青年，成立了广州诗坛社，出版《广州诗坛》。主要成员有黄宁婴、陈残云、芦荻、鸥外鸥、叶春、黄鲁、苏翰彦、李磊、荷子、郑零零、李又华、陈雄子、凌迴等人。（此时温流已不幸逝世）通过《发刊词》，他们郑重提出：“我们南中国的一群新诗歌的虔诚爱好者，为了加深我们对于新诗歌的修养，为了更广泛地开展新诗歌建设运动的工作，为了集中力量去唤起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我们便建立了广州诗坛社。今后，希望追随着先驱们，努力把新诗歌坚强地建立起来，努力以新诗歌当作武器，争取我们民族最后的胜利！”

广州诗坛社的成立标志着华南的新诗歌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高高地树起了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的旗帜，成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文艺队伍。它紧紧地把自己的周围，加强了同全国诗歌运动的联系，使华南的诗歌运动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阵地。

（二）成熟期：从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三八年秋，即广州诗坛社改名为中国诗坛社至广州沦陷。这期间中国诗坛社的活动最为活跃，社员激增，组织扩大，并在粤东地区设立分社。刊物内容丰富，出版正常，影响也扩大，形成为华南诗歌运动的一个高峰时期，在创作上也是一个丰收年。

抗战爆发后，蒲风和雷石榆等诗人到了广州。这两位广东籍的著名诗人，原先就同诗社有密切联系，受到大家的尊崇和爱戴。蒲风根据形势的要求，倡议大力发展组织，面向全国。于是广州诗坛社易名为中国诗坛社，刊名亦相应改为《中国诗坛》。蒲风从军之后，由雷石榆接任主编，黄宁婴和鸥外鸥协助编务。他们在《〈中国诗坛〉的新计划》中强调指出：“中国诗坛为配合民

族解放的神圣抗战，为负起文化之前哨的伟大任务而不得不采行新计划以拓大发展，”希望“各地诗歌工作者成立分社”。同期又发表《中国诗坛社简章》，明确表示：“本社以团结诗歌工作者从事于推进中国新诗歌运动为宗旨。其主要任务为：1.建立诗歌理论；2.批判过去诗歌；3.介绍世界诗歌；4.创造大众化诗歌。”

至一九三八年社员已发展到一百多人，其中包括不少知名的诗人，如林林、童晴岚、锡金、马荫隐、史轮、征军、林焕平、克锋、陈适怀、蒲风、雷石榆、黄宁婴、陈残云、芦荻、李育中、周为，等等。全国知名的诗人如王亚平、穆木天，这时期同中国诗坛社关系十分密切，多方支持。木刻家李桦、梁永泰、黄新波、赖少其等也参加了该社活动。《中国诗坛》增设了各种栏目，重视理论和翻译介绍，在推进大众化诗歌运动方面搞得异常活跃，比如每周或双周举行一次诗歌座谈会，讨论新诗歌运动有关问题；设立诗歌大众化工作委员会，出版大众化诗歌选集多种；利用电台和各种场合开展诗歌朗诵活动；举办别开生面的“街头诗画展览”，等等。诗社还开设诗歌出版社，出版丛书，先后出版了温流、蒲风、王亚平、雷石榆、史轮、黄宁婴、陈残云、芦荻、克锋、征军、零零、雄子等人的诗集达二十多种。这时期，许多社员与八路军驻穗办事处有密切联系，争相传阅解放区出版的书籍杂志，提高了思想水平。

中国诗坛社年轻的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不懈的努力，掀起了南中国前所未有的诗歌创作热潮。他们以坚实的步伐去追赶全国不断发展的新诗歌运动。

（三）持续期：从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秋，即广州沦陷后到抗战胜利。广州失守，社员星散各地。许多人走上前线，或奔赴延安，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有的转移外地，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在黄宁婴的撑持下，这段时间，《中国诗坛》先在香港出版三期，后在桂林又出了三期。在整整六个年头里，才断断续续地出了六期，其数量之少，毋须多说。但一个诗社，在烽烟战火之中，人员各散东西，飘泊不定，在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极之困难的情况下，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职责，仍坚持刊物的出版，这种难能可贵的坚韧的战斗精神，不能不令人钦佩。同时亦说明了，这时中国诗坛社已经深深植根在华

南的土地上，离散的社员始终紧紧地围绕在它的周围。在桂林那段时期，它还发展过一批新的社员，袁水拍、郑思、洁泯、高咏等诗人都参加了活动，使中国诗坛社增添了新的力量。

（四）复兴期：从一九四五年秋到一九四九年夏，即从抗战胜利到建国前夕。流落各地的诗人陆续回到广州之后，《中国诗坛》立即组成由黄宁婴、陈残云、李育中、吕剑、洪道五人的编委会，其光复版新一期很快面世。在《复刊的话》中写道：“这刊物诞生在祖国开始受着惨痛的蹂躏的时候，因此她有着一连串受难的历程，由广州而香港，由香港而桂林，在每一阶段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期都被屈死在印字房里。然而，这刊物也伴随怒吼着和战斗着的祖国而成长，因此她始终作为文艺的轻骑，向祖国的敌人及一切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作无情的冲刺，她始终作为人民的歌手，向世界控诉他们的痛苦与灾害，也喊出了他们的希望与信念。”这段话简明而又扼要地总结了诗坛社走过的历程，并表示今后要“更繁茂、更粗壮地长大起来”。

已经成长起来的诗人们正准备为抗战胜利高歌、大干一场的时候，正当他们以争民主争自由的呼声去代替当年抗战呐喊的时候，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捣乱，不得不再度转移香港。

在香港，《中国诗坛》以“丛刊”形式继续出版。编辑者主要有黄宁婴、陈残云、洪道和叶春等人。这时聚集在香港的作家很多，刊物继续保持面向全国的特点。郭沫若、茅盾、黄药眠、钟敬文、沙鸥等著名作家，都在该刊上发表论文或诗歌。

综上所述，中国诗坛社由开创到成熟，再经过持续的战斗而重新复兴起来，十三个春秋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说明了华南新诗歌运动所走过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和曲折，也说明了华南的新诗歌运动同全国的诗歌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二

中国诗坛社在建社之初就比较重视诗歌的理论建设，每期刊物均以相当的篇幅来发表理论文章。作者主要有蒲风、穆木天、雷石榆、陈残云、芦荻、林焕平、黄宁婴、李育中等人。后来许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冯乃超、林林等也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诗歌主张。综观他们的

见解，不难看出，他们坚持倡导的是旗帜鲜明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体系。

首先，他们强调诗歌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把握住现实”是左联时期中国诗歌会的基本主张，也是这时中国诗坛社的基本观点。蒲风在《现阶段的诗人任务》一文中，指出诗歌必须“活跃在指导现实、讴歌或鼓荡现实，咒诅或愤恨现实，鞭打或毁灭现实里。”穆木天在《现阶段的中国诗歌运动》里也指出了诗歌所肩负的责任：“如同士兵拿着枪一样，我们要拿着我们的武器诗歌去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在这个时期的诗歌里，小市民式的呻吟，渐渐地敛迹消形了，伟大的现实的镜子前边，照死了一切的虚伪，一切的雕虫小技”。他们都明确指出，诗歌就是一种能够直接参加现实斗争的武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国诗坛社组织过一次关于诗歌与政治的关系的专题讨论。与会的十多位诗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一致认识到，诗歌不能脱离政治，要“努力把诗歌内容灌入正确的政治意识。”同时他们又认为要反对诗歌的政治观念化的倾向。这些见解是相当中肯和切中要害的。

中国诗坛社自始至终同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诗歌创作倾向作坚决的斗争。黄宁婴的《一九三七年的中国诗坛》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现代派诗风没落的必然性。鸥外鸥在他的长篇论文中对二十年代末期以来的象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歌作了严肃的批判。芦荻的《二十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回顾》、林焕平的《诗到底是民众的还是少数人的》、陈残云的《反对标奇立异与朦胧》等文章，都是富有战斗性的论述。

第二，他们强调诗人必须成为战士，成为人民的忠实的代言人。雷石榆在《诗歌作者总动员》一文中指出，诗人应该“直接地鼓舞民众，组织民众，深入到民众的里层去，诗人可以时为兵士，时为喇叭手，时为剧员，时为漫画家，时为街头卖唱者。”杜埃在《关于诗运动底感想》一文中认为，诗歌运动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诗人“作为无数人民群众里的一员，来从事劳作”。为此，三七年至三八年间的中国诗坛社曾经开展过颇为吸引人的街头诗朗诵活动，诗人们以战士的身份参与社会的各种政治活动，有力地推动华南诗歌运动的开展，受到全国诗歌界的赞扬。

第三，中国诗坛社坚持了诗歌大众化的方向，积极倡导通俗诗歌和方言诗歌的创作。其刊

物专门开辟“大众化诗歌特辑”、“方言诗特辑”、“儿童诗歌特辑”、“民歌研究”等专栏。贝贝的《新启蒙运动与诗歌》；雷石榆的《新歌谣的创作问题》、《谈诗歌大众化》；可非的《大众化与方言街头诗歌》；野曼的《开展新诗的群众性运动》；冯乃超的《诗歌翻身》等等文章，都一致主张诗歌要与群众结合，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诗人必须跟大众打成一片，用大众所能理解的话去创作；而通俗化和利用民间形式创作的作品，又必须注入新的思想，以发挥其教育大众的作用。他们主张经过批判而利用旧形式，但“新的大众化的诗歌，是更必须用新的形式去写才行”的。为着实现诗歌的大众化，他们还很重视诗歌与图画、与音乐的关系，要求诗歌谱曲能唱。

第四，中国诗坛社重视国外诗歌理论和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把它看作为一种思想和艺术的借鉴。他们特别注意翻译苏联、日本和欧洲一些弱小国家的作家作品。介绍过的主要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江布尔、布洛克、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裴多菲、海涅、惠特曼，以及日本近现代的一些进步作家等。其中介绍最多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在该社诗人中，有些人明显接受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从翻译的情况看，他们很重视作者的政治倾向性和战斗精神，里面有些是鲁迅赞扬过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陈怀适译《Larca 之为人及其作品》，介绍的是一位被法西斯党徒暗杀的西班牙民众诗人，歌颂其接近民众的精神和诗歌的战斗风格。

第五，中国诗坛社在艺术上不断有所追求。其探求的要点在于新诗如何适合于表现时代的内容，如何适合于朗诵和与歌曲结合，如何使用方言和民谣进行创作等方面。夏梁的《内容形式多样化》和蒲风的《抗战的内容，艺术的煽动》，都提出了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完美结合的命题。可惜的是，他们在这方面的论述不够充分，因而未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也有一些文章强调诗人要向古典诗歌学习技巧，但毕竟这方面的论点未能造成足够的影响。他们反对格律的束缚，然而新诗歌应该如何走自己的路呢？这些问题，他们都未来得及作出深入的探讨。他们强调诗体解放，对新诗的各种形式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因而使刊物呈现自由发展、兼收并蓄、形式多样的局面。这可以说是《中国诗坛》艺术上的长处，也是它的

短处。

中国诗坛社在新诗理论上的建树是我国新诗歌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值得重视的。

三

中国诗坛社的诗人在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内中确有不少令人赞赏的佳作，在当时起到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今天读来，也还感到有浓烈的时代气息，使人深受感染。

中国诗坛社为华南培育了一批相当有才华的、成就卓著的诗人。蒲风和雷石榆在加入中国诗坛社之前，早已蜚声诗坛。蒲风已出版过《茫茫夜》、《六月流火》、《生活》等著名诗集，加入诗坛社之后，写作更勤，完成了《钢铁的歌唱》、《抗战三部曲》、《黑陋的角落里》、《可怜虫》等多部诗作。到三八年投笔从戎之前，已出诗集十册。雷石榆先前亦出版过诗集《沙漠之歌》，在参加诗坛社活动期间，又出版了《国际纵队》、《1937.7/7—1938.1/1》、《新生的中国》。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战斗性强，在中国诗坛社中起到楷模作用。温流不幸早逝，未能直接参与诗坛社的活动，只是在《中国诗坛》上发表其遗作。他的精神和作品，都对诗坛社产生重要影响。温流作品精炼朴实、情辞并茂，成就斐然。作品编成《我们的堡》和《最后的吼声》二册。郭沫若在《中国诗坛》“温流周年祭”特辑中曾作如下悼词纪念他：“你的早逝，不仅是中国诗坛的损失，同时是中国抗敌战线上的损失。抗敌的军号，缺少了你这位俊秀的吹手，使我们几觉着寂寞。”鸥外鸥在加入中国诗坛社之前，也已经诗名卓著。他早期诗作受未来派影响，入社之后，诗风转变，写出具有充实内容的抗战诗篇，然而在艺术上仍卓然不群，独具特色。

黄宁婴、陈残云、芦荻、黄鲁和征军等都是在抗战初期崛起的青年诗人，他们唱着响亮的民族解放的战歌踏上诗坛，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写出过许多引人注目的作品。黄宁婴早期以抒情诗创作为主，感情充沛，华美而凝炼；后期的政治诗《民主短简》及大量讽刺诗篇，表现了他的思想的深度和艺术上的成熟。陈残云在四六年转攻小说之前，主要以诗人面目现身文坛。三八年出版过诗集《铁蹄下的歌手》，其余散见于报刊，总数约在百首以上。陈残云的许多诗作自成格调，在散行中蕴含自然的韵律，朴实而凝重，有

深刻的现实内容。芦荻是典型的抒情诗人，以歌唱故乡的《桑野》和《我是海燕》等诗篇表现了率真豪放的抒情风格。他的诗歌注重意境，不尚雕饰。黄鲁诗作具有浪漫主义激情，想象丰富奇丽，诗句流畅自然，节奏感很强。征军作品则比较含蓄，篇幅长大，含量较丰，抒情气息浓厚。黄鲁和征军都早逝，有如诗坛的流星。然而他们那些光彩四溢的诗篇，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中国诗坛社以其雄厚的阵营和丰硕的成果，在多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作品内容方面看，他们反映的生活广泛而有深度，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和进程。抗战初期，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他们发出了抗日的怒吼。《田地，咱们守护你！》（温流）、《国防的歌》（黄宁婴）、《祖国，咱们用血来写你复兴的历史》（雄子）等等战斗诗篇，表达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战斗情怀。《中国诗坛》第一、二两卷作品，基本上是抗战诗篇。愤怒的呐喊，誓死战斗的决心，悲壮的离别，祖国的苦难，在诗篇中都有鲜明的表现。更可贵的是，诗人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歌唱过《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延安，我底母亲》和《毛泽东》。他们也很注意表现国际题材，黄鲁的《赤道线》、鸥外鸥的《第二回讨闻》、杨任的《西班牙民族·中华民族》等，表现了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法西斯暴行的主题。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又以更加成熟的诗笔，写出了人民经受过八年离乱的痛苦和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郑思的《希望就勒死在我的脚边》和许稚人的《乡土》等，把时代的苦闷和沉思记录下来，也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心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之后，诗人们则唱出了新生的歌：“以前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奴隶，现在是中国的主人。”（周钢鸣，《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充满高昂的革命激情。诗人们与祖国休戚与共，与人民血肉相连，发为歌吟，给人情真意切的感觉。芦荻的《怒涛吟》、《我是海燕》、雷石榆的《我死了也不要棺材》、古根的《两个炮手》，都有一股火辣辣的味道，有一种壮美的情怀和开阔的意境。王亚平在《瀑布颂》中，以瀑布象征一泻千里，不可抵挡的民主力量：“让爱你的更热情的爱你！让恨你的发出绝望的抖颤！让欢迎你的拥抱

在一起！让躲避你的永远沉睡在阴暗里！”感情澎湃，喷涌而出。征军的《大地的苦难》、吕剑的《不要忘记了他们》、星采的《你们要记着这个仇恨》等，都是感情炽热的作品。

中国诗坛社反对现代派诗风，倡导大众化的诗歌创作，因此诗人写诗，但求率真，放喉高歌，不受管束，其主导风格可以概括为：平白畅达，壮阔豪迈，富于激情。而在这主导风格之下，不同的诗人的作品风格又是同中有异，异彩纷呈的。陈残云的《卖叮咛糖的人》、周岱的《在法院里》、黄宁婴的《鹿颈村》、莽曙的《清粪妇》等等，在平白晓畅中显得沉着蕴藉，引导读者去思考现实问题。周岱《在法院里》则近乎冷峭。他用强烈的对照、令人寒慄的画面，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风格多样化，还表现在讽刺诗创作上。这类作品尖刻而谐趣，黄宁婴的《劫》、李育中的《“凯旋”》、柳情的《“民主兑现”章》、袁水拍的《垃圾堆上造公园》、华嘉的《低调短唱》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除此之外，形式的多样化也很突出。总体看来，他们的作品以长短不拘、格律不限的自由体诗为主，而又根据内容需要去决定形式的变化。“不定型正是诗歌的一种新型。”（郭沫若）然而不同的诗人又大致习惯于使用比较固定的形式。温流的诗，受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影响比较明显，喜欢短句；黄鲁的诗排泻而下，受马雅可夫斯基和郭沫若等人诗风的影响；芦荻的诗形似散漫，但注意内在的韵律；黄宁婴擅长铺叙、诗情饱满，讲究语句的锤炼；蒲风的诗不事雕饰，然而写得亲切大度。他倡导写朗诵诗和明信片诗，身体力行，一时也成为诗坛新的风气。还应该提到大众化诗歌运动和方言诗歌运动的成果。抗战时期，许多诗人利用流行的民歌形式写作，产生过一批深受民众欢迎的作品。可非和零零等人出版过方言诗集；陈炳熙的《保卫大广东》，用广州方言写作，被谱成歌曲，在民间广为传唱。穆木天

用鼓词形式写过《伪国兵王顺反正》；克锋和素庵等人用民谣写作儿童诗歌。抗战胜利后，中国诗坛社在香港参加过方言文学运动，利用广东地区的客家山歌、龙舟、粤曲的形式去创作，效果甚好，很受欢迎。楼栖的《鸳鸯子》（长诗）便是那时突出的作品。

总的说，中国诗坛社是一个具有自己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的新诗歌团体。它有雄厚的阵容和丰富多采的创作成果；它既与中国诗歌会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南国的地方性特点，在我国新诗歌历史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诗坛社在华南的新诗歌运动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诗坛社为华南的新诗歌运动培养了一支队伍，奠定了华南的现实主义诗风，并以它的活动，促进了华南诗歌界与全国诗歌界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它的历史功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当然，中国诗坛社的创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就总体而言，从内容和技巧两个方面去观察，他们对后者较为忽视。如前所说，结社之时，这批诗歌爱好者都只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的大、中学生或社会青年，大多数人的艺术素养还比较缺乏，凭着一腔热血而去投身诗坛。在战斗过程中，他们虽然对诗歌理论不是没有探讨，对诗歌理论的重要性不是没有认识，但是如何用以指导创作，如何吸取古今中外的艺术营养，却注意得不够。加上处于战争环境，对作品一般都难以进行反复的琢磨和认真的推敲。因此，中国诗坛社的诗作，存在两个突出的缺陷。第一是有一部分作品较为粗糙。尽管它的题材和立意都是不错的，但匆促成章，缺乏意象，缺乏诗意，给人一种散文化的感觉。第二是有的作品存在口号化、概念化的倾向，激情有余，抒情不足，往往流于空泛的呼喊，口号的堆砌，同样缺乏感人的力量。

1984年8月上旬于中山大学

那辗——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 重要艺术手法

林文山

金圣叹总结的某些艺术手法，有套用八股文做法的；但是，其中也未必全没用处，更未必如有些同志说的那样“无益甚至有损”。另外，还有一些艺术手法，却不属八股一套，很有参考价值。那时的表述用语，同今天的文艺评论术语很是不同，所以乍一读去，还不大好明白，需要我们揣摩研讨，“那辗”应当属于这一类。

“那辗”，见于《西厢·前候》一段夹评中，兹节录于下：

那之为言搓那，辗之为言辗开也。搓那得一刻，辗开得一刻；搓那得一步，辗开得一步。于第一刻第一步，不敢知第二刻第二步，况于第三刻第三步。于第一刻第一步，真有其第一刻第一步，莫贪第二刻第二步，坐失此第一刻第一步也。

凡小技，必须与一人作对。其初，彼人大欲作，我乃那辗如不欲作。夫大欲作，必将有作有不及作也。而我之如不欲作，则固非不作也。其既，彼以大欲作故，将多有所不及作，其势不可不与补作。至于补作，则先之所作，将反弃如不作也。我则以那辗故，寸寸节节而作，前既不与补作，今又无刻不作也。其后，彼以补作故，彼所先作，既尽弃如不作，而今又更不及得作也。我则以不烦补作，故今反听我先作，乃至竟局之皆我独作也。

所贵于那辗者，那辗则气平，气平则心细，心细则眼到。夫人而气平心细眼到，则虽一黍之大，必能分本分末；一咳之响，必能辨声辨音。人之所不睹，彼则瞻矚之；人之所不存，彼则盘旋之；人之所不悉，彼则入而抉剔、出而敷布之。一刻之景，至彼而可以如年；一尘之空，至彼而可以立国。展一声而验凉风之所以西至，元云之所以北来；落一子而审直道之所以得一，横道之所以失九。如斯人则真所谓无有师傅都由心悟者也。

作文必有题，题也者，文之所由以出也。乃吾亦尝取题而熟睹之矣，见其中间全无有文。夫题之中间全无有文，而彼天下能文之人，都从何处得文者耶？吾由今以思，而后深信那辗之为功是惟不小。何则？夫题有以一字为之，有以三、五、六、七乃至数十百字为之，今都不论其字少之与字多，而总之题则有其前，则有其后，则有其中间。抑不宁惟是已也，且有其后之前，而既非中间，而已为中间之后，此真不可以不致察也。试察题之有前，又察其有前前，而于是焉先写其前前，夫然后写其前，夫然后写其几几欲至中间，而犹为中间之前，夫然后始写其中间；至于其后，亦复如是。而后信题固蹙，而吾文乃至舒长也；题固急，而吾文乃甚纾迟也；题固直，而吾文乃甚委折也；题固竭，而吾文乃甚悠扬也。如不知题之有前有后有诸迤邐，而一发遂取其中间，此譬之以槌击石，确然一声，则遽已耳，更不能多有其余响也。盖那辗与不那辗，其不同有如此者。

那辗，原是金圣叹的朋友在谈论打双陆时提出的一种方法。圣叹从中得到启示，发现在文学创作中也运用着类似的方法。他于是把这种方法加以总结和发挥，命名为“那辗”，并具体应用在《西厢记》的艺术分析里。这种所谓“那辗”，首先应当包括在描写中把情节认真地搓那、辗开。在《水浒》的评注中，金圣叹已经不止一处接触到类似的思想。他在谈论到历史同小说的区别时，认为历史是写事，是“以文运事”；小说的着眼点在“文”，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读法》）。这就是说，写历史，只能限于叙述确实发生过的事实，而写艺术作品，则仅仅是把生活中的事作为创作的材料，“事之巨者而隐括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事之阙者而附会焉”，“事之全者而挾去焉”（概括、夸张、虚构、剪裁），只有这样，才能写成绝世奇文。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金圣叹把《史记》归入文学作品一类而把它同历史著作区别开来，这个分类法，不一定妥当。因此，他认为《史记》的妙处在于对已经发生的事情“隐括”、“张皇”、“附会”、“挾去”也不一定妥当。但是，艺术作品倒确实是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做的。

在《水浒》里，金圣叹不止一处指出这种“因文生事”的例子，其中一些就包含了后来在《西厢》里谈那辗时同样的思想。

《武松醉打蒋门神》是一例。去打蒋门神的路上，武松吃了不少酒，是事。喝酒过程的具体描写是文。如果写历史，那么，写上“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就可以了。但是，仅仅在饮酒这件事上，施耐庵作了一篇妙文。他先是写武松认识施恩时因高兴喝得大醉，第二天，施恩同武松见面，只请他喝了几杯酒，就只请他吃菜，不再劝他吃酒。弄得武松莫名其妙，却又不好当场询问。事后，武松才知道，这是因为施恩怕武松又喝得大醉，又影响了让他去打蒋门神的正事。“只因此一翻踢，却翻踢出下面绝妙一个酒情来”，武松这个人，不仅嗜酒，而且还好胜。因为施恩耽心他醉了不能干事，反而启发着他提出“无三不过望”的要求来：“你要打蒋门神时，出得城去，但遇着一个酒店，便请我吃三碗酒，若无三碗时，便不过望子去。”因为“我却是没酒没本事”，“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于是引出了下面一篇“笔笔欲舞，字字能飞”的饮酒文字。写武松饮酒，写施恩仆人侍候武松饮酒，写施恩既不能不答应武松又耽心武松醉了的复杂心情；然后，又写武松装醉寻闹，而又偏偏“笔笔是寻闹不成”。对比起来，打蒋门神本身的描写，却简单多了。

从这段的描写和金圣叹对这一段描写的分析可以看出，《水浒》的描写，目的在于“文”而不在于“事”。如果叙事，那确实是只需一两句话就行；但是，小说的目的“不止叙事”，而是要把一件事“撰而成绝世奇文”。因此，当作者给自己出了这个题目之后，反复考虑它的前前后后，“试察题之有前，又察其有前前，而于是焉先写其前前，夫然后写其前，

夫然后写其几几欲至中间，而犹为中间之前，夫然后始写其中间；至于其后，亦复如是。”《西厢·前候》一折的描写也是这样。事情很简单：莺莺让红娘去探望张生，见面后，张生求红娘给送一封信。如此而已。如果写历史，那就是三言两语就完，结果是平淡无奇，缺乏文采情趣。《西厢》的妙处，就是它不是开门见山地马上写红娘见张生，而是将见张生之前和前前写透，而后写本题；写本题时，又还有中前、中中、中后；……一笔不苟地认真展开，认真描写。〔点绛唇〕〔混江龙〕这一段唱词，是“前前”，“将前事闲闲自叙一篇”，“便真似有一聪明鲜事女郎于纸上行间，纤腰微嫩，小脚徐那，一头迤迤行来，一头车轮打算。”红娘在唱词中形容张莺二人如何相思，“深讥张生莺莺之张致，而不觉己之张致乃更甚也。”走到张生书房时，应当属于“中前”了，红娘不马上敲门，却用唾津儿湿破窗纸看张生在书房里做什么”，就“画出红娘来”，“画出红娘聪明来”。见面后，张生求红娘给他送一封信给莺莺，红娘不答应，而且准确地预料出她送信的结局，“画出红娘来，画出红娘一双纤手两道轻眉，颊边两靥，唇上一声来”，而且“深表红娘灵慧过人”。当张生竟用“多以金帛拜酬红娘姐”时，红娘极不满意张生“卖弄你有家私”的唐突，认为这是对她的情义的一种蔑视，把张生挖苦了一通。后来，张生求之以情，红娘不仅答应，而且把张生写信的才华夸了一番，而且，“分明赞不容口，忽又谓之假意。写红娘真有十二分灵慧，十二分松快”。这样写来，就写出了人物，写出了生活的情趣，就耐读，使人觉得有一种美的感受，是历史著作所不能有（我们也不要它有的）的特别的东西。

二

写出了人，也就写出了文。在小说，文与人是分不开的。没有与写人物无关的妙文。要有，那也只是一些其实徒具躯壳的华丽词句，算不得妙文。武松打蒋门神路上一连喝三十多碗酒，写出了武松，同时还写出了施恩，那文字也因此摇曳多姿。《西厢·前候》也是，写出了红娘，同时还写出张生和莺莺，而那文字也是妙文。不独如此，金圣叹认为，“那辘”之所以是一种美妙的艺术手法，还在于，它总是把那些表面看去“枯淡窘缩”的题材，写成绵绵然的绝世奇文：“题固蹙，而吾文乃甚舒长也；题固急，而吾文乃甚纾迟也；题固直，而吾文乃甚委折也；题固竭，而吾文乃甚悠扬也。”

武松喝酒，红娘看张生，都是“枯淡窘缩”的题目，同武松打虎、拷红比较起来，确实缺少情节的生动性和戏剧性，缺少一种扣人心弦的力量。如果落在一个“行文无法”，不懂得那辘的平庸作者手上，很可能是三言两语交代过去完事，读者读后，就只知道有那么一回事，丝毫也没有美的感受。就象用木槌敲石头，确然一声就完，而不象打击乐器似地余音在耳，绕梁三日，那就是失败。

在别的地方，金圣叹还再三地谈到高明的作者，总是善于把平淡的情节写成奇妙的文字。在《西厢·请宴》一折的评点中，金圣叹论述说，洞天福地固然有奇境妙景可以观赏，而在洞天与福地之间的小桥、独树，一水一村，一篱一犬，也有它们奇奇妙妙可观

之处。因为天地之间，一鸟，一鱼，一花，一草，乃至鸟之一毛，鱼之一鳞，花之一瓣，草之一叶，都是靠造化者的大本领、大聪明、大气力而后结撰得成的。我们既要能写出洞天福地的奇妙之文，也要写出一篱一犬的奇妙之文。如果只会写洞天福地的妙文而不会写一篱一犬的妙文，他所写的洞天福地的奇妙之处，倒很可能刚好是它不奇妙之处。

金圣叹这一思想很重要。中国小说，到了《水浒》，大体上仍然以传奇性、戏剧性的题材为主，所写的事件，属于洞天福地类的居多，属于一篱一犬类的是少数。就《水浒》来说，它除了写出一些洞天福地的奇妙之外，能写出一篱一犬奇妙的文字，确实是艺术上的一大进步。《西厢》的长处，也表现在这个方面。上面谈到的《前候》是这样，金圣叹在这里评论到的《请宴》也是这样。《请宴》的前一折是《寺警》，后一折是《赖婚》。《寺警》一折，有莺莺寻计、惠明送书这些大波大浪。《赖婚》一折，有莺莺失惊、张生发怒这些大哭大笑。对于剧作者来说，诚是一个洞天，一个福地，容易写得火杂杂地。而在洞天福地之间的《请宴》，并无惊人的情节，属于一篱一犬之类。作者的高明处，就是他依然把这一折写得仍有可以观赏的奇境妙景。例如它通过红娘请宴的描写，“将彼一双两好之无限浮浮热热脉脉荡荡不觉两边都尽”，把请客这样一件“至轻至淡至无聊至不意”的极平常的情节写出其中的情趣来。

我们有一些小说，在情节高潮未曾涌现之前，往往写得沉闷，让人读去困倦，甚至只好放下。金圣叹的这番评论，正是针对着这种毛病而发。如何使这样一些一般化的题材显出光彩，充满魅力，关键确如金圣叹说的那辙。通过极一般、极平常的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或表现和丰满了人物的性格，或增添了姿韵和情趣，或因小及大、见微知著地有所概括，使读者虽然并非行在山阴道上却又仍然有应接不暇之感。这个目标，很值得我们为之呕心沥血。

三

怎样才能把即使象跑一回腿、喝一杯茶这类琐事写得如洞天福地那样满是奇境妙景，怎样才能把一些过场文字，一些极不重要的、为情节服务的人物也写得让人有看头？这其中，关键之一，就是全神贯注，采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搓那得一刻，辗开得一刻；搓那得一步，辗开得一步。于第一刻第一步，不敢知第二刻第二步，况于第三刻第三步也。于第一刻第一步，真有其第一刻第一步，莫贪第二刻第二步，坐失此第一刻第一步也”。在《西厢》的《读法》中，金圣叹讲过另外一番话：“《西厢记》正写《惊艳》一篇时，他不知道《借厢》一篇应如何，正写《借厢》一篇时，他不知道《酬韵》一篇应如何。总是写前一篇时，他不知道后一篇应如何，用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气力，他只顾写前一篇”，同样，又“总是写到后一篇时，他不记道前一篇是如何，用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气力，他又只顾写后一篇。”这两番话的意思是一样的，无非说明作家在进行创作、写到某一章一节时，他应当全力以赴地把精神都用在考虑如何一字一句、一段一节地展开他的描写。即使是过场文字，也得用写重要情节的文字一样使劲：“狮子搏象用全力，搏

兔亦用全力。”如果写第一节时不把精力放在第一节，而把心思分到第二节，那结果，第一节写不好，第二节也未必能写好。就象玩双陆那样，如果一开始就“大欲作”，那就可能“有作有不及作”，“其既，彼以大欲作故，将多有所不及作，其势不可不与补作。至于补作，则先之所作，将反弃如不作也。”

确实，在写一些过场性的文字，一些枯淡的情节的时候，是不是全力以赴，以致于写这一节根本不想下一节也忘掉了上一节的地步，同掉以轻心、急急忙忙地把过场文字写完，赶写下一节自以为是洞天福地的文字，那后果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水浒》第十一回写牛二，第四十三回写张保，都是过场文字。在小说中，牛二本身没有多大意义。他的任务只是把杨志送到梁中书那儿去，从而引出大名府教场比武和失陷生辰纲这一连串花团锦簇文字。张保也是。把这两段文字比较一下，一般的读者都会发现，牛二闹事写得比张保起哄好。那原因之一，当然是作者没有把张保起哄这个情节用全力去构思和描写的缘故。金圣叹指出，按地位，张保是不可能刁难杨雄的，作者这样写，只不过是借张保起哄引出石秀。也就是说，作者为写过场文字而草草地写去，以至于弄得不合情理了。至于艺术情趣，那就更谈不上。可以设想，如果这段文字放到曹雪芹手上，他很可能写得比牛二闹事还要好。贾芸想借钱，去走凤姐的后门，先是找卜世仁，后是在路上撞着倪二，这类题目，在一般人手里会是一般化的过场文字，《红楼梦》却把它写得比牛二闹事要好。曹雪芹在写任何最平凡的事件的时候，都付出了狮子搏象的全力。

由于全力以赴，精心构思，精心描写，那结果，是“虽一黍之大，必能分本分末；一咳之间，必能辨声辨音。人之所不睹，彼则瞻瞩之；人之所不存，彼则盘旋之；人之所不悉，彼则入而抉剔、出而敷布之。一刻之景，至彼而可以如年；一尘之空，至彼而可以立国。展一声而验凉风之所以西至，元云之所以北来；落一子而审直道之所以得一，横道之所以失九。”这就是达到艺术的妙境。

《水浒》六十回，卢俊义被吴用智赚之后，决定带李固一起去泰安州，李固不同意他去，燕青不同意他去，卢俊义的妻子贾氏也不愿意他去。卢俊义坚决要去，燕青建议由他陪着一同去，李固推脚气不想去，惹得卢俊义生了气，把李固等人骂了一通。“李固吓得只看娘子，娘子便漾漾地走进去，燕青亦更不再说。”由于作者下了功夫，这几句看似平淡的描写，就使这段也是过场文字顿然生色。金圣叹指出：这里的妙处，就在于活画出三个人的神理来：

夫李固之所以为李固，燕青之所以为燕青，娘子之所以为娘子，悉在后篇，此殊未及也。乃读者之心头眼底，已早有以猜测之三人之性情行径者，盖其叙事虽甚微，而其用笔乃甚著。叙事微，故其首尾未可得而指也；用笔著，故其好恶早可得而辨也。

李固之所以不肯去，除了怕苦怕死，还由于他同娘子有暧昧的关系，舍不得离家；娘子所以不同意卢俊义去，那重点也在于他把李固带走；这些内情，卢俊义不知道，燕青又不便说。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写法是作者站出来向读者交底。那样写，未尝不可；但是却一览无余，缺少韵味。现在作者不是这种写法。他要把这一过场文字写得既不显露，

但是又有所表现，使读者从这种特殊的表现方法中“心头眼底”，有所察觉。“一黍之大，必能分本分末；一咳之间，必能辨声辨音”，读者就是从李固、娘子、燕青三个人在卢俊义生气后极微细、极平淡、极简单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不说话也是动作）虽微却又显的描写中分辨出其中的奥妙来的。

当然，所以能达到这种妙境，首先还不是仅仅由于进入创作时全力以赴的结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作家即使呕心沥血，如果他没有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没有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对人生的深入剖析，也无法写出妙文来。金圣叹在别的地方也谈到这方面的道理。他认为作家必须“格物”，也即是要观察、分析、体验生活；才能“物格”，即对社会生活、对人物事件有深刻的认识。他也谈到找寻典型细节的极端重要性：“女娲氏不难补天，难于寻五色石。今既专门会寻五色石，其又何天之不补乎？”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不去论述它了。

四

中国的古典小说，开始的时候大体上是追求奇闻异事或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还不曾有意识地去刻划性格，塑造典型。从写神怪到写人间，是一大进步；从写传奇到写人物，也是一大进步。但是，即使象《三国演义》那样比较成功的小说，它的着眼点仍然是写事件，当然也同时通过剧烈的矛盾斗争写出了人，在那里，没有平常生活的描绘，很少有细致的描写。《水浒》可以说是从传奇跨向社会生活描写的第一步（《金瓶梅》是更进了一步，而且是决定性的一大步），在这个时候，金圣叹就充分肯定了《水浒》这方面的成就，指出它的优点在于写出了人物，它气力过人之处在于“不说鬼神怪异之事”，而且把《水浒》《西厢》在表现平常的生活事件中的成就给予总结，概括出“那辗”的艺术手法来，他这一理论贡献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空观主人在天启七年刊本的《拍案惊奇·序》中头一次提到重视“日用起居”描写这方面的问题：“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譎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譎诡幻怪以为奇，赘矣。”但是，这里的着眼点仍然是“譎诡幻怪”，同金圣叹后来提出的即使“枯淡窘缩”的题目也可以写出来绵绵然的绝世奇文的要求不一样。同金圣叹同时代的张岱，倒是在批评了当时戏剧舞台上的“只求热闹”，“但要出奇”之类毛病时指出：“《琵琶》、《西厢》，有何怪异？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这是同金圣叹观点接近的。但是，张岱并没有象金圣叹那样深入地研讨了这个极为重要的命题。

金圣叹之后，对金圣叹的艺术分析极佩服的李渔也发表了同金圣叹一致的见解。他主张写“人情物理”，反对搞“荒唐怪异”。他在《窥词管见》中说：“所谓意新者，非于寻常闻见以外，别有所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即在饮食居处之内，布帛菽粟之间，尽有事之极奇，情之极艳，询诸耳目，则为习见习闻，考诸诗词，实为罕听罕睹，以此为新，

方是词内之新。非《齐谐》志怪、《南华》志诞之所谓新也。”“艺术就是要在平凡中寻找不平凡的东西，在不平凡中寻找平凡的东西”，狄德罗的话，可以为李渔这番话做个注脚。

在艺术上真正完美地实现金圣叹这一理论的，当然要数《红楼梦》。曹雪芹的笔是令人叹服的。他把记述“家庭闺阁中的一饮一食”作为自己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明确地确定下来。他善于在日常生活的平凡小事中找到并展示出它并不平常的意义。如果用金圣叹打比方的话来说，那就是他极少写洞天福地，更着力描写一篱一犬；或者说，它把一篱一犬写得比洞天福地更多奇境妙景。脂砚斋也看出它这方面的成就，在五十一回回末的总批中说：

文有数千言写一琐事者，如一吃茶，偏能于未吃以前既吃以后，细细描写，如一拿银，偏能于开柜时生无数波折，平银时又生无数波折，心细如发。

四十一回写贾母带着一群人到栊翠庵，妙玉请贾母等人吃茶，然后又请宝钗、黛玉和宝玉到耳房里吃梯己茶。吃茶小事，却写得好，好在它通过吃茶之前、之中、之后的描写，写出了妙玉复杂思想性格和包括人与人之间微妙关系在内的种种情趣。五十一回，袭人不在家，医生来给晴雯看病后，需要给医生诊金一两银子。麝月不仅不知道银子搁在何方，而且连戥子也不识看；问宝玉，宝玉不仅也不识，而且认为问他戥子如何看也是咄咄怪事。这就不仅写出了麝月，写出了宝玉，同时也写出了不在家的袭人，读去又另有一番情趣。这仅仅是两个例子，甚至可以说是并非突出的例子。要找这类例子，《红楼梦》里可说俯拾皆是。在《红楼梦》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都是一些日常繁复的、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是一些平凡的并无特异之处的人，但是，曹雪芹总是赋予这些情节和人物以诗意的光辉，使我们象品味一颗橄榄似的，从中得到极美好的艺术享受。

《红楼梦》出来以后，曾有那样一些读惯了《封神》、《西游》一类热热闹闹文字的人，埋怨说《红楼梦》尽写些吃饭喝茶之类的琐事，实在没有意思。那原因是他们缺乏艺术细胞，他们艺术欣赏的能力赶不上文艺创作水平的发展，看不出即使象吃饭、喝茶甚至洗脸、拌嘴这类连一篱一犬也可能算不上的“草之一叶”，在艺术巨匠的笔下也满是趣味盎然的奇境妙景。这里，我们可以从反面体会到金圣叹关于那辘的理论的价值。

甲骨文所见第一人称代词辨析

陈 炜 湛

关于古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的问题，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以下简称管书）、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以下简称《综述》）、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等书均有论述，但都因所见材料的限制，各有不同程度的疏忽或错漏。一九八一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一、二期发表贾则夫《对“朕”、“余”（予）、“吾”、“我”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贾文），专就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问题与王力先生商榷。此文根据《尚书》、《论语》、《孟子》、《左传》、《庄子》五书中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归纳，提出了不少与王力先生不同的见解；但由于未接触甲骨文原材料，对于甲骨卜辞中“朕”、“我”、“余”的分析仍袭管书旧说。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吴文祺先生主编之《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册（《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之一）发表李瑾《汉语殷周语法问题探讨——王力〈汉语史稿〉中册先秦语法分析的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依据商周古文字材料，分七个方面与王先生商榷，其中第三项“关于人称代词的概述”涉及“朕”“吾”“台”等字，而于“余”、“我”二字则未涉及。笔者受贾李二文的启发，对甲骨文所见的第一人称代词也作了一番考察，颇觉尚有进一步辨析、补正的必要。现将鄙见略述如下，以求正于方家。

一

王力先生说：“从殷代到西周，‘朕’和‘乃’（而）只限用于领格。”在一条注里又说：“关于‘朕’用于领格是从金文中看出来的。《书经》里有一些例外，如《书经·尧典》‘朕在位七十载’。但是，《书经》的流传经过很多波折，个别的例外不足以妨害规则的建立。”按照王先生的见解，朕字到春秋战国以后才“渐渐用于主格”^①。这一观点显然不符合商周时期的语言实际，因而是值得商榷的。贾文指出今文《尚书》中“朕”作主语者二十例，由于《尚书》各篇的成文年代可有争议，即便是《盘庚》篇也可能夹杂了周人的语言成分，故引自《尧典》《汤誓》《盘庚》诸例未必可确证商代的语言实际；但足以证明西周时的“朕”可用作主格。李文引卜辞三例（即《戠》8·12，《通》592，《甲》3659）证明卜辞之朕可用作主格。其实，卜辞中“朕”之用为主格者远不止此，除李文所举外，其文句完整之例如：

庚辰卜，宾贞：朕𠄎于斗？ 贞：朕𠄎于斗？
贞：朕𠄎于丘剡？ 贞：朕𠄎于剡？ 《丙》128

庚辰卜，王贞：朕循余？六月。 《甲》2804
 庚辰卜，王：朕则羌，不囚？ 《前》4·88·7
 戊寅卜，朕出，今夕？ 《文录》572
 丁卯卜，贞：朕古？ 《甲》3849

其卜辞虽不完整，但仍可断定“朕”为主语之例则如：

□□卜，王：朕听，余唯其有祸？□月。 《佚》768
 乙巳〔卜〕，贞：朕□于循？ 《京都》8175

均可为贾李二文之补证。

关于“朕”是否用于宾格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贾文袭管书之说，认为朕字“甲骨刻辞中无作宾语者”，又说，在殷和西周时期“朕只作主语和定语”。最近出版的潘允中先生的新著《汉语语法史概要》也说卜辞中的朕“用于主格和领格，还未发现宾格”。其实，卜辞之“朕”并非绝无用为宾格之例，请看：

王占曰：祖乙弗若朕，不其□。 《丙》428

此例之朕为王自称，作若的宾语。若，顺也。此为占辞，刻于一腹甲（由十二片碎甲缀合而成）之反面，其正面（《丙》427）则为“贞祖乙若王不𠄎”。若朕，若王，均为动宾结构。又如：

王占曰：吉，帝左朕。 《乙》8868(8867反)

此亦占辞，“朕”用为“左”的宾语，其为宾格当无可疑。左即佐，左朕义同佐王，卜辞亦多见^②。朕用为宾格之例目前尚不多见，也许还是一两个“例外”，但总不能说“朕”在卜辞中没有宾格或不可用作宾语吧？

二

管书谓“余字只能作主语”，贾文亦承其说，谓“余”“用于主格，他格还未发现”，又谓“‘余’字在卜辞中只有主格”^③。按诸说均似失之武断。事实上，甲骨卜辞中“余”字还有宾格，可作宾语，下列文例，便是明证：

王占曰：唯父庚唯祟余。 《乙》7926
 羌甲祟余？ 《京津》1146
 祖辛它余？ 《京津》1151
 𠄎它余？ 《京津》1168

丙子卜，贞：黄（寅）尹它王？王占〔曰：黄〕尹它余。 《乙》2941—2942
 祟、它（卜辞从止作𠄎），均卜辞常见之动词，义同祸、害；此五例之“余”为祟、它之对象，其为宾语，毫无疑问。《乙》7926，2941—2942，“余”见于占辞，尤足证其为王之自称。

癸未卜，御余于祖庚，羊、豕、反？ 于祖戊御余，羊、豕、反？
 于子庚御余，女，牢，又反？ 《乙》4521

御为禳灾祛病之祭，辞称“御余于祖庚”、“于祖戊御余”、“于子庚御余”，为时王有疾，卜问为“余”而对祖庚、祖戊、子庚进行御祭。此版三辞之“余”为“御”的宾语，亦可论定。

□寅卜，王曰弔弗其古朕事，其誓余？ 《掇》1.95

不余漕？ 《前》6·59·6

“漕余”为正面设问，“不余漕”为反面设问。漕字从水从晋，《说文》所无，具体含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既可受“其”、“不”的修饰，其为动词可以无疑；而“余”为“漕”之受动者，用作宾语，亦甚明白。

□受余又？ 《乙》562

受即授，又假为佑。此辞之“余”为间接宾语，“又（佑）”为直接宾语。这种结构方式与卜辞屡见之“受我又”同：

帝受我又？ 《续存》上219

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受我又？一月。 《乙》5408

□酉卜，贞：王征吾方，下上若，受我又？一月。

贞：勿征吾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 《铁》244·2

就上述诸例观之，“余”之具有宾格，在句子中充当宾语，尚有何疑？不过，“余”作为定语用的领格，至今尚无确切文例，姑付阙如，以俟后证。

在武丁卜辞及帝乙帝辛卜辞中，“余”又是贞人之名，与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时王自称之余有别，不相混淆。

三

《汉语史稿》中册在谈到“吾”与“我”的分别时，下了这样的断语：“‘吾’字用于主格和领格，‘我’字用于主格和宾格……当‘我’用于宾格时，‘吾’往往用于主格；当‘吾’用于领格时，‘我’往往用于主格。”意即“我”无用于领格者。其实，管书早已指出，甲骨刻辞中“我字能作主语、宾语、修饰语”，《综述》亦谓“‘我’则可以兼为主宾领三格”，王氏可能未曾留意。贾文据五部书的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的结果，说明先秦文献中“我”字不但可以作主语、宾语，而且也可作定语：“五部书比较起来，定语的数量，《尚书》最多，《孟子》、《左传》次之，《论语》、《庄子》最少。就时代说，殷与西周时期，定语多，春秋战国时期，定语少。”验以甲骨卜辞，管书、《综述》、贾文之说是较符合实际的。甲骨文我字既是单数，亦可是复数（义同“我们”）④，主格、宾格、领格三格俱全，而且都是很常见的，不见得有多寡或经临之分。其属主格、宾格即作主语、宾语的现象，论者无异词，其例可从略；下面是属于领格即作定语用的部分辞例：

沚蔽告曰：“土方征于我东畷（鄙），伐二邑、吾方亦侵我西畷田。”

长友角告曰：“吾方出，侵我示粟田，七十人五。” 《菁》1

奴妻娵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 《菁》2

长戈告曰：“吾方征于我奠（郑）。” 《癸存》26

贞：我莫受年？		《拾遗》10.2
我北田不其受年？		《乙》5584
我莫受囫		《南北·无想》100
河弗它我年？		《库》407
贞：不唯帝它我年？	贞：唯帝它我年？二月。	《乙》7456
辛亥贞：我禾亡它？		《甲》403
贞：我家旧囟臣亡它我？		《前》4·15·4
贞：我家祖乙左王？	王为，我家祖辛左王？	《乙》8162
癸亥卜，殷贞：我吏戠缶？		
癸亥卜，殷贞：我吏毋其戠缶？		《丙》1
贞：我吏其戠方？	贞：我吏弗其戠方？	
贞：方其戠我吏？		
贞：方弗戠我吏？		《丙》67（《丙》71同文）
己亥贞：我多臣不辰（震）？		《粹》1207
昔我旧臣。		《库》1516

计十五例二十二辞，“我”均为领格，用作定语。谨依王力先生“例不十，法不立”，“例外不十，法不破”的主张，卜辞中“我”之用为领格，其“法”应是可立的；而“我”字用于主格和宾格之“法”则当予修正了。

需要指出的是，甲骨文中相当数量的“我”是方国名或人名，而不是人称代词。作为贞人名的“我”，辞称“我贞”，容易识别。作为方国名的“我”，常见于记事刻辞的入贡记录，称“我氏千”、“我来三十”、“我来十”等等，也易辨别，而见于卜辞中者却每易与人称代词之“我”相混，须注意分辨。如下列各辞中的“我”，便是方国名：

壬戌卜，殷贞：我亡来？	《乙》2596
贞：我其有来？	《粹》1068

此二例之“来”，为前来贡纳之意，“有来”，“亡（无）来”，是贞问“我方”是否有物来贡献给朝廷。

我勿氏戠牛？	《乙》6715
--------	---------

氏，致也（于省吾说），也是方国向朝廷贡纳的常用词。

口口卜，宾贞：我古王事？	贞：我弗其古王事？	《乙》4958
--------------	-----------	---------

“古王事”为武丁卜辞恒语，意为勤劳王事。此辞之“我”决非时王自称，而为方国之名亦甚明白。

与此相关的，“我”又可作地名，辞称“在我”（《京都》706，《外》24，《粹》1557，《铁》76·2，《乙》8526均其例），与时王自称之“我”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四

综上所述，甲骨卜辞中第一人称代词“朕”、“余”、“我”，不仅意义相同，而且语法功能也基本相同：“朕”与“我”三格俱备，可作主语、定语、宾语；“余”除主格外，还有宾格，其领格目前虽尚无确切辞例，按理也不应该没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新材料的出现。“朕”纯粹是时王自称；而“余”、“我”还可用为方国名、地名、人名，情形较为复杂，不是纯粹的人称代词，这又是它们与“朕”的明显不同处。

甲骨文联、余二字偶与“王”共见一辞，分别属于不同的格，这也是颇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上文所引《掇》1·95便是一例：朕为领格，余为宾格。此外如《粹》1244（《佚》15）云：“甲戌卜，王：余令角鬲（妇）古朕事？”则余为主格，朕为领格。《新缀》309（《通》592）云：“甲午王卜贞：侂余酒，朕奉酒，余步从侯喜征人方……王占曰：吉。在九月，……”余、朕均为主格。这种特殊现象，当如李文所论，“只是一种修辞手段，不过为了达到‘变文避复’的需要而已”。唯至今未见我、朕、王或余、我、王共见一辞而分属各格的辞例，故难以作过多的分析或推论。

管书认为甲骨文鱼字亦为第一人称代词，作主语，其根据为《前》1·30·4片，谓“鱼确是句子的主语，刻辞中人名有叫子渔的，渔字有水旁，鱼疑是第一人称代词”云云^⑤。《汉语语法史概要》从之，谓“鱼”即吾的最初假借字^⑥。案此说恐有误。检视原拓本，管氏所定为鱼字者实作侂，似鱼而非鱼字。罗振玉入之《殷虚书契待问编》（第48页），同条尚列侂（《前》7·82·4）𠄎（《后》下89·9）𠄎（《前》6·67·4）诸形，商承祚先生《殷虚文字类编》亦入诸待问编。此字多见于祭祀卜辞，与祭祀有关，或疑祭名，或谓乃用牲之法，但其非鱼字，非第一人称代词，则可断言^⑦。甲骨文中鱼字均象鱼形，多用为捕鱼之渔，如“王鱼”（《乙》7015），“王往征（延）鱼若”、“王勿征鱼不若”（《乙》6751），“贞：我鱼”（《南北·诚》86）等辞均是其例，尚不见有假借为人称代词者。甲骨文另有虞字，依王国维之说，即后世之吾。但此字一见于《前》6·50·3，仅存一字；再见于《续存》下445，为残辞，均不足据，究竟可否用作第一人称代词，还无法作出判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八三年三月修订。

①王力：《汉语史稿》中册，1980年6月新一版，第261页。

②说详拙文《甲骨文字辨析·卜辞广又说》，《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一期。

③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8月，第71，72页。

④关于“我”字兼单数、复数的问题，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考释等

书均有论述，可参看。

⑤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第32页。

⑥同注③，第72页。

⑦于省吾释为兀，谓即《说文》𠄎字之初文，其义为刳物性或人性，取血以祭。较为可信。说见于氏所著《甲骨文字释林·释兀》，1979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



来稿摘编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性和商品性的统一

张浩峰 廖建新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这本身就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直接对立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据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质上就是以公有制为前提，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

从社会主义实践和学术界对计划经济的探讨来看，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最初是把两者看成互不相容，绝对对立的，认为计划经济就是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甚至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看成是自然经济；随后人们认识到，在存在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情况下，废除商品货币关系，不要市场是不利的；再进一步，人们又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保留商品货币关系是必然的；后来人们又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成分即全民所有制内部找商品货币存在的原因。应该说，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认识上的不断进步，打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同市场不相容的旧框框。

那么，到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商品生产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它们处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不同层次，反映生产关系的不同侧面，构成为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二种属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计划经济活动的基础，计划经济又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调节对象，它们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

目前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商品经济的形式。劳动产品，无论是生活资料或生

产资料，绝大多数以商品形式出现，我国的工业产品全部是为交换而生产，农产品大部分也是为交换而生产；同时，有一个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多渠道的贸易组织和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有遍布全国城乡的银行组织和数额巨大的货币流通量。可见，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所有企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是作为统一的经济结构各个环节而进行活动，它们所有活动首先必须服从社会的总利益。这种经济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就决定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须实行计划调节，除此之外，不可能还存在生产关系的其它运动形式。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内容和运转方式的统一。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经济过程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运动形式的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紧密联系的总过程。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性根本对立的经济的特殊作用方式。这种特殊性不仅表现为一种调节手段和方法，而且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特殊运转方式。这说明，并不是任何调节经济过程的措施都可以看成计划性的表现。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各种形式来调节经济生活，但这些都与计划性的真正含义毫无共同之处。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运动方式，它的目的是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时，这种特殊性还表现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在人们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组织和管理生产的一种经济发展类型。在典型的商品经济中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利益就是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共同的利益只存在于双方和多方的自私自利之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二

分册,第10页)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没有也不可能用计划性来统一。在未来的全社会联合劳动中即共产主义社会中,只有计划性,没有商品性,利益既是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同时也是社会的利益。而社会主义经济却是另一类型。商品性生产决定了每个商品生产者或单位都有自己的利益,不同的生产单位即这一部分劳动者与那一部分劳动者在利益上是有区分的,但全体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上又是一致的,这种利益一方面通过交换价值的形式表现,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体现,但更主要的,更根本的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协调社会经济活动,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来实现。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就清楚地表明,计

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而商品性虽然从人们交换劳动的经济联系中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由于它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无必然联系,所以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只是表现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辅助属性,可见,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和商品性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并列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的:“必须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如果孤立地从计划性或商品性去看社会主义,还是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只有计划性和商品性的统一,才是社会主义经济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又区别于共产主义经济的一个特点。

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三方面

刘歌德

凡是古今中外各派哲学共同研究和回答的问题,贯彻在哲学体系各个部分中的共性问题,都应该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基本问题应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问题。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1972年版,第14页。)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即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也就是所谓哲学本体论问题。对这个问题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哲学史上绝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也有少数哲学家否定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是从两个方面论述哲学基本问题的。但是,恩格斯没有说哲学基本问题只有两个方面。我认为哲学基本问题还有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

是关于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问题。对这个问题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不同的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哲学本体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也就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和规律问题。这是世界观的核心问题。理由是:

第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是两种宇宙观和方法论的斗争。任何哲学首先要回答世界是什么问题、精神对自然界谁是本原的问题,所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两个根本对立的派别。任何哲学同时又要回答世界的状况“怎么样”(世界上万事万物是否联系、是否发展、如何发展、为什么发展等)的问题,要回答世界发展的规律问题,据此又形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恩格斯曾经指出古代朴素辩证法“实质上是正确的世界观”。列宁也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

（统一物分成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列宁说的就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对立的宇宙观。毛泽东在《矛盾论》第一部分中就明确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毛泽东选集》一九六八年版第275页）在解放后他又指出：“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显然，列宁和毛泽东都明确地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看作是对宇宙发展规律问题不同回答的哲学宇宙观。既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是两种宇宙观斗争，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也是两种宇宙观的斗争，同样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三个方面的斗争。

第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也和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一样，贯穿于人类认识史的始终，贯穿于哲学史的始终。毛泽东指出：“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研究中外哲学史，不但应该研究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而且应该研究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就是到了将来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

第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斗争也贯穿在哲学各个问题之中。无论是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不但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而且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只有在哲学每个问题中，既坚持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才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成效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

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毛泽东选集》第279页、第283页）

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辩证法同形而上学之间呈现着错综复杂的交错关系。因此，对唯物主义阵营的哲学家的一切哲学思想肯定一切，对唯心主义阵营哲学家一切哲学思想否定一切，都是片面的，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不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不用“两个对子”的观点来研究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史的发展，就会把问题简单化。

从本质上看，唯物主义同辩证法是一致的，是对同一客观世界的不同回答。物质本来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唯物主义观点。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和具有内部规律的，是运动变化的，是充满着矛盾的，这是辩证法的观点。世界本来就是运动着的发展着的物质世界。承认客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必须同时承认客观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承认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必须同时承认客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才是真正科学的辩证法世界观。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否认客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客观事物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否认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变化，这既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所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本质上说也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揭示了这两者的内在联系，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毛泽东选集》第288—289页）从本质上讲，辩证法同唯心主义是不相容的，而是同唯物主义相一致的，同样，形而上学同唯物主义也是不相容的，而是同唯心主义相一致的。唯物主义如果不同辩证法相结合，就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就不能最终打败各种形形色色唯心主义的进攻，就不能正确总结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然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但由于没有同辩证法结合，不能把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因此，它的认识论是机械的、直观的、消极的反映论，不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总体

上说,既是唯心的,又是形而上学的。另一方面,辩证法如果不同唯物主义有机结合,也不可能贯彻到底。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由于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辩证法这个活生生的东西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最后被窒息了。

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关系在哲学史上,虽然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从发展总趋势来说,唯物论和辩证法是结合在一起的,形而上学同唯心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同朴素的辩证法曾经是结合在一起的。唯物论同辩证法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在哲学史发展一个时期内,唯物论同辩证法

曾经分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了人类思想史发展的优秀成果,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在科学的基础上有机统一起来了,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哲学,才在哲学史上首次对哲学基本问题各个方面的问题作出全面的科学的回答。

我们认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三方面的表现,也就是为了尊重唯物论和辩证法,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哲学基本问题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不仅仅只是坚持唯物论问题,同时也要坚持辩证法。只有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才能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青少年的自我教育

傅岩

自我教育是德育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必须引起重视并加强研究。教育与自我教育,一为外因,一为内因,教育通过自我教育起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般说来,学龄期以前的儿童,还谈不上有真正的自我教育能力,他们的心理与生理条件还不成熟。但自我教育的能力也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自然发展起来,它是正确地施加教育影响,经过长期潜移默化产生的结果。要在积累了一定的道德生活的经验,在教师、家长、社会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作出评价的催化作用下,形成自我约束、自我要求的心理定势。而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又促使他们能更好地吸取教育的影响,以增强教育的效果。正确处理好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关系,是增强教育效果的关键之一。自我教育还是德育的目的。德育的目的就是使受教育者形成自我教育的能力,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要求自己,自我激励,自我改造,教育的任务归根到底要靠自我教育来完成,靠自我教育来体现其效果的。离开了自我教育,不仅难以完成德育的任务,也违背了社会主义培养人的规格。

自我教育的过程有几个主要环节:(一)产生动机。即意识到人需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继而明确意识到学校、家庭、社会对自己的道德要求,相信这种要求是正确的,是应该做到的,又是力所能及的,于是产生实行的动机。(二)了解自己。即通过自我检查、自我分

析,通过与别人交谈,了解自己的优点、缺点,长处短处,以便于发扬优点,改正缺点。(三)拟定计划。即按照教育的要求,针对自己的优缺点,给自己规定一些扬长补短的要点和实程序。(四)行动锻炼。即把拟定的计划付诸行动。(五)坚定意志。即在行动锻炼过程中,采取自我誓约、自我鼓舞、自我命令、自我监督等手段,克服困难,坚定信心,持之以恒。

根据上述环节,必须这样开展自我教育工作,一、激发愿望和动机。二、培养能力。首先要培养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学会分析自己的方法,分析研究自己的意识、行动。并形成拟定自我教育计划的能力。三、锻炼意志。首先要鼓励学生严格执行锻炼计划,在适当时机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帮助他们分析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勉励他们不断前进。还可教给学生各种锻炼意志的手段。四、运用舆论力量去影响每一个学生,当某一成员的行为受到集体赞扬时,通过集体舆论的反馈,他就充分体验了一种自豪的、满足的情绪,加强了原来的心理定势。当某一成员的行为遭到集体谴责时,通过集体舆论的反馈,他便体验到一种自愧感、虚脱感,就会减弱或消除原来的心理定势。与此同时,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了教育。五、消除不良影响。包括教师的不良方法、以及家庭、社会的不良影响。



广东社会科学界纪事

(1984年1月—3月)

一月

11—12日 广东省纪念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讨论会共收到论文和资料39篇。

12—14日 广东省社联工作会议在从化温泉举行。会议总结了省社联83年的工作和讨论了84年的工作计划。

14日 广东国际金融学会邀请辽宁大学陈家盛副教授作题为“世界第四次产业革命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学术报告。

20—21日 广东法学学会和广东律师协会联合组织法制宣传活动，到三水县劳教场向劳教人员宣讲法制课和召开座谈会。

23—25日 广东哲学学会召开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学术讨论会。

23—24日 广东经济学会组织广东经济界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到新会县参观引进外资的企业，了解企业管理情况。

二月

16日 广东人口学会召开工作会议，由副会长李美林同志传达全国人口工作会议精神。

18日 广东省社联召开各学会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中宣部关于学习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件。

20—22日 南方八省(区)(湖南、湖北、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厂长、经理联席会在佛山市举行。这次会议由广东厂长经理研究会筹办，主要是交流工作经验，共收到论文62篇。

20—22日 广东外国文学学会举办学术讲座，邀请美国加州大学Murray Krieger教授作关于美国新批评主义及后新批评主义等问题的学术报告。

29日 广东省社联召开学术座谈会，学习和讨论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

三月

2日 广东经济学会召开“世界新的工业革

命和我们的对策”座谈会。

9日 广东历史学会中学历史教研会召开座谈会，学习和讨论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重要文章。

10日 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邀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陈继文副教授作题为“新的技术革命和商业现代化问题”的学术报告。

10—11日 广东省家庭教育研究会举行年会。会议主要内容是汇报83年工作情况；研究、讨论84年工作计划；宣读学术论文，进行学术交流；表彰先进。

12—19日 全国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会在肇庆市举行。100多名专家、学者和研究工作者出席了讨论会并提交论文60多篇。

14日 华中师院张舜徽教授应邀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作题为“怎样学习和研究文史”的学术报告。

14日 美国加州大学叶汉明博士应广东历史学会的邀请作题为“清代山东潍县与临清县地方社会的比较研究”的学术报告。

18日 广东营销学会邀请暨南大学傅汉章副教授作题为“预测、调查、决策”的学术报告。

20—24日 广东图书馆学会在佛山市举行图书馆基础理论讨论会。

21日 广东法学学会召开法学理论讨论会，讨论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法制理论的重要贡献等问题。

21日 广东教育学会召开座谈会，讨论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的“三个面向”是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根本方向等问题。座谈会着重讨论了新的技术革命与教育发展的关系。

21—23日 广东军阀史研究会举行年会，主要讨论《广东军阀简史》的编写提纲。

28日 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广东分会召开学术讨论会，邀请省物价局局长何杰同志作题为“广东省物价问题”的学术报告。

(李鸿生整理)



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总第六十四期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20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州市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国内代号：BM268

北京2820信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0.40元

广东省期刊登记证095号

本刊每逢单月二十日出版